文史知识文库

德國的漢學研究

张国刚 著

文史知识文库

德国的汉学研究

张国刚 著

中华书局

责任编辑：华晓林

文史知识文库

德国的汉学研究

张国刚著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1/32·7 1/2印张·2插页·154千字

1994年7第1版　1994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定价：8.00 元

ISBN 7—101—01155—1/G·43

写在《文史知识文库》之前

这套书本来是以"文史知识丛书"的名义出版的，现在改成"文史知识文库"。"丛书"改成"文库"，目的是使这套书容量大一些。把这套书编得更充实、更丰富，不仅容纳《文史知识》已经刊发过的较好的内容，还要容纳《文史知识》未能刊发的好内容。我们的计划是深入浅出地、重点而又系统地介绍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丰硕成果。

我们的时代日新月异。科学技术革命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国人民重振雄风，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正酝酿着新的崛起，新的振兴。

在这一巨大变革中，在计算机、人造卫星、宇宙飞船、超导体、遗传工程等纷至沓来的时候，我们仍然会深深感觉到无所不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力量。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是如此的丰厚，以至于我们伴随着一项现代化工程的伟大胜利，几乎都要想起我们的前人，想起为我们编写了中华民族灿烂篇章的人们。我们的前人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灿烂文化。春秋战国的诸子哲学、汉魏六朝的丰碑巨制、韩柳欧苏的大块文章、明清之际的人生画卷，无不表现了对社会国家的情怀，对宇宙世界的期待。这千古风流人物的搏斗，相互辉映，激荡交融，造成了光华灿烂的中国，博大久远的中华民族传统。这是

我们的骄傲，也是我们民族凝聚、发展、强盛的力量。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总离不开我们站立的祖国大地。我们都是伟大祖国的儿女，对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对我们祖先繁衍发展的土地，怀着深切的挚爱之情。爱她，了解她，同时研究她；在了解她、研究她的过程中渗透着我们对现在和未来的信念。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以重新崛起的决心，把祖国的传统文化放到整个世界文明的背景之中，我们一定会更准确地找出精华，区分糟粕，在看来杂乱无章、盲目被动的历史表象中，寻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为我们今天的创造活动服务，为我们走向世界、走向未来服务。

我们热诚地欢迎广大作者和我们一起编好这套文库，共同去完成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

2137/08

目　录

一　引言……1
二　传教士时代的德国汉学……10
（一）从汤若望到魏继晋……10
（二）从米勒到门泽尔……12
（三）从莱布尼兹到歌德……15
三　筚路蓝缕的先驱——十九世纪的德国汉学……20
（一）业余爱好者的汉学……21
（二）东方学中的汉学……23
（三）学术性的汉学……26
四　世纪之交的转折——德国汉学学科的建立……30
（一）柏林东方语言研究所……30
（二）来自各方的呼唤……32
（三）汉学学科的建立……35
五　卫礼贤和法兰克福"中国学社"……40
（一）悠游于中国学者之间……40
（二）法兰克福"中国学社"……42
（三）鞠躬尽瘁译介儒家经典……45
六　外交官出身的汉学家——福兰阁和佛尔克……49
（一）福兰阁的中国通史研究……50
（二）佛尔克的中国哲学史研究……53

七　土生土长的"莱比锡学派"——孔拉迪及其弟子们 ……56
（一）孔拉迪和莱比锡学派……57
（二）出身莱比锡的孔门弟子……59
八　大墙外的汉学家——查赫与库恩 ……65
（一）查赫的中国古典诗文翻译……65
（二）库恩的中国古典小说翻译……67
九　从柏林到北京——西来取经与东行求法……72
（一）海尼士和柏林的中国学……73
（二）西行"取经"的中国学者……75
（三）留学北京的德国汉学家……78
十　战后的残局与汉学的重建……82
（一）战后的残破局面……82
（二）人才的严重流失……84
（三）汉学的恢复和重建……86
十一　从"三分天下"到"诸侯称霸"
——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德国汉学……91
（一）傅吾康的明清史与近代史研究……91
（二）福赫伯的中国中古史研究……94
（三）艾克斯以来的东德汉学研究……96
（四）福克斯、海西西的满清、蒙元研究…… 100
（五）霍福民、艾士宏的文史研究……103
（六）葛林、德博和鲍吾刚的文史哲研究……105
十二　"中国热"时代的汉学…… 112
（一）"中国热"的几点特征…… 112
（二）八十年代以来的几个研究热点…… 116

(三)八十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与未来研究趋势…… 122
十三 今日大学的汉学系…… 127
(一)汉学系的一般情况…… 127
(二)奥地利的汉学系和汉学研究…… 131
(三)瑞士的汉学系和汉学研究…… 133

附录
1.德语国家中国学家小传…… 136
2.德语国家的大学汉学系简介…… 195
3.德国汉学研究丛书简介…… 207

一 引 言

(一)

东西方文化通过互相交流来加深了解，取长补短，如今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应该说是无可争辩的共识了。文化的交流有种种渠道和方式：物质文明的自然碰撞，思想精神和相互汲取，哲人式的融会贯通，老百姓的兼收并蓄，媒体的道听途说，专家的介绍研究，等等。其中专门家对异国文化和历史的介绍与研究，就本文的主题来说，海外汉学家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介绍与研究尤其具有重要性。

外国的月亮不比中国的圆，中国的月亮也不比外国的圆。大概可以盖棺论定。但是，当莱茵河畔星光灿烂之时，扬子江上也许正霞光满天。从西方看东方和在东方看东方就是不一样，反之亦然。正像一个人打量自个儿，跟别人观察自己往往有所差别，中国人研究中国与外国人研究中国势必也有所不同。同是外国人，东洋人眼中的中国与西洋人的中国图象也不会雷同。因此，当今的中国学实际上又有中国的"国学"、日本的"支那学"、西方的"汉学"之分。① 中国人研究中国文化与历史，当然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也不能说决不会产生"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惑。外人的褒贬评鉴，有时或许正是一块"他山之石"。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选题的角度，他们处理问

005527

题的方式，他们的评价标准，无不反馈出另外一种文化背景。“横看成岭侧成峰”，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式，探讨古老而又常青的中华文明，在学术上相互切磋，将推动文化交流的深入发展，有益于在一种综合东西文化基础上的世界文明的建设。

中国学术界已日益重视外国对中国的研究。许多学术杂志腾出一定篇幅，介绍国外的中国学研究动态，几家出版社还出版了海外汉学研究丛书。这都是很好的现象。一般来说，所介绍的情况以日本的为多，欧美的为少；欧美中以美国的为多，欧洲的为少；欧洲以法国的为多，德国的为少。看来在介绍西方对中国的研究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应德国洪堡基金会（Alexander von Humboldt Stiftung）的邀请，本人从1989年到德国各地访学，访问了包括汉堡大学、波恩大学、哥廷根大学、柏林自由大学、洪堡大学、慕尼黑大学、波鸿大学、海德堡大学、特里尔大学等在内的几乎所有的设有汉学系的德国大学，同德国同行们进行会谈、讨论、交流，参加他们的学术报告会，阅读他们的研究论文，还应聘在大学里讲授中国文史课程，因而对德国的中国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有所了解。多谢《文史知识》编辑部的美意，使我得以把自己的了解与印象写出来，以广见闻，以利交流。写作中得到许多德国学者、教授、朋友的帮助，谨此致以谢忱。

介绍德语国家汉学以前，先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西方汉学走过的道路。

（二）

1991年是马可波罗从广州海路离华700周年。西方人之了解东方，了解中国，马可波罗功不可没。这位威尼斯人关于东方见闻绘声绘色的描述，使欧罗巴人将信将疑之际，生出无限幻想。据说500年前鼎鼎大名的哥伦布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受到《马可波罗游记》的激励，毅然率领船队往东方去寻找丝绸与金玉遍地的海外"仙山"——印度和中国的，结果找到了美洲新大陆。

马可波罗本人其实也是在东西方交往已甚频繁的背景下来华的。十三世纪的欧洲，正值十字军东征的年代，东方蒙古人的西征，使西欧生出一个"远交近攻"的策略。他们企图一方面遏制蒙古西进，另一方面与之相联络通好，夹击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首先由教皇英诺森四世出面，于1246年派教士出使蒙古，几年后，法皇路易九世也遣使节到蒙古帐下，均不得要领而回。倔强的蒙古铁骑一直冲到了地中海岸。终元之世，西方商人与教士来华，一直络绎于途，马可波罗一家就是其中之一。只是从十四世纪末开始，由于伊斯兰教国家的崛起，中国与欧洲的直接交往一度趋于沉寂。②

十五世纪末是世界航海史上最辉煌的时代。非洲好望角的绕航，美洲的发现和欧亚航道的开通，直接促进了东西方的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

1543年，亦即明世宗嘉靖十三年，天主教耶稣会成立。这时的欧洲笼罩着一股宗教狂热的气氛，耶稣会士们精神勃勃，想把他们的上帝信仰也推广到亚洲，于是就有了明末清初传

教士的东来，就有了“西学东渐”。

在华建立耶稣会的是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神甫。利玛窦于万历十一年到达澳门，后来又在广东的肇庆、韶州等地逗留。在澳门他已学会了汉语，能说会写。罗常培先生《国音字母演进史》提到利玛窦还曾设计了一套“汉语拼音方案”，用拉丁文字母拼读汉字。到北京后，利玛窦等传教士为了接近中国士大夫，穿儒服，讲汉语，在给中国人洗礼传教之前，首先接受了中国文化的洗礼。他们把西学介绍给中国，又把儒学和中国的情况介绍到欧洲。据著名汉学家、蒂宾根大学前副校长葛林(Thilemann Grimm)教授统计，③ 十七世纪欧洲至少有四种有关中国的书籍极为畅销。其中1585年出版的西班牙教士最早的在华旅行报告，截止1663年78年间共有七种不同语言的版本，行销达28版；1615年出版的《利玛窦日记》33年间有六种语言的版本，发行12版；1641年葡萄牙人关于在华教会的报告，37年内共有五种不同语言的版本，发行9版；特别是卫匡国(Martin Martini)关于满洲入关即所谓“鞑靼战争”(1644—1645)的记述，在1654年出版后，50余年间共被译成九种不同的语言，发行达21版。此外单单十七世纪下半叶(1650—1700)在欧洲出版的有关中国的重要著作，除了零星报告和信函不计外，就不下38种之多。因此十七世纪的欧洲确实刮起了一股“中国风”，耶稣会传教士就是当时的“兴风”者。康熙三十一年(1692)，康熙皇帝颁布上谕，准许耶稣会教士行动自由，这样做，康熙自有他康熙的意图，但却使他在西方的崇拜者那里赢得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君王的不虞之誉。

毫无疑问，传教士是在教会的利益原则下介绍中国，研究儒家经典的。利玛窦就极其认真地在中国经典中找到了“上帝”的概念。他们极力想向欧洲证明，高度发达的中华文明，早就受到过上帝的关怀，他们现在做的正是重建上帝信仰的工作。但是中国人崇天祭祖，却是与基督教义迥然有别的。于是就激起了欧洲人对中国礼俗的研究，仅1700年内就发表了七部研究中国礼俗的著作，如《中国礼俗政治档案》、《中国礼俗政治讨论》等。由于有关中国教徒应否保持其偶像崇拜的争论，就进一步引起欧洲人对中国历史和文字的注意。人们研究中国民族是否与《圣经》里所提及的民族在历史上有过来往？研究中国文字是否与埃及的象形文字有关？进一步人们希望通过此类研究找到中国古代对上帝信仰的蛛丝马迹。十六、十七世纪欧洲最早的一批汉学家就是这样地在这批人中间产生的。

1701年，耶稣会北京地区负责人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公开发表言论，认为儒家的“天”乃取法自然，并非最高神祇上帝。于是爆发了一场所谓“礼仪之争”。1704年，教廷宣布禁止中国教徒祭祀孔子和祖先。1705年和1720年教皇两次派人到北京就此事进行交涉。中国皇帝当然不能接受。康熙一怒之下，禁止耶稣会在中国传教。教皇也于1773年下令解散耶稣会。传教士时代的汉学蜜月也就寿终正寝了。但是由此传播的关于中国的知识却不会在欧洲大陆消逝。④ 福赫伯赞叹：“当时欧洲对中国的兴趣是如此之大。”以致人们可以说，那种反巴罗克(Barock)的罗柯柯(Rococo)风格完全是一种中国模式。罗柯柯是十七世纪下半叶至十八世纪中

期欧洲风靡一时的一种艺术风格，表现在绘画、建筑、园林以至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深受中国文化与艺术的影响，十八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等人高扬理性主义的旗帜，反对宗教愚昧，也从中国思想家那里寻求理论武器。他们把宋儒理学中的"礼"解释为自然原则，看成是对基督教启示神学的反动。如伏尔泰十分推崇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不语怪力乱神"、"有教无类"的思想。他说："我读孔子的许多书籍，并作笔记，我觉得他所说的只是极纯粹的道德，既不谈奇迹，也不涉及虚玄。"他作诗赞美孔子："他使世人不惑，启发了人心。他说圣人之道，决不是预言者的那一套。"⑤包含着对基督教神学的讥讽。如果说十七世纪的欧洲汉学受到基督教精神的驱动的话，那么十八世纪的欧洲哲人对中国学的热诚则笼罩在一种反基督教的氛围之中。

与十八世纪对中国的狂热相反，十九世纪中国在欧洲的图象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1776年至1814年原在华耶稣教士冯秉正(Moye de Mailla)出版了16册的《中国通史》。这部依据《通鉴纲目》编译的编年史书，只有朝代的更替，而没有历史的发展。德国科协前副主席、著名汉学家福赫伯（Herbert Franke）教授在《西方汉学的历史》⑥一文中说："整个十九世纪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中国和它的文化是静止的。虽然有数千年的高度文明，但是没有什么变化。从根本上说，其原因可以追溯到冯秉正这本书。赫尔德(Herder)、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也深受其影响。"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向西方列强打开了大门，现实政治和商业利益的需要，使欧洲各国普遍设置了中文教学课程。西方外交官、商人、传教士和学者不

断涌进中国。其中一些人回国后在大学潜心研究汉学，成为著名学者，如牛津大学的理雅各教授，剑桥大学的威妥玛教授等。所以欧洲学者普遍认为，与十八世纪浪漫的汉学相比，十九世纪汉学方才在欧洲真正作为一门学问、一个学科建立起来。

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中国考古发现引起举世瞩目。殷墟甲骨、敦煌吐鲁番文物吸引了西方大批冒险家、学者前来"探宝"，给二十世纪的欧洲东方学界的中国学研究以进一步的推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新的发展。1948年在英国剑桥召开的第一次欧洲青年汉学家会议，是经历战争磨难后欧洲汉学界的新生代重整旗鼓的尝试。1965年它改名"欧洲汉学家协会"，成为一个全欧性的学术组织，五十、六十年代欧洲"宋代研究计划"的实施和"汉学研究文摘"的编纂就是西欧汉学家联合美国及日本等国学者进行的合作。七十年代以后，由于中欧关系的改善，特别是港台经济的起飞和七十年代末大陆的改革开放，中国（包括港台）与西欧的贸易关系有了长足的发展，刺激了欧洲各国大学中文教育，也推动了汉学研究，在亚（日本、朝鲜等）美（美、加等）欧海外汉学研究格局中，欧洲继续保持其三分天下而有其一的传统地位。

（三）

在欧洲汉学传统中，德国的汉学研究就跟它曲折的历史一样，起步晚，起伏大，发展快；德国的汉学也和德国的现状一

样，因其雄居西欧各国之首的经济实力而显得规模大，势力雄厚；德国的汉学还同灿烂的德国文化一样，富于成果而且深具特色。

关于德国汉学的介绍，我想分成如下几个部分：

一、引言

二、传教士时代的德国汉学

三、筚路蓝缕的先驱——十九世纪的德国汉学

四、世纪之交的转折——德国汉学学科的建立

五、卫礼贤和法兰克福"中国学社"

六、外交官出身的汉学家——福兰阁和佛尔克

七、土生土长的"莱比锡学派"——孔拉迪及其弟子们

八、大墙外的汉学家——查赫和库恩

九、从柏林到北京——西来取经与东行求法

十、战后的残局与汉学的重建

十一、从"三分天下"到"诸侯称霸"——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德国汉学

十二、"中国热"时代的汉学

十三、今日大学的汉学系

前面十章谈德国中国学研究的历史发展，力图讲明汉学在德国走过的曲折路程，介绍各个时期有影响的德语国家的汉学家和他们的代表作。最后三章介绍德语国家汉学的现状。特别是比较详细地介绍九十年代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大学汉学系和研究所关于中国学的教学与研究的状况。包括教研人员、课程安排、图书设备、研究课题与重点，主要研究成果等等。叙述中难免挂一漏万，尚祈读者雅正。

① “汉学”与“中国学”的涵义严格地说并不完全一样。中国学应包括汉族之外其它中国少数民族的学科。但在西方传统分类中藏学归于印度学或南亚学，蒙古学归于中亚学，为了行文的方便，在本文中“汉学”与“中国学”的涵义不作区分。

鉴于奥地利和瑞士同属德语区国家，本文在介绍德国汉学的同时亦附带兼及之。

② 参见方豪：《中西交通史》第3册，台北，1958年。

③ 葛林：《中国与莱布尼兹的中国观》，李国祁译，载《食货》复刊号第1期，第516页。

④ Raymond Dawson: The Chinese Chameleon, an Analysis of European Concep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35—64.（道森：《欧洲接受中国文明的分析》）

⑤ 参见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92—293页。

⑥ Herbert Franke: Zur Geschichte der Westlichen Sinologie, in: Fors chung u. Information——China, Berlin (1980): Colloquium Verlag, S.9—16.（福赫伯：《西方汉学的历史》）

二　传教士时代的德国汉学

翻开中世纪的德国地图，我们会为那红绿相间的色彩所表现的小邦林立局面感到吃惊。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德意志国家四分五裂，内争不已。特别是三十年战争(1618—1648)以后，一片萧条冷落，德国自顾不暇，无法与当时的海上强国葡、西、荷、法、英等国相比。来华的德籍传教士相对也要少些。据说十四世纪初叶，已有几位德籍教士到过中国，可惜没有留下什么关于中国的报道。① 当时德国人对于中国了解很少。1477年《马可波罗游记》正式出版了德文翻译本。欧洲各国传教士关于中国的报道也陆续传入德国，德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开始丰富起来。

(一)从汤若望到魏继晋

十七世纪开始，明末清初的著名传教士中有几位德意志人。汤若望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字道未，语出《孟子》"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之句。这位来自科隆的日耳曼人，精通数学和天文学，来华前与意大利著名科学家伽利略 (Galileo Galilei) 同为灵采科学院 (Accademia dei Lincei)的院士。他于明天启二年(1619)来华，先抵澳门，后进京陛见，与徐光启等士大夫交游颇笃。明清易代，汤若望仍获重用，被授命主持修订历法。阴历"时宪

历”就是他在“崇祯历书”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被沿用至今。清顺治皇帝任命他为钦天监正。为了纪念汤若望诞辰四百周年，最近德国联邦邮局特发行纪念邮票一枚；1992年5月3日科隆汤若望纪念碑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德国汤若望基金会还举办了学术报告会等一系列活动，用以表达德国人民对这位中德友好先驱的尊重与怀念。②

康熙时来华传教的戴进贤(P.Igany Koegier，1680—1746)也是一位德国人。雍正三年(1725)任职钦天监正，带礼部侍郎。同时他又是耶稣会在华主要负责人之一。在华著有天文数学著作数种，乾隆十一年(1746)死于北京。明末与汤若望一同来华的瑞士人邓玉函（P.Johannes Terrenz，1576—1630）也是伽利略的密友和灵采科学院院士。故他在华介绍伽利略的学说颇多，其名著有《奇器图说》等。清初来华的奥地利人恩理格(P.Christian Herdtricht)、雍正时来华的德意志人魏继晋(P.Florian Bahr，1706—1771)都曾经是皇帝的座上宾。他们带来了现代西方科学知识，同时也传播了东方的文明。恩理格与人合编的《孔子儒家哲学》，是最早的关于《论语》、《大学》和《中庸》的欧文译本之一。魏继晋乾隆年间在北京编著过一部德华词典。该书收入二千二百多个字词，按德语发音规则来拼读中文，可惜当时没有付梓。本世纪三十年代德国学者福克司(Walter Fuchs)来华，在北京图书馆发现了这部手稿，才将它整理出版，称为《首部德华词汇》(1937)。

(二)从米勒到门泽尔

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威廉一世(Friedrich Wilhelm)是一位雄心勃勃的人物。在西非黑奴贩卖红火之时，他却有一个向东发展的宏大计划，特别是想仿照荷兰东印度联合公司(VOC)建立一个自己的东印度公司，经营东方贸易。帮助他制定这个计划的是荷兰人季瑟尔斯(Admiral Gijsels van Lier，1593—1676)。虽然其事终未克成，却激发了选帝侯对研究东方语言和文化的兴趣。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是，季瑟尔斯及其它荷属东印度公司成员把一大批中文图书运到了柏林，成为选帝侯王家图书馆的馆藏。这使柏林拥有十七世纪欧洲最大的中文图书中心。

柏林教士兼东方学家米勒(Andreas Mueller，1630—1694)获特准可以经常性的使用这里的图书。他第一次将这些中文图书编成目录。米勒1670年编辑过一本《关于契丹国的历史和地理论集》，大约与传教士的东方旅行报告集相似。后来他还编译了一本《马可波罗游记》拉丁文本，从手稿可以看出，作者的见解比前人超出许多。③他于1672年出版的《中国的碑刻》，收入《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等三种石刻，选自另一位德籍神甫、曾任维尔茨堡大学教授的基尔谢(Athanasius Kircher，1601—1680)的《配图中国记》(1667)。1678年他还根据波斯文编译了一本《中国历史》。米勒的工作很快使他在欧洲学者圈里赢得了中国历史与语言专家的名声。在汉学史上他被称做德国第一位汉学家。

也许是在研究碑刻中的汉文和叙利亚文时比较对照心有

所得，1674年米勒郑重地向选帝侯提出一个研究“中文之钥”的计划。他宣称要找到一条通向掌握中文的口头和阅读能力的捷径，以便“即使是妇女也只要花一年或更短的时间学习中文字母，就能够阅读中文或日文”。他说，这不仅对传教士和商人有实用价值，对中国人自己也是很有好处的。米勒的建议颇令选帝侯心动。但是一场宗教教派之间的争论却使此事成了泡影。来自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的神学教授格热布尼茨（Elias Grebnitz）撰文攻击说：印刷与书写是上帝所赐予表达语言的手段；而象形文字则是一种事物的比喻，它是魔鬼造出来的，目的是使可怜的人们在黑暗中更加不能自拔。教会人士乘机攻击米勒出版《中文之钥》是离经叛道。米勒则撰文极力辩白中文不是象形文字，不是魔鬼所造。但他终究未能得到选帝侯财政上的支持，使这本书出版。米勒也被迫离开了柏林。据说他死后手稿被付之一炬。他的《中文之钥》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遂成为不解之谜。两百年后另一位也叫米勒（August Mueller）的东方学教授在1880年第35届语言学大会东方语言分会上以大会主席的身份所作的演讲中，高度赞扬了这位前辈学者的贡献，提到米勒二十多部著作和手稿。④1940年美国学者雷契（Donald F. Lach）在《美国东方学会学报》（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上发表专文，论述米勒的汉学研究成就，特别是他的“中文之钥”及其影响。⑤

在米勒逝世那年出生的德国学者巴耶（Gottlieb Siegfried Bayer，1694—1738）对米氏的中国学研究作过评注工作，对米勒追求的那种寻求“中文之钥”的方法大不以为然。⑥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十八世纪人们对中文的认识已经

较前深化了，更何况巴耶本人也是一位行家里手，他的主要兴趣也是探讨中国文字的结构系统。他还研究过中国的历法，编纂过一部《中文小百科》，可惜这部辞书和他的其它许多汉学著作一样均未能梓行于世。

早期一位汉学研究极有成就而又不属于教士圈中人物的德国人是门泽尔(Christian Mentzel,1622—1701)博士。这位出身于一个有声望的市民家庭的医学博士，最初因为父亲病死于瘟疫而决心学医，因为旅行全欧而潜心于植物学，没想到后来促成了他研究中国学的便利。他最初在柏林开设一个私人诊所，很快名声大噪，被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威廉召为御医。不久又委任他管理王家图书馆，使他比米勒更有条件接触这里的中文图书，其中有许多关于当地植物志和动物志的图籍，以及当地居民常见病、多发病的资料，门泽尔正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他花了很大的精力研究中国的动、植物和医学，并且在杂志上不断著文加以介绍。大约六十岁的时候，门泽尔开始学习中文，他曾感叹："我敢说中文真难学好！"据说对此至今不少西方汉学家尚有同感。也正因为如此激发了他研究中国文字的兴趣。正当米勒为出版《中文之钥》而打笔墨官司之时，门泽尔却于 1685 年编纂出版了一本中文——拉丁文小词典，并借用明代一本字书的书名，叫《字汇》。1696 年接着又发表了一部《古今中国帝王年表》。这本书主要取材于传教士科普勒特 (Philippe Couplet, 1622—1693)的《中国年表》(1658)。该书巧妙地避开了中国纪年与《圣经》中大洪水记事的年代冲突，故能顺利问世。门泽尔也孜孜追求揭开中文奥秘的钥匙，他与莱布尼兹的通信曾提到此事，并说明他的

工作与米勒的不同。我们设想他是在寻求中文结构的规律，而不是找什么捷径。虽然并没有成功，但是门泽尔对中文偏旁部首和语义的研究在当时却超过了其它辞书。⑦门泽尔死后，他的儿子继续负责选帝侯图书馆的工作，却没有继续乃父中国研究的事业。

（三）从莱布尼兹到歌德

谈十七、十八世纪的德国汉学，不能不提到莱布尼兹（1646—1716），这位欧洲“浪漫汉学”时代德国最著名的一位醉心于中国文化的代表性人物。莱布尼兹曾详细地研究和阅读过传教士的报告，并将其中的一部分编辑成《中国近况》（Novissima Sinica）一书。他对中国字的内部组合逻辑有莫大的兴趣。当他听说柏林教士米勒（Anreas Mueller，1630—1694）“发现”了解读“中文的钥匙”，特地写信提出十四个问题，询问中文结构之谜。例如，是否中文所有的文字也由相同而准确的元素构成，如同字母 abc 和数目字一样，可以诵读，或者还必须借助于其它来表义；如果将西方语言逐字译成中文，是否能保留原文的韵味及意义。他为米勒的著作未能出版惋惜不已。他提出的这些问题成为人们推测米勒的所谓“中文之钥”的线索。由于他认为中国文字是一种精心构筑的系统，所以他在与传教士白晋的通信中说：“由数字次序及相关性的表达来看，中国字是较富于哲理和智慧的。”⑧

莱布尼兹在与白晋的通信中对《易经》也作过探讨。他详细研究了易经六十四卦的配列，以“零”代表“无”，以“一”代表“有”，发现易经的阴阳变化与其发明的“二进制”数学原理相

合，十分兴奋。他写信给在华的传教士，请他们告诉中国皇帝，中国早已遗忘的东西如今失而复得，可以仍归中国所有。莱布尼兹的名著《单子论》一般认为也受到过《易经》思想的影响。

莱布尼兹完全是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认识理解中国文化的。葛林教授十分中肯地写道："莱布尼兹以明亮的眼睛惊异地注视着这一远方国家文物的昌盛。他有一种切实的体认，欲将居于欧亚大陆两端的两种不同文化相连使之互相交流。认为正如同欧洲人为了天启宗教及新的学术而派传教士赴华一般，中国人为了使欧洲人相信自然神学及伦理学与国家规范，亦当派遣教士来欧。尽管他曾倾慕中国文化说：这似乎是必需的。但实际上他亦将双方文化交流的思想表达无遗。"⑨

莱布尼兹极力推动把米勒和门泽尔进行的中国研究以组织的形式进行下去。他打算建立一个新教中国教团，发展同中国的联系；他还进一步主张在柏林和北京各设立一个学术研究院，作为双方进行纯学术交流的机构；他并且希望俄国能充当中国和西欧之间的文化联络者，修建和保持一条通往东亚的道路。1711年莱布尼兹会晤沙皇时，曾以此说服过沙皇。尽管这只是一厢情愿，但莱布尼兹作为一个汉学的"门外汉"，能够从保持人类和平、发展世界文化的高度来认识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在当时是空谷足音，在今天也是意味深长的。

门泽尔之死和莱布尼兹新教中国教团计划的夭折，使德国的中国研究逐渐衰落，十八世纪柏林很快失去了其十七世纪一度拥有的欧洲汉学中心的地位。汉学中心移到了欧洲西部的荷、英、法和东部的俄国，这些地方跟东亚有着更密切的

贸易往来，并直接派教团到中国。但是，这并不是说德国对中国的了解中断了。相反，十八世纪有许多关于中国的著作被译成德文出版。柏林、科隆、法兰克福、奥格斯堡、维也纳等地是出版有关中国书籍的主要地方。1728 年至1767 年两位德国出版商花了三十多年时间出版了一部长达四十卷的《耶稣会士通讯录》，反映了德国读者对中国的兴趣。杜哈尔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所著《中华帝国全志》(1735)是一部多卷本中国百科全书，该书第一卷记中国分省地理概况和历代大事年表；第二卷记中国政治、经济，介绍四书五经和教育、科举；第三卷叙述中国宗教、医学和博物；第四卷介绍满洲和蒙古，兼及朝鲜与西藏。文学作品收有元曲《赵氏孤儿》、四篇选自《今古奇观》的短篇小说和十几首《诗经》中的诗歌。这部书曾是欧洲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了解中国的重要资料来源，传播很广。1747 年至 1749 年间该书出版了德译本，影响甚大。德国著名文学家卫兰特(Christoph Martin Wieland, 1733—1813)1722年发表《金鉴还是酋长》就是取材于《中国通志》所收元杂剧《赵氏孤儿》，而把剧情移花接木到成吉思汗时代。

稍后一些的著名文学家歌德、席勒和著名学者洪堡(Wilhelm und Alexander von Humboldt)兄弟也对中国文化有浓厚兴趣。歌德曾阅读过大量有关中国的报道和许多中国作品。他读了翻译的《赵氏孤儿》、《好逑传》，赞誉不已，说："中国有千百种这样的小说；在我们的祖先还在树林里生活的时候，他们已经有小说了。"[10] 1982 年 6 月在海德堡召开过一次主题为《歌德与中国》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剧作家席勒也喜

爱中国文学，曾试图改编中国小说为剧本。1983年著名汉学家德博(G.Debon)教授出版过《席勒与中国精神》(Schiller und Der Chinesische Geist)一书。十八世纪乃至十九世纪初叶在莱布尼兹、歌德和洪堡兄弟等精神领袖人物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对中国文化的热情，对东西方文化互相了解的渴望，可以说是传教士时代西方汉学的最积极的成果之一。且看歌德《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中的诗句：

"东西两大洲，
永不再分离！
谁是多识者，
该明此道理。
两世界互相研究，
是我的希望；
东西方互相联系，
亦是我的希望。"

---

① Herbert Franke, Sinologie an Deutschen Universitaeten, Wiesbaden(1968), S.4.(福赫伯：《德国大学的汉学》)

② 《德中协会通讯》(Mitteilungsblatt der DCG)1992年第3期。

③ Donald F. Lach, The Chinese Studies of Andreas Mueller,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60, p.566, New Haven, 1940.(雷契：《A·米勒的中国研究》)

④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aendischen Gesellschaft, Vol.35, S.3. Leipzig, 1881.(《德国东方学会杂志》，以下简作ZDMG)

⑤ 见注③，p.565。

⑥ 同注③。

⑦ Harald Braeuner: Europaeische Chinakenntnis und Berliner Chinastudien im 17. und 18. Jahrhundert, in: Berlin und China——

Dreihundert Jahre Wechselvolle Beziehungen, S. 16—20. Colloquium Verlag, 1987.（布劳纳：《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的中国知识和柏林的中国研究》）

⑱ 见注③，p.568。

⑲ 葛林（T.Grimm）《中国与莱布尼兹的中国观》，李国祁译，《食货》复刊号，第1期，第516页。

⑳ 周学普译：《歌德对话录》，商务印书馆，第120页。

三　筚路蓝缕的先驱

——十九世纪的德国汉学

由于十九世纪政治形势和商业关系的发展，西方国家的人士，从侵略者、外交官、商人到学者文人，都纷纷来到中国。欧洲各国都急需培养大批懂得中文，了解中国历史和地理环境的人才，从而促进了国内的中文教育。首先是法国于1814年在皇家科学院(即今日的法兰西学院)设置了西方第一个汉学与满文讲座教授。这是一个学术性的研究职位。首任教授为法国汉学泰斗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emusat,1788—1832)。1843年巴黎东方语言学校设立中文讲座，才是一个偏重于实际语言训练的教学机构。整个十九世纪上半叶，德国人学习中文，不是靠自学的，就是就读于巴黎。德国自己的中文教学和研究机构要晚半个世纪到一百年。

然而德国的东方学却有着数百年的悠久学术传统。专门性学术团体“德国东方学会”(Deutsche Morgenlaendische Gesellschaft)，成立于1846年，至今已经有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该学会的学术性期刊《德国东方学会杂志》(ZDMG)从1847年至今已经出版了140多卷。据《创刊词》称，它的前身是一份已出版过7卷而停刊的《东方学杂志》。在十九世纪德国东方学王国里中国学只是一个不起眼的稚嫩的新成员，

汉学也只是东方学者所兼任的一个副业。研究梵文、阿拉伯文者亦兼习中文，是相当平常的事。

(一)业余爱好者的汉学

1829年，一个叫做诺曼(Karl Friedrich Neumann, 1793—1870)的德国青年东方学家，登上一艘开往广州的英国轮船，要到中国去搜求图书。两年后的1831年，他购求得6000部中文古籍、类书、丛书满载而归，并把它们分赠给柏林和慕尼黑的国家图书馆。慕尼黑独得3500部。1991年夏笔者再访慕尼黑，曾在巴伐利亚国立图书馆见到过诺曼先生当年在中国购买图书的价格表和书肆名录。诺氏本是一位亚美尼亚文学者，后在巴黎从雷慕沙攻读中文。从中国回来不久，他担任了慕尼黑大学的东方学教授，专业是人类学、中文和亚美尼亚文。① 诺曼本人在汉学上无什么著述。他在《德国东方学会杂志》第一卷第二期和第三期上写过一篇《汉学家和他们的著作》连载文章，介绍西方著名传教士在中国的情况。他在序言中写道："人掌握一种活的语言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人们不是想了解这些国家、这些民族的思想和历史，并且把它们介绍给别人；就是试图通过所掌握的语言来传播西方的宗教、科学和文化。这两者在杰出思想家身上直接或间接地总是表现出一致性。"他比较积极的肯定了早期杰出耶稣会士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中介角色。

虽然十九世纪早已不是传教士时代，但是开始学习神学，继而东方学、汉学，仍然是当时东方学家较常见的治学道路。与诺曼一样，起先在巴黎学得汉语，后来也曾在慕尼黑执教中

文的著名学者库尔茨(Heinrich Kurz,1805—1873)就是如此。库尔茨一生经历颇为坎坷。他出生在一个德法联姻的鞋匠家庭，在巴黎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不幸父母双亡而被寄养到巴伐利亚州一个富有的叔父家里。他起先在莱比锡学习神学,后来在慕尼黑攻读文字学。当时的德国十分保守。1827年库尔茨重又来到巴黎，师从雷慕沙学习中文。在那里他接触到自由主义思想，四年后他把所学的新知识与新思想一起裹进行囊带回到家乡，在慕尼黑大学担任东亚语言与文学的教学工作。但在保守思想十分浓厚的巴伐利亚，他不得不因为政治原因而辞去大学的教职。随后他担任了《时代报》(Die Zeit)的发行人和编辑，鼓吹新闻自由，反对专制主义，为此他被长期监禁。出狱后到瑞士改行当了德国文学教授。虽然库尔茨涉猎汉学前后仅仅十年左右，却取得了令人惊异的成果。在巴黎期间他已翻译过一些儒家作品。1829年又写成《秦始皇帝》的历史论文。后来他的兴趣转向中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道家哲学。他1830年翻译的《太上感应篇》,长期以来是唯一的德文译本。他还翻译过马融的《忠经》。他译的《刘小官雌雄兄弟》(《今古奇观》),是同类著作的第二次欧文译本。1836年他在狱中又翻译了一部文学著作《花笺记》。②

同样有着坎坷经历的另一位汉学先驱是帕拉特(Johann Heinrich Plath,1802—1874)。帕拉特出生在汉堡一个普通的市民家庭。汉堡这个汉萨城市是德国最重要的东方贸易港口，商贾辐凑之地。青少年时代帕拉特就在这里接触到东方语言和文化，20岁以后他到哥廷根大学读神学。虽然在那里有艾华德(Heinrich Ewald)以希伯来文学者的身份偶尔也

讲授一点中文，但帕拉特的中文知识却全靠刻苦自学而来。博士毕业后他在哥廷根大学任东方学教授，主讲埃及学，同时也讲授关于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课程。此期间他完成了《满族》这部巨著的第一卷。该书至今仍然受到西方学者的重视。1831年哥廷根爆发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政治骚乱。身为自由派分子的帕拉特卷入其中，并身陷囹圄达十二年之久。出狱后他穷困潦倒，身体衰坏，先后在慕尼黑和法兰克福的图书馆供职。1848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移居慕尼黑。晚年他以其渊博的学识被推选为巴伐利亚科学院的院士。在院刊上他发表了许多的关于中国古代文明与儒家经典的论文。他的由多篇论文组合而成的《关于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与学说》，以其丰富的史实和精湛的分析为德国汉学界所称道，影响到几代学者，二十世纪的德国汉学大家福兰阁、佛尔克均曾受其启迪，屡屡称引其著作。③

从诺曼、库尔茨和帕拉特身上，我们所看到的汉学，与其说是东方学者的兼职，还不如说是这些学者的业余爱好。

（二）东方学中的汉学

从"业余爱好者的汉学"（Amateur Sinologie）④到学术性的汉学的转变中，威廉·硕特（Wilhelm Schott，1807—1889）和G·嘎伯冷兹（Georg von der Gabelentz，1840—1893）是代表性人物。

硕特1819年开始在哈勒（Halle）攻读神学和东方语言。当时哈勒有两位中国人，硕特同他们过从甚密，因而对中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826年他以用拉丁文写的《论中国语言的

特点》(De Indole Linguae Sinicae)的论文取得博士学位。同年又通过了内容为研究孔子的教授论文。随后硕特还学习了突厥文、蒙文、波斯文、芬兰文、日文和满文，并第一个试图把这几种语言都作为乌拉尔—阿尔泰语族进行研究。

1832年，硕特被聘为柏林大学阿尔泰语、满文和芬兰语教授。他也讲授汉学，虽然仍然从属于东方学和普通语言学。但是就学术史上的贡献而言，他却是当之无愧的"德国学术性汉学的奠基人"。早在1840年，他就翻译出版了《御书房满汉书广录》，附加德文解释。他1854年出版的《中国文学述稿》以德文中该类著作的第一部而著名。他的《哈拉契丹——西辽》出版于1849年，也是一部受人称道的著作。一方面硕特像传教士一样高度赞扬中国的古老文明、高尚的儒家道德，赞扬中国人的勤劳和优良的秉性；另一方面他又反对传教士"入境随俗"对中国习俗的妥协办法，他也像黑格尔一样，认为中国的发展陷入僵化，需要重建道德和新生活。⑤

G·嘎伯冷兹也是一位依靠自学而掌握中文的普通语言学家。他早年的著作多用法语或英语。18岁开始学习中文。1876年以翻译和研究中文和满文本的《太极图说》而获得博士学位。两年后他成为莱比锡大学新成立的东亚语言讲座的教授。⑥这使他成为德国学术性汉学的另一位拓荒者。11年后移帐柏林。嘎伯冷兹精通多种文字，其名著《中国文言语法》(Gramnatik der Chinesischen Schriftsprache)，以今日眼光视之，当然不乏幼稚之处，但是它却是西方研究中文语法奠基性的作品。当时西方有人认为中文是没有语法可言的。这本著作第一次对古汉语语法作了初步的分析和归纳。该书初

版于 1881 年，1953 年又曾在莱比锡重印，说明了它在西方学术史上的意义。⑦

嘎伯冷兹是有家学渊源的。他的父亲H·嘎伯冷兹(Hans Conon von der Gabelentz，1807—1873)是德国满文研究的卓越奠基人，1832 年就出版了《满文语法成分》一书。他还是第一部"满德词典"(1864)的编者。这其实是一部依据《四书》、《尚书》、《诗经》的满文译本而编纂的一部满德词表。⑧

1861年，中国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一年接待了普鲁士的一个代表团，其中有一位叫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83—1905)的地学家。他是奉德国海军部之命，来华调查中国地形和矿产资源的。1868 至 1872 年又先后在华作了七次旅行考察，搜集中国各地地质、地貌、矿藏、水文和海岸线等资料和数据，跑遍了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西、华南各地。回国后，他从 1877 年开始出版《中国旅行记和调查报告》(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 und Darauf Gegruendeter Studien)，长达 36 卷。还有一部《中国地图集》。李希霍芬后来曾任柏林大学校长，国际地理学会会长。他虽然算不得一位汉学家，但他提出的中国黄土风成的假说和对亚洲地质地貌特征的分析，具有科学意义。

1983 年 10 月至 11 月和 1984 年 4 月至 5 月柏林国立图书馆在柏林和波恩举行"中国地图珍藏和欧洲研究文献展览"，以纪念李希霍芬诞辰 150 周年。不乏珍品展出。如1357 年绘制的一幅世界地图，是最早的吸收了《马可波罗游记》中的报道的世界地图。此外还有利玛窦的世界地图、汤若望天体

图、马丁尼编集的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中国分省地图等。在"李希霍芬——地学家和中国研究家"专题展览中，展出了他的博士论文、纪念文集及其他重要著作。李氏的老师是著名科学家阿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而他的学生则有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等。[9] 十九世纪像李希霍芬这样的西方学者，在殖民主义时代研究东方而有所贡献，可以说是西方学术传统与殖民政策的双重产物。

（三）学术性的汉学

柏林民俗博物馆东亚部主任、著名汉学家顾路柏（Wilhelm Grube，1855—1908）博士是G·嘎伯冷兹在莱比锡的高足。由于嘎伯冷兹的推荐，1883年顾路柏出任柏林民俗博物馆东亚部主任。从此建立了该博物馆和柏林大学密切的联系。顾氏著述甚丰。他曾是德国研究女真文字的开创者，1896年发表的《女真的语言与文字》（Sprache und Schrift der Jucen）一直受到西方学者的重视。但是他的主要贡献则在研究中国文化与文学方面，他翻译过《封神演义》，这方面的代表作为《北京民俗学》（Pekinger Volkskunde）和《中国文学史》（G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前书出版于1901年，是作者1898至1899年在华旅行的收获，颇获好评。后书初版于1902年，后又再版。这是德国第一部由专家撰写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代表当时德国汉学的研究水平。全书分为十章，约470页。前八章讲先秦至唐代文学。先秦主要讲儒道作品和屈原的《楚辞》，唐代讲诗歌。第十章讲戏曲与小说。作者在《前言》中称：鉴于"读者对中国学的兴趣明显增

大”，书市上关于中国的书籍显著增多，“而关于中国文学和思想的作品却很少”，乃决定“写一部通俗性的中国文学史”。[10]顾路柏当时还兼任柏林大学教授，他的遗著《中国的宗教礼俗》(Religion und Kultus der Chinesischen)，就是他1903至1904年间在柏林大学讲课的整理稿，是一部概论性的著作。[11]

顾路柏不同于嘎伯冷兹的是，嘎伯冷兹仍然是在一般东方学和普通语言学中讨论中文，而顾路柏努力使汉学从一般东方学和普通语言学中分离出来，致力于把汉学建设成一个独立的“哲学和历史之科学”(philosophisch-historische wissenschaft)。柏林大学教授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女士这样说：“嘎伯冷兹追求的是对人类的普遍性认识，顾路柏寻求的则是一种民族性的特点，嘎伯冷兹强调共同性，在顾路柏这里，中国的异样性则是最主要的。”[12]从顾路柏师生治学特点上的这种差别，我们分明听见了德国汉学上下求索的脚步声。

与顾路柏在东方学和普通语言学内探求中国学的特性不同，夏德(Friedrich Hirth，1845—1927)是从东方学与普通语言学之外去研究汉学的。他们同属于十九世纪末建立学术性汉学的先驱性人物。

夏德原来是学习希腊古文字学的，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与中文结下了不解之缘。1869年中国海关总司英国人赫德(Sir Robert Hart)到欧洲各国来招聘青年人去中国海关任职。候选人条件要求是原海关职员或商人，或者是语言专业的学生，后者要求其中有一部分是学习古代语言的。夏德便

以符合这一条件而被选中。他的主要学术贡献在研究早期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方面。还在他任职中国海关期间，就于1885年出版了《中国与罗马的东方》(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中文译本为《大秦国全录》)一书,被誉为划时代的作品。他还与人合作翻译过南宋赵汝适的《诸蕃志》。1890年，《通报》创刊号发表的首篇论文就是他写的《关于中国纸的发明》,同期还有他的一篇论述中国铜鼓的短文。1895年夏氏从中国回国后，在《通报》上发表了《中国文学之基础》的长篇连载，是一份关于中国古典文献的书目解题，副标题称是对英国学者威列(Wylie)的名著《中国文学评解》的补充,文章旁征博引,可看出夏氏治学之广博。《亚洲学刊》(Asia Major)纪念夏德75岁诞辰试刊号上收录其论著达162种。但是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夏德却在大学里得不到合适的职位,乃于1902年受聘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任中文教授。他1908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古代史》有山口高商教授1918年的日译本。据说他曾是胡适在美国的博士考试委员会的委员之一。[13] 这里顺便一提的是,夏德在1921年写的自传中说,他在纽约时书斋里的常客是故人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也曾经是他的座上宾。[14]

从业余汉学，到东方学中的汉学,再到学术性的汉学,整个十九世纪德国汉学都在步履蹒跚。但诚如福赫伯在《十九世纪的汉学》一文中所说,我们今天也许不能直接从上个世纪的汉学著作中学习很多,然而它是我们欧洲遗产的一部分;作为时代的文献,它是我们认真了解我们前辈关于中国的认识,了解他们的研究方法和聪明才智的原始资料,"十九世纪的汉学史应视为整个欧洲思想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5]

① H.Franke:Sinologie an Deutschen Universitaeten,S. 9.(福赫伯:《德国大学的汉学》)

② H.Franke: Heinrich Kurz(1805—1873)——Der erste Sinologe an der Universitaet Muenchen. in: Studia Sino Altaica Wiesbaden, 1961,S.58—71.〔福赫伯:《海里西·库尔兹(1805—1873)——慕尼黑大学的第一位汉学家》〕

③ H.Franke:Zur Biographie von Johann Heinrich Plath(1802—1874),Muenchen,1960.〔福赫伯:《约翰·帕拉特(1802—1874)传》〕

④ Otto Franke: Die Sinologischen Studien in Deutschland, S. 359.

⑤ Mechthild Leutner: Sinologie in Berlin, in: Berlin und China——Dreihundert Jahre Wechselvolle Beziehungen, S. 31—34, Colloquium Verlag Berlin.Berlin,1987.(罗梅君:《汉学在柏林》)

⑥ Eduard Erkes,Georg von der Gabelentz und August Conrady, in Karl Marx Universitaet Leipzig(1409—1959),Beitraege zur Universitaetsgschichte, Erster Band,S.439—442, Verlag Enzyklopaedie Leipzig,1959.(艾克斯:《嘎伯冷兹和孔拉迪》)

⑦ Mechthild Leutner:Sinologie in Berlin,S.34—35.(罗梅君:《汉学在柏林》)

⑧ 同注⑥。S.443.

⑨ China blaetter,Nr.7,S.32—35,1984.(《中国通讯》)

⑩ W.Grube: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Leipzig,1909.(顾路柏:《中国文学史》)

⑪ W.Grube:Religion und Kultusder Chinesischen Leipzig,1911.(顾路柏:《中国的宗教礼俗》)

⑫ Mechthild Leutner:Sinologiein Berlin,S.35—36.

⑬ 梁容若:《现代日本汉学研究概观》,第26页,台北艺文印书馆,1972年。

⑭ Friedrich Hirth:Biographisches nach eigenen Aufzeichnungen. in: Hirth Anniversary Volume Asia Major London, 1921, S. XXXV.(夏德:《根据本人笔记所作的自传》)

⑮ Herbert Franke: Sinologie im 19.Jahrhundert.in:August Pfizmaier (1808—1887) und seine Bedeutung fuer die Ostasien Wissentschafen hrg Otto Ladstaetter und Sepp Linhart Wien, 1990.

四　世纪之交的转折

——德国汉学学科的建立

德国大学里教授是最高主宰。专业的设置是以教授为中心的。只有设有讲座教授职位(Ordinaer)，才能称得上建立了一个学科专业(Disziplin)。硕特和嘎伯冷兹虽然在大学讲授汉学，但是他们并不是汉学教授，而是普通语言学和东方学教授。顾路柏虽然力图在研究工作中把汉学的特性从一般东方学里凸现出来，但是他只是一个不拿薪水的"编外教授"(ausserplaner Professor)。夏德则在德国根本没有教职。德国汉学学科的建立，有待于大学里正式汉学教授席位(Professur fuer Sinologie)的设立。为了跨出这关键的一步，从十九世纪末柏林大学东方语言研究所的成立到二十世纪初叶德国大学汉学教席的设置，又经历了二三十年的曲折。

(一)柏林东方语言研究所

1884年顾路柏给当时的普鲁士文化部写了一封信，提出进行中文口语教学等问题。因为从硕特、嘎伯冷兹以来，到顾路柏本人，都只有研究文言的传统。由于1871年德国的统一，带来了东方贸易的蓬勃发展，也使德国有精力加入与列强在中国竞争的行列，所以需要更多的懂得中文口语的人才。

于是1887年10月27日柏林大学正式成立东方语言研究所(Seminar fuer Orientalische Sprachen)。这一开始便得到了俾斯麦的大力支持与鼓励。所里教学也以培养实际语言人才为目的。学生主要是学法律出身的大学生,也有部分邮政及银行部门的职员,工程师和商人,后来还有来华任教的德国教师等,一般在此接受两年中文培训,便获得第二学士学位文凭(Diplom)。从1887年到1912年二十五年间,大约有480人在这里学习中文,毕业后供职外交部门。中文教员如阿仁特(Carl Arendt,1838—1902)等人曾任职中国海关或领事馆,有丰富的实际语言经验,与十九世纪上半叶大多数德国汉学学者终生未曾到过中国大有不同。①

1898年《柏林腓特烈·威廉帝国大学东方研究所学报》创刊。《发刊词》称:"本《学报》的任务是:追踪本研究所所教授之语言及其相关的方言的最新发展,以专门的研究来全面推进科学的知识;尤其是着眼于德意志民族不断扩大的商业、传教和殖民的利益,开辟那些至今尚不熟悉或不太熟悉的语言领域;与此相关的是要尽可能对各有关民族的文学、礼仪和风俗、宗教、法律观念与制度以及一般的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做认真细致的研究。"② 《学报》按学科分成东亚、西亚、非洲等部分。东亚部分由阿仁特和日本学学者朗厄(R. Lange)主编。创刊号上的重头文章是这里毕业的学生、当时在北京公使馆任职的青年学者佛尔克(A. Forke)的长篇论文《从北京到长安和洛阳》(Von Peking nach Ch'ang-an und Lo-yang),达126页,介绍沿途的历史、地理、风俗和文物古迹,附加图片和注释,是一份出色的旅行报告。

但是柏林大学的东方学研究所终究只是一所实际语言训练学校，是为外交部和商界培养实际应用人才的。佛尔克接替阿仁特在此执教后，一直坚持在语言训练外，开设有关中国文化与哲学的课程，不仅得不到当局的支持，还为此常常跟研究所所长萨豪(Eduard Sachau)发生冲突。③学术性的汉学研究仍然只是学者的兼职，在德国森严的大学讲堂竟没有一席之地。反观此时欧洲其它国家，除了法国早在1814年就由雷慕沙创立欧洲第一个汉学系外，英国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825年创立伦敦东方语言学校，1837年大学院设立汉学讲座。继1875年李雅各(James Legge)在牛津大学创建汉学系，1884年威妥玛（Thomas Wade)也在剑桥大学建立汉学系。荷兰莱顿大学的汉学研究院则由薛力赫（Gustav Schlegel)创设于1875年。德国汉学的相形见绌是十分明显的。

（二）来自各方的呼唤

夏德(F.Hirth)最早从学科角度对此提出了批评。1885年他在《通报》上发表《论汉学学科》一文，颇为婉转地表达了如下见解："为了对中国学在大学中的意义和地位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比较一下在德国已具数百年历史并且达到高度水平的语言文字学的情况。我们如今一致认识到，在语言文字学方面，存在着两个并行不悖的学术分支，为达到自己的学术目标而各有分工。一个是把语言本身作为最终目的的语言学科，它与研究同其它语言的关系相联系；另一个是应用文字学，利用语言知识为发掘蕴藏在文献资料中的宝藏服务。"他认为在所有的亚洲学里汉学尤其应该将两者分

开。原因有三：第一，中国文化之于欧洲，是完全陌生的，这一点不同于邻近的中东国家，后者在语言、民族等各方面与欧洲早有联系；第二，中文资料浩如烟海，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一个欧洲人，穷其毕生的精力，也不可能深入这一文化的奥境”。“对于汉学家，尤其是有志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史的人来说，取得成功的办法只有一个，集中全副精力去对付它，利用一切机会到中国去生活，并且长年同那里的中国学者建立个人间的交往。与此无关的一切方法全要摒弃”。他还引据著名的荷兰汉学家、《通报》的第一任主编薛力赫的话说：“汉学是一门残酷的学术领域，做学问不老实的人，会受到无情的报应。”④夏德这番话的弦外之音是很清楚的，他要在这篇用德文发表的文章中提醒德国：汉学应该从东方学副业中分离出来，应该与汉语的教学区别开来，应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由格伦威德尔（Albert Gruenwedel，1856—1935）和勒·科克（Albert von Le Coq，1860—1930）率领的普鲁士中亚探险队本世纪初先后几次在吐鲁番地区的考古发掘，在德国东方学界造成了巨大影响。考察队收集到大批文物和文书归来，其中不乏汉文文献。如何估计这批文书的价值，并进行研究，无疑向德国汉学界提出了挑战。“在评价中文资料对中亚历史研究的意义方面，汉学家在这里正好有发言权。”⑤1904年著名汉学家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在柏林科学院发表题为《中国文献对中亚土耳其和斯堪特民族的认识》的论文；1907年又发表《一份吐鲁番出土的碑铭》。汉学对于中亚研究的意义，提高了它在德国学术界的声誉，使得在德国大学建立学术性的汉学研究机构愈加显得迫切和必要。

1908年，具有官方身份的德国总领事柯纳蒲（Dr. W. Knappe）博士在一篇关于中国研究状况的演讲稿中尖锐地抨击德国大学的保守态度说："遗憾的是德国关于中国的学术性研究状况非常落后。法国遥遥领先，其次为英国，占第三位的是荷兰，第四把交椅俄国还要与德国来抢。其原因要到德国大学对待中国学的态度中去寻找。"他又说："在最小的德国大学里都有印度学和阿拉伯学的教授职位，其中大多数还有埃及学与亚述学。但是整个德国竟然没有一个教授讲座是中国学专业！不仅是对于研究中国历史，而且对于研究那些曾经属于中国文化圈的中亚国家，中文文献中都包含着最为丰富可靠的资料信息。对这些资料的研究必须获得国家的参预和支持，不能都交给有钱的人去做，起码要使那些愿意献身学术的青年人看到自己未来生计无虞。"⑥

进一步为德国大学汉学专业催生的是福兰阁教授。⑦1909年由于德国殖民协会的反复要求，汉堡殖民学院决定设立东亚语言和历史讲座，福兰阁任教授。次年福氏发表《德国汉学学科》长文，呼吁在大学设立汉学系。他说："全德国二十一所大学有十八个印度学讲座教授和八个副教授；有十七个正教授、十二个副教授为闪语学；五个正教授、两个副教授为埃及学；两个正教授、一个副教授为亚述学（在闪语学之外）。"汉学的重要性与其中任何一个学科相比，毫不逊色，却无一席之地。他认为所谓汉学家，应该是真正搞汉学，而不是在其它许多事情之外，把中文作为游戏消遣。他们必须用全部精力献身于东亚文化与历史的研究工作。⑧

(三)汉学学科的建立

1912年——距今整整八十年前，柏林大学汉学讲座在各方面的千呼万唤中，继汉堡殖民学院后终于诞生了！

柏林腓特烈·威廉帝国大学成立于1810年，是当时德国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早在1816年这里就设立了亚洲语言与文学教授讲座，由克拉普若特(J.H.Klaproth，1783—1835)任教授，他以及他的后继人硕特(W.Schott)均兼攻中文。1889年嘎伯冷兹(G. von der Gabelentz)前来就任新设立的东亚语言和普通语言学教授讲座；可惜的是仅四年即1893年他死后，这个位子就空悬着。又隔了二十年成立的汉学研究所才进一步使关于中国学的教学和研究从普通亚洲学，也从普通语言学中独立出来。它与1887年成立的东语所完全不同。东语所讲授实际汉语课程；汉学所的任务则是"研究和传授中国文化知识兼及蒙古和西藏"。荷兰学者、莱顿大学高延(J.J. Maria de Groot，1854—1921)受聘为首任教授兼所长。第二任为福兰阁。福氏的继任者为海尼士(E.Haenisch，1880—1966)。柏林成为德国二十世纪上半叶汉学研究与教学的中心。⑨

1918年，汉堡殖民学院联合汉堡的其它几个学术机构成立汉堡大学。"东亚语言和历史研究所"也分为"中国语言与文化研究所"和"日本语言与文化研究所"。汉堡大学中国所与柏林不同的是，这里纯学术性研究与实际语言教学是合二为一的。这一传统一直保留至今。二战前继福兰阁之后有佛尔克和颜复礼(F.Jaeger)担任该研究所的讲座教授。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大学设立汉学专业的还有莱比锡大学。早在1878—1889年间，G·嘎伯冷兹(Georg v.d. Gabelentz)在那里就以普通语言学教授的身份教授东亚语言。1922年孔拉迪(A. Conrady)正式担任汉学教授。三年以后即1925年，法兰克福大学得到基金会的赞助也设立汉学专业，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担任首任讲座教授。大约与此同时，二十年代哥廷根大学和波恩大学就聘请了有几位获得教授资格(Habilitation)的特别讲师(Privatdozent)讲授中文。三十年代孔拉迪的学生哈隆 (Gustav Haloun，1898—1951) 独力支撑着在哥大建立汉学研究所。高延的学生施密特(Erich Schmitt，1890—1955)则主持波恩大学东方语言研究所的汉学组。

与汉学教研机构相继建立的同时，关于东亚和汉学的杂志纷纷创刊。普通杂志如《中国档案》(China Archiv) 1916年由德中协会创办，发刊词称“该刊宗旨是唤起德中双方相互间的兴趣”。附加中文刊名的《东方舆论》(Ostasiatische Rundschau)，副题称“远东、澳洲和南海杂志”，1919年创刊于汉堡，分“东亚经济”、“立法和法律”、“文化、艺术和科学”、“海外”等栏目，着重报道中德经济贸易情况，由“汉堡—不来梅东亚协会”、“柏林远东协会”等机构编辑出版。《东亚杂志》(Oatasiatische Zeitschrift)是一份重点介绍中国和日本艺术史的学术杂志，创刊于1912年。著名东亚艺术史专家奎玫耳(Otto Kuemmel，1874—1952)任主编。《中国学报》(Sinica)是卫礼贤的“中国学社”1926年在法兰克福创办的学术与普及并重的杂志。当时最负盛誉的学术性杂志是在莱比锡

编辑的《亚洲学刊》(Asia Major)。它的试刊号是1923年出版的纪念德国汉学家夏德75岁诞辰专号。1924年正式创刊，刊名下的副标题是"远东及中亚语言、艺术与文化研究杂志"，实际上以中国学为主。当时正在莱比锡留学的林语堂曾在创刊号上发表过一篇介绍中国音韵学研究书目的文章。

关于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学研究的盛况，福赫伯教授不无自豪的说："二十年代弥补了以往的疏忽，1930年代的德国汉学从教学和研究的职位来说，与欧洲其它国家相比已毫不逊色，除了国立普鲁士图书馆、巴伐利亚图书馆的中文图书从上一个世纪之交以来就不断得到扩充外，出现了更多的大学研究所图书馆，其中汉堡和柏林在图书质量和数量上均居首位。莱比锡的大学图书馆的中文书也十分可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汉学研究和教学条件相当好。吐鲁番考察队出土文书的发现进一步给东亚学研究以有力的推动。柏林民俗博物馆主持的多次考察旅行，获得了许多手稿和印本残片，他们对中亚语言和由汉学所承担的中亚历史的研究具有决定性的促进作用。"⑩

二十世纪上半叶是德国历史起伏最大的时期。1898年德国强占中国的胶州湾，并且划山东省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二十年后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失去了在中国的殖民地。这些政治事件对德国汉学有何种影响？为什么此一时期德国汉学获得显著进步呢？对此德国学者的解释是："1898年德国租借胶州湾后，德国的汉学也曾借此获得推动。但《凡尔赛和约》胶州湾归还中国却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因为它使

1919年以后德国对华关系不再有西方帝国主义对待东亚民族那样的包袱。"[11] 此种说法颇获海外一些华裔学者的肯定。[12] 1921年签定的《中德协定》是近代史上中国第一次与西方强国之间在平等和互不歧视的基础上订立的双边条约。德国在华的发展重点也转向了经济和文化方面。[13]

福赫伯还认为，促进一战后汉学发展的另一些重要因素是欧洲的厌倦感和人们对西方文明绝对优越性的怀疑；较多的普通读者对中国哲学和诗歌的喜爱。这些因素使汉学没有被轻易限制在学术的象牙之塔里。[14] 一些学者如卫礼贤和他创立的"中国学社"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致力于向欧洲传播中国文化的。

---

① Mechthild Leutner: Sinologie in Berlin, in: Berlin und China, S. 38—39. (罗梅君：《汉学在柏林》)

② Mittheilungen des Seminars fue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an der Koeniglichen Friedrich Wilhelms Universitaet zu Berlin, Jahrgang 1(1898), S. 1. (《柏林腓特烈·威廉大学东方语言研究所学报》)

③ 同注①。S. 41.

④ Friedrich Hirth: Ueber Sinologische Studien, T'oung Pao, 1895, S. 364—368. (夏德：《论汉学学科》)

⑤ Fritz Jaeger: Otto Franke(Nachruf). ZDMG, Vol. 99. (1945—1949), S. 19—36. (颜复礼：《福兰阁》)

⑥ W. Knappe: Zum Chinabild in Deutschland um die Jahrhundertwende, in: Asien, VII. Jahrgang, Heft 4(1908), S. 55. 引自：Helwig Schmidt Glintzer: Die Anfaege der Sinologie an Deutschen Universitaeten, in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Newsletter No. 3, 1990. (施密特·格林策尔：《德国大学汉学的发轫》)

⑦ 同注⑤。

⑧ Otto Franke: Die Sinologischen Studien in Deutschland, in: Ostasiatische Neubildungen, S.375, Hamburg, 1911. (福兰阁:《德国的汉学学科》)

⑨ Erich Haenisch: Die Sinologie an der Berlin Friedrich Wilhelms Universitaet in den Jahren 1889—1945, in: Studium Berolinense, Aufsaetze und Beitraege zu Problemen der Wissenschaft und zur Geschichte der Friedrich Wilhelms Universitaet zu Berlin, S.554—555, 1960, Berlin. (海尼士:《1889—1945年柏林大学的汉学》)

⑩ Herbert Franke: Sinologie an Deutschen Universitaeten, S. 13. (福赫伯:《德国大学的汉学》)

⑪ 同上。

⑫ 柳存仁:《从利玛窦到李约瑟》,载香港《明报》月刊,1991年第7期,第87页。

⑬ 丁建弘:《视线所及,永是东方——中德文化关系》。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第13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⑭ Herbert Franke, Sinologie an Deutschen Universitaeten, S.14. (福赫伯:《德国大学的汉学》)

五　卫礼贤和法兰克福“中国学社”

1924年，一位年约50岁的男子从曲阜参拜孔庙后，来到泰山观看日出。晨曦微露，旭日初升，多么壮丽的景色啊！就要离别生活了25年的中国了，不免使他心中生起一阵惆怅。他在向友人写信时说：“从南天门上来，我们置身于一片浓重的雾霭之中。不一会儿，云开一线。太阳升起之际，刹那间云层、平原、山峦，尽收眼底。啊！中国真美啊！这里有多少东西，使人流连不舍。”①

这不是一位即将出国的中国人，而是一位把中国当作第二故乡的德国人，他叫理夏德·威廉（Richard Wilhelm，1873—1930），自取中文名卫礼贤，字希圣。卫礼贤是二十世纪初叶德国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在西方，他以翻译介绍中国古代经典而著名，但是他更受到敬重的，还在于他身体力行为实现莱布尼兹沟通中西文化的理想而作出的不懈努力。他夫人写的回忆录所取书名就叫做：《卫礼贤——沟通中国与欧洲的精神使者》（Richard Wilhelm——Der geistige Mittler zwischen China und Europa）。

（一）悠游于中国学者之间

卫礼贤生于1873年，幼年丧父。在斯图加特中学毕业后，他到蒂宾根（Tuebingen）学习神学和哲学。据他的同学和朋

友奥托教授回忆说：卫礼贤学生时代就喜爱歌德的《中德四季晨昏杂咏》的诗句，这对他后来一生的事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②

1899年，连一句中文也不会说的卫礼贤作为传教士来到中国青岛这块当时还是比较荒芜的小渔村。卫礼贤除了热心于办学校外，把主要精力用在学习中国语言与文化上，他对中国文化着迷了。从1903年开始，他发表了一篇篇介绍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文章，翻译了一本本中国古代哲学经典。

卫礼贤以尊孔而闻名，1912年他在上海参加过陈焕章等发起成立孔教会的活动。他夫人的回忆录曾提到中国人有周馥、周叔弢父子及劳乃宣、赵尔巽等名流。劳乃宣是晚清名儒，卫礼贤在青岛时认识他，二人志趣相投。卫礼贤师从他学习儒家经典。卫氏在青岛筹备尊孔文会，特聘劳乃宣共襄其事。劳氏为之撰写碑文称扬。《清史稿》卷472《劳乃宣传》及《桐乡劳先生年谱》对此均有记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卫礼贤曾短期回国，后来在德国驻华使馆任学术顾问。离职后受聘任北京大学德国文学教授。在北京期间他结识了许多著名的中国学者，多方奔走，想联合中德双方创办一个“东方学社”。1920年他就有此计划，但是因缺乏德国方面的经费支持难得落实。按照卫礼贤的设想，东方学社的宗旨是沟通东方和西方之间的理解，特别注重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科学联系起来。因此学社计划设“伦理宗教”部和“科学”部。1923年东方学社筹建工作有很大进展。拟订的章程指出：“中国有数千年的没有中断的文化传统。近几十年，欧美人民因饱尝战争之苦，认识到在强权和枪杆之外

还有另一条通向真理之路。因而纷纷注重研究东方文化。本会以研究中华文物制度为己任，研究古代经籍和历史的关系，以图洞悉国家和社会治乱之根源。”理事会成员有罗振玉、王国维、沈曾植、辜鸿名等，卫礼贤是唯一的一位外国人，也是负责学社具体工作的联络人。③

卫礼贤也向中国介绍欧洲哲学。1924年他应邀在北京大学作关于老子、孔子和康德的伦理学的比较研究的学术报告。这是当时康德学会的一项活动。卫礼贤自己说：“我想借此机会向听众介绍一点真正深刻的西方哲学，因为这些年从美国引进来的怀疑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实在令人可怕。”④看来卫礼贤在对待西方哲学上，也是有些“好古”的。

在当时的北京文化界，卫礼贤是比较活跃的。卫礼贤从小酷爱音乐，而且具有这方面的天才。据他夫人事后回忆，在卫礼贤举办的“北京之夜”活动中，许多欧美学者、名人被邀请前来欣赏中国艺术家的音乐节目；中国朋友则应邀观赏西洋音乐。他们当中有诗人徐志摩、京剧艺术家梅兰芳和当时任教清华的梁启超等等。⑤卫礼贤对梁启超十分推重。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以率领中亚考古工作队知名的斯文赫定博士二十年代曾请卫礼贤给他提几位中国著名作家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卫氏提出的名单中，第一名就是梁启超。⑥这到是鲜为人知的一段趣事。

（二）法兰克福“中国学社”

1924年，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授予卫礼贤名誉哲学博士。寻又聘其为荣誉讲座教授和汉学系主任。卫氏在登程回国前，

参拜过孔庙，告别了朋友。还特别去看望了当时蛰居青岛的康有为和在那里的尊孔文社，他回忆说："康有为潜心于研究古典作品，当他听说法兰克福大学新成立汉学研究所，也十分高兴。临别时还赠送给我古代书画和他自己发表的著作。"⑦

卫礼贤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他生活了25年的中国，回到了故土。但是，"卫礼贤来到中国时，是一名神学家和传教士；他离开中国时却成为孔子的信徒"。卫礼贤的挚友、著名新儒家张君劢在悼念文章中这样写道："他曾对我说：令我感到欣慰的是，作为一个传教士，在中国我没有发展一个教徒。"⑧

在法兰克福，卫礼贤最倾注心力的一件事是筹设"中国学社"(China Institut)。他在谈到为什么要办学社时说："关于"中国学社"的设立，是考虑到我们正处在一个政治和文化上的新时代，在欧洲文明之外，还有处于同等重要地位的美洲文明、东亚文明等等。德国处于西欧和东方的中心，在文化上加强东西方交流十分必要。众所周知，莱布尼兹在他那个时代就计划在柏林设立一个科学院，在北京也建立了一个类似的机构，双方进行合作。但是当时的历史条件还不成熟，如今给我们提供了实现莱布尼兹未竟之业的良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在北京正在筹备一个中国学研究所，将跟我们合作。这也是促成我们成立"中国学社"的一个因素。⑨

1925年11月14日，中国学社正式成立。全体理事50人及会员100余人参加了成立大会，庆祝会后还举办了一个"中国版画木刻展"。卫礼贤在一封信中说："中国学社终于成立了！我在此间的民俗博物馆里拥有一间半房间……我弄来了一些家具，一位来访的女士说，整个布置很有特色。但对我来

说，最为难得的是，我找到了一位中国人罗博士作助手，我真希望自己能从他身上寻回在中国时的感觉。”⑩

中国学社在慕尼黑设立了一个分部，并计划在柏林和汉堡也建分部。学社的主要工作是编辑杂志，主办各种类型的中国文化报告会、展览会。如1926年学术报告会的主题是“东方和西方”，重点是讨论中国的文学和艺术。报告人有中国的胡适：《中国的小说艺术》；法国伯希和：《中国的戏剧》；德国柏林的鲍恩慈(Ernst Boerschmann)：《中国的建筑艺术与景观》；其它还有《欧洲艺术中所反映的中国绘画》、《中国的青铜艺术》等等。讨论会期间还举办了一个“中国艺术展”。其中“中国建筑艺术与景观”展台设在法兰克福的艺术家协会，展品来自公私藏家；“中国青铜器”展台在民俗博物馆；而在工艺美术博物馆则展出东方手工艺品。市画廊还有一个东方艺术部。卫礼贤在节目单上印上了“四海之内皆兄弟”及歌德的“东方和西方永远不再相隔”的名言。并且又一次重申说：“这所设在德国的中国学社旨在沟通东西。从欧洲方面来说，它的作用在于帮助理解中国文化的永恒意义。……我们是否在拥有自己的文化的同时，也真正理解其它文化，我们是否能够吸取其它文化中有用的东西？”⑪这些话在欧洲中心主义时代，确实是振聋发聩。五十多年后，瓦拉文斯(H. Wairavens)博士在编辑《法兰克福中国学社》、《中国学报》及所出其它出版品目录与索引时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对中国的兴趣达到了一个高潮。我们应该特别感谢卫礼贤，他有那么多译作、论著，作了那么多学术报告。不仅是为了建立一个学术性的汉学，而且也为了建立一个为普通大众所接受的汉学，卫礼

贤在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创立了这所中国学社。"[42]

与卫礼贤共事的奥托教授说："中国学社建立起东西方文化的联系，也是中国留德学生之家。"[43] 事实确实如此。如1927年3月，中国学社邀请所有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假期到法兰克福集会，共有63位男生，3位女生出席。大家被安排在学生宿舍或中国学社社员家里住宿。除了听报告外，还有参观、郊游等。学生们临别前希望今后还有这样的活动。结果这年夏季法兰克福举办的为纪念贝多芬逝世100周年"音乐之夏"活动，中国学生又再次汇聚在法兰克福。"中国音乐周"正好与中国学社的年会都安排在8月上旬。展览大厅呈列着各种中国民族乐器，来自巴黎、里昂、布鲁塞尔和德国各地的中国留学生成功地提供了五天的中国民乐演奏节目。音乐会的高潮是仿照祭孔仪式，按照"周礼"为贝多芬举行的祭祀大典，真可谓中西合璧。卫礼贤作了"中国戏剧的起源"等报告，是这场活动成功的组织者。他主编的《中国学报》(Sinica)还为此出了一个"音乐专号"。

许多访问德国的中国学者也受到卫礼贤的热情接待。1928年徐志摩到欧洲旅行，受官方委托考察欧洲的艺术博物馆，以便在南京建立一个类似的艺术中心。徐曾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拜访过卫礼贤。卫礼贤带他访问了各种各样的博物馆。1925年蔡元培游历欧洲，在汉堡大学研究民俗学，卫礼贤曾向法兰克福大学提过授予蔡元培名誉博士学位的事。

(三)鞠躬尽瘁译介儒家经典

早在中国期间，卫礼贤就致力于儒家经典的翻译工作。

1910年他在耶拿出版了《论语》的德文译本。次年译出老子《道德经》。然后是《列子》(1912)、《庄子》(1912)、《孟子》(1914)。回国后他继续翻译出版了《易经》、《礼记》和《吕氏春秋》等名著。

关于卫礼贤在汉学上的贡献，德国著名汉学家福赫伯有如下一段评价："儒家和道家经典著作所反映的中国思想世界一般来说没有受到德国哲学界的重视。只有极少数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里或课堂上多少提及一点中国哲学。有一阵子读书人对中国思想的兴趣变得浓厚起来，这首先要归功于卫礼贤。他在世纪之交作为新教教士去中国，返回德国后越发感到传教士有利于传播中国文化。他那数不清的著作已经或多或少地把中国的形象印刻在德国读者的心中。卫礼贤的翻译作品从整个成就来看不会很快被超过，至今几乎还没有更新的中国古典哲学著作的德文译本问世。"⑭

卫礼贤的所有译作中，以《易经》的翻译最享盛誉，"具有特别大的影响力"。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和德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塞(Hermann Hesse，1877—1962)也为这部书所吸引。⑮荣格曾在《易经》英译本前言中盛赞卫礼贤的德文译本"在西方，它是无与伦比的版本"。"他掌握《易经》原文的灵活意思，这使他的《易经》版本在看法上具有一种深度，那是仅凭对中国哲学的学术知识不可企及的"。⑯近年来再版重印卫氏《易经》德译本，也畅销不衰。

卫礼贤研读《易经》的入门老师是劳乃宣。在青岛时他就着手翻译这部奇书，至1925年《易经》的德文译本出版，历时十

多载。卫礼贤为此写道："中国思想学说的基础在于《易经》，老子的道教和孔子的儒教一样均源于此。这部奇书大概产生于远古时代，至少它的基本概念是如此。历经时代的变迁，三千年最成熟的生活的智慧渐渐集中在围绕着本文的注解和诠释上。而其对东方思想生活的影响一直存在到今天。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接触的这部书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部作品。"⑰

卫礼贤翻译的《吕氏春秋》出版于1928年，被西方汉学界誉为开创性的贡献。卫礼贤晚年为研究中国文化和翻译中国古籍，可谓呕心沥血，鞠躬尽瘁。1929年，他死前一年完成了《中国文化史》的书稿，该书七年后出版，并译成英文和法文。书稿甫竣，他就因病住院了。他的夫人回忆其病中仍勤奋工作的情形说："他经常是清晨就起来翻译。有时如果因为来访或其它工作耽误了翻译工作的话，他晚上便一直工作到深夜。《中国学报》的编辑也曾被礼贤从床上叫起过。他对照料他的护士开玩笑说，你应该让我活到我把工作做完。"⑱不幸的是年仅57岁，这位可敬的学者就赍志以没了。

对于卫礼贤，尤其是卫氏的尊孔，"批儒批孔"的年代曾有刻薄的讨伐之词。苛责一位醉心于儒家哲学，苛责一位对翻译介绍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功劳卓著的传教士出身的汉学家，是毫无道理的。从尊孔文社，到东方学社，再到中国学社，卫礼贤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研究和宣传中国文化事业，致力于架起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桥梁，厥功甚伟，不可泯没。

卫礼贤这样人物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张君劢先生说："如果比较一下福兰阁发表《汉学学科在德国》的时代和卫礼贤从

中国回国时的情况，人们就会发现，这期间的变化该有多大。福兰阁非常形象地描述了三四十年前人们是如何抱着种族优越感来看待东亚民族。（一战）战后的情况则完全相反，人们对东方的兴趣大增，希望在那儿寻求人生的智慧。汉学的拓荒者福兰阁、佛尔克该为此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努力。"⑲

---

① Salome Wilhelm: Richard Wilhelm——Der geistige Mittler zwischen China und Europa, Eugen Diederichs Verlag, Duesseldorf Koeln, 1956.（莎珑·卫：《卫礼贤——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精神使者》，第302页）

② 同上，第8页。

③ 同上，第290—291页。

④ 同上，第294页。

⑤ 同上，第295—296页。

⑥ 同上，第297页。

⑦ 同上，第302页。

⑧ Carsun Chang: Richard Wilhelm, Der Weltbuerger. in: Sinica V, S. 72, 1930.（张君劢：《世界公民卫礼贤》）

⑨ 参见同注①，第327页。按此处所提中国北京将建立的研究所应指1925年2月筹建的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简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吴宓主持其事。

⑩ 同上，第325页。

⑪ 同上，第339—340页。

⑫ Hartmut Walravens: Sinica und andere periodosche Publikationen des Frankfurter China Institut, Bibliographie und Register, 1925—1942, Muenchen, 1981.

⑬ Walter F. Otto: Richard Wilhelm, Ein Bild seiner Persoenlichkeit, in: Sinica V. S. 56. 1930.（瓦尔特·奥托：《卫礼贤的人格形象》）

⑭ Herbert Franke: Sinologie an Deutschen Universitaeten, S. 17—18, Wiesbaden, 1968.（福赫伯：《德国大学的汉学》）

⑮ 同上，第18页。

⑯ 荣格：《〈易经〉英译版前言》，楼格译，载山东大学《周易研究》1991年第2期，第32页。

⑰ 同注①，第313页。

⑱ 同上，第382页。

⑲ Carsun Chang: Richard Wilhelm, Der Weltbuerger, in: Sinica V. S. 71. 1930.（张君劢：《世界公民卫礼贤》）

六　外交官出身的汉学家

——福兰阁和佛尔克

1947年汉堡大学教授颜复礼（F.Jaeger）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说："这真是罕见的巧遇，刚刚过去的四十年代中叶，欧洲最重要的四位汉学家相继遁归道山。他们是：法国的马伯乐（1883—1945）、伯希和（1878—1945），德国的佛尔克（1867—1944）和福兰阁（1863—1946）。"法国的伯希和与马伯乐以其敦煌学和中亚史上的杰出成就为我国学术界所熟悉，而德国的两位学者在汉学上的贡献则少为人知。

十九世纪末，随着德国在东方的政治势力和贸易关系的加强，柏林大学东方语言研究所受到德国外交部的资助，中文教学也日益兴旺。在这里接受中文培训者中，那些原来学习法律出身的，尤其前景看好。毕业后一般都在驻华外交和商务机构当翻译或职员。二十世纪初叶，他们中的一些人回到德国已经是饱读汉文诗书之士，大声疾呼在大学设立汉学专业，他们本人也就成为大学教授。由于这些人本来就是博士或硕士，又在中国生活多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中文修养非一般人所及，经过刻苦潜心的研究，便成为蜚声西方学术界的汉学大家。这种情况法国、英国与荷兰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就出现了，牛津、剑桥和莱顿大学汉学机构都是这些人创立的。

在后起的德国则晚了许多年，他们在西方被称作“翻译员出身的汉学家”（Dolmetscher Sinologen）。这一代人中虽有深怀殖民情结者，但也有许多人对中国文化极具好感，并且研究有素，代表着当时欧洲汉学研究的水平。福兰阁和佛尔克就是他们在德国的代表性人物。

（一）福兰阁的中国通史研究

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出生于德国中北部的一个小城市（Gernrode），父亲是这个城市的市长。他中学毕业后最初在柏林大学学习历史，后来受到印度日耳曼学家史密特（Johannes Schmidt）一番关于梵文对比较语言学研究重要性的生动介绍，乃决定到哥廷根大学攻读梵文，并于1886年取得博士学位。随后他又在柏林大学读了两年法律课程——这是当时申请做外交官的必要条件。同时他还学习中文，是东语所第一期毕业生。后来作为外交译员被派到中国，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德国公使馆服务达十三年（1888—1901）之久。1903年至1907年他受聘任清政府驻柏林公使馆秘书。并在柏林大学取得教授资格，次年临时被派往青岛负责筹办中德高等专门学堂，清政府派员外郎蒋楷为学堂总稽察，与之接洽。①

1909年汉堡殖民学院（Kolonialinstitut）创办东亚语言与历史研究所，福兰阁应聘为教授并担任所长。1911年他出版了《东亚新貌》（Ostasiatische Neubildungen），这是作者在华期间为《科隆日报》所写的时事报道和评论的结集，②可以说是一部“清末社会政治变迁目击记”③。随后他发表了研

究宋代《耕织图》的论文和《"春秋"和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为撰写一部中国历史广泛搜集资料。福兰阁是汉堡"德国学者联盟"主席，柏林普鲁士科学院院士。1923年至1931年任柏林大学汉学教授兼所长，成为其事业的峰巅。

福氏在德国汉学界享有"元老"之誉。于汉堡和柏林汉学研究所的建立和发展，均居功甚伟。在汉堡，他曾礼聘清末最后一位翰林商衍鎏(1875—1963)先生来任教(1912—1916)。④至今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图书馆的一些卡片，还有商先生的手迹，商先生的哲嗣商承祖(著名古文字专家商承祚先生的兄弟)也曾在该系教书，在汉堡出版过一本《中国"巫"史研究》(1934)的小册子，后来任南京大学德文系教授。在柏林，当年的留德中国青年学生蒋复聪、俞大维、姚从吾等人，都曾参加过福兰阁的讨论班课程。⑤三十年代后在德国学术界崭露头角的汉学家，泰半曾向他执弟子礼。⑥

福氏一生著述不辍。共发表文章和著作200多种，书评100多篇。其中最负声誉的是五卷本《中国通史》。该书第一卷讲先秦到汉末的历史；第二卷讲晋唐时期的历史；第三卷为第一、第二卷的注解和史料考释，这三卷出版不久就有高山洋吉1938年的日译本。⑧该书第四卷叙述五代辽宋金元时代的历史；第五卷为第四卷的注解和史料考辩。由于纳粹时期研究条件的恶劣，耽误了作者的写作进程，无法完成全书，最后一卷还是其死后由子女整理出版的。

福氏的《中国通史》第一卷于1930年出版以前，在欧洲已有几部关于中国历史的概述性著作出版。⑦但是大都属于简易读物，而且不是出自行家手笔，有些还是据第二手资料写

成。1925年斯文赫定曾建议刚从中国回国的卫礼贤说："您应该写一部中国历史，我想象不出比这更美妙更伟大的任务了。全世界都期待着它的问世。它比发现任何一颗新的行星不知要重要多少倍。"⑧可见当时学术界对一部详尽的中国历史著作是如何殷切企盼。

既具有史家的眼光和训练，又了解和热爱中国文化，这是福兰阁高出于他的前辈的地方。他独力依据原始中文资料、正史和《资治通鉴》编写的这部煌煌大著，使德国汉学在西方学术界的水平提到一个新高度。作者在第一卷《序言》中回顾了西方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看法，尖锐批评了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黑格尔等对中国历史的偏见。今天看来，半个世纪前开始发表的这部大书，也许已经落伍。但是从历史的眼光看，它却在西方第一次用丰富的历史事实纠正了十八世纪以来冯秉正依据《通鉴纲目》编译的中国历史所造成的谬误。中国史不再是一个循环而无变化的重复。对此德国汉学界有如此的评价："我们的中国历史知识直到不久前还几乎全靠冯秉正（De Mailla）编纂的《中国通史》，这本大部头的书其实只是充满了儒家道德说教的朱熹的《通鉴纲目》的改编。福兰阁在《资治通鉴与通鉴纲目》一文中对宋代的这两部历史书作了研究，并且证明，西方用作主要史料来源的《通鉴纲目》其实算不得一部历史著作，而是按照一定的伦理政治观点剪裁的事件汇编，其中还包含着错误。……如果像兰克这样的历史学家竟然也认为中国历史应排除在观察之外，理由是它对人类的思想进步无所贡献，那么每位对历史感兴趣的人通读过福兰阁的这部著作，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确认：

中国历史其实是整个人类发展中最重要的、最富有教育意义的和最吸引人的那一部分。"⑨

(二)佛尔克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佛尔克(Alfred Forke,1867—1944)出生于下萨克逊的不伦瑞克(Braunschweig)。中学毕业后先后在日内瓦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法律,1890年取得法学博士学位,这时他已经同时完成了在柏林大学东方语言研究所的中文培训课程,具备任外交译员的资格,并于同年到北京公使馆供职。这期间他广泛地涉猎中国古籍。从他在1898年创刊的《柏林大学东方语言研究所学报》上发表的《从北京到长安和洛阳》的长篇文章,可以看出作者中文知识的渊博。1903年他辞职回国,担任柏林东语所教授,并曾任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客座教授,一战期间均在美讲学。1923年开始担任汉堡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长,直至1935年退休。

佛尔克潜心于学术研究,是一位既有天分又十分勤奋的学者,受到德国学术界的敬重。他70岁生日和逝世时,《中国学报》(Sinica)与《亚洲学刊》(Asia Major)曾分别发表过纪念专号。著名学者海尼士在纪念文章中总结了佛氏的三个方面的学术成就。⑩一是语言、文字和民俗。代表作有1911年出版的《衙门与报刊》,这是柏林东语所使用的古汉语教本,内容包括课文翻译和词汇表等。二是汉代和唐宋诗歌的翻译。三是关于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和哲学史的研究。这是佛尔克最主要的成就。

首先是翻译和介绍古典文献。他最有名的翻译作品是

1906年开始连载发表后来又出版英文单行本的《论衡——王充哲学散文选》和1921年全译《墨子》。它们是第一次译成欧洲文字，在中国哲学概念术语的翻译和界定上具有示范性意义。《论衡》的翻译使他获得以法国汉学家命名的“儒莲奖”(Stanislas Julien Preis)。他还是第一位研究晏子和《晏子春秋》的西方学者，著有《政治家和哲学家晏子与〈晏子春秋〉》。其次是关于中国哲学的专题论述，1925年和1927年分别以《中国人的世界观》、《中国文化的思想世界》为题出版。后者用西方哲学概念系统阐述中国哲学思想，共分“逻辑学和知识论”、“形而上学”、“自然哲学”、“心理学”、“伦理学”及“国家与法哲学”等六大部分。佛氏最受重视的著作是三卷本《中国哲学史》。第一卷《中国上古哲学史》出版于1927年，叙述先秦哲学；第二卷《中国中古哲学史》出版于1934年，讲汉代到宋代哲学；四年后即1938年出版第三卷《中国近世哲学史》，叙述明清至二十世纪的哲学。全书介绍了150多位中国哲学家，主要取材于中文原始资料，包含大量的译文和注释。福赫伯评价说：“这部书受到一些批评毫不奇怪，因为如此宏篇巨制，实非一人能力所及。但是佛氏的著作取材宏富，又对原文严加考辨分析，一些不太出名的思想家和作者也没有被忽视，故长期以来它都是西文著述中有关中国哲学史的最便利、完备的参考书。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后人难以企及的哲学史著作。”⑪

海尼士也说：“佛尔克的《中国哲学史》与嘎伯冷兹《中国文言语法》、顾鲁伯《中国文学史》和福兰阁《中国通史》一样，是代表德国汉学研究水平的巨著。他本人也因此而长期享名于东方学界。”⑫

① Fritz Jaeger：Otto Franke(Nachruf)，ZDMG，Vol.99(1945—1949)，S.19—36.（颜复礼：《奥托•福兰阁》）

② Otto Franke：Ostasiatische Neubildungen，Beitraege zum Verstaendnis der Politischen und Kulturellen Entwicklungsvorgaenge im Fernen Osten，Hamburg，1911.（福兰阁：《东亚新貌》）

③ 见Wolfgang Franke：Otto Franke und Sein Sinologisches Werk，Basel：Sinologica(1948)，Vol.1，S.352—355.（傅吾康：《福兰阁及其汉学著作》）

④ W.von Melle：Dreissig Jahre Hamburger Wissenschaft 1891—1921.2 Bande，Hamburg，1923/24，II，S.152.（墨勒：《三十年来的汉堡学术(1891—1921)》）

⑤ 此据福兰阁之子傅吾康的已故夫人胡雯吟女士的回忆。

⑥ 1938年东学社版，共三册。见梁容若：《现代日本汉学研究概观》，第26页，台北艺文印书馆，1972年。

⑦ 如：Rev.J.MacGowan：Imperial History of China，上海，1906；Lic.Wilhelm Schueler：Abriss der neueren Geschichte Chinas unter besonderer Beruecksichtigung der Provinz Schantung，上海，1912；Dr.Heinrich Hermann：Chinesische Geschichte，Stuttgart，1912，作者序文作于广东；Arthur Rosthorn：Geschichte Chinas，Stuttgart-Gotha，1923，该书为《通俗世界史》(Weltgeschichte in gemeinverstaendlicher Darstellung)丛书的一种。

⑧ Salome Wilhelm，Richard Wilhelm，Duesseldorf-Koeln：Eugen Diederichs Verlag，1956，S.297.（莎珑•卫：《卫礼贤》）

⑨ 同注①。

⑩ Erich Haenisch：Alfred Forke(Nachruf)，in：ZDMG，Vol.99 (1945—1949)，S.2—6.（海尼士：《阿尔夫若德•佛尔克》）

⑪ Herbert Franke：Sinologie an deutschen Universitaeten，Wiesbaden(1968)，S.19.（福赫伯：《德国大学的汉学》）

⑫ 同注⑩。

七　土生土长的"莱比锡学派"

——孔拉迪及其弟子们

在那些从中国回来的外交官出身的汉学家叱咤风云之际，在莱比锡另有一批德国学者，很少或者根本未到过中国，是德国"土生土长"的汉学家。

莱比锡的汉学家最初是从普通语言学和东方语言学脱胎而转向汉学的，所以以语言研究为基础便成为他们的一个明显特点。

1878年著名学者嘎伯冷兹(G. v. Gabelentz)就在莱比锡大学担任东亚语言和普通语言学教授。虽然不是汉学讲座，但也不同于柏林的东方语言训练课程，相比之下莱比锡更多一点学术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人认为"嘎伯冷兹在莱比锡大学建立了当时德国第一个东亚语言讲座 (Lehrstuhl fuer Ostasiatische Sprachen)"，[①]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1889年嘎氏移帐柏林，莱比锡的讲座便虚悬多年，直到孔拉迪(August Conrady，1864—1925)1897年接任，至1922年始成立汉学讲座。孔拉迪在莱比锡数十年，培养了很多人才，与其弟子共同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在二十、三十年代的德国汉学界有一定影响。我们姑且名之为"莱比锡学派"。

(一)孔拉迪和莱比锡学派

孔拉迪1864年出生于德国的威斯巴顿(Wiesbaden),父亲是位牧师,兼宗教史和语言学家。外祖父是一位著名的东方学家,属于德国第一代梵文学者。孔拉迪最初在大学学习古典语言学和考古学。后来转向比较语言学,重点是梵文。因为自印度日尔曼比较语言学建立以来,梵文即是比较语言研究的最重要的方面。在维尔茨堡大学完成博士论文后,1891年又在莱比锡大学以印度支那语言为题通过了教授论文。进而又研究藏文、泰语、中文,后者并且成为他终身的主要事业。1903年,受聘到北京大学教授德国语言文学。但他觉得在中国教德文影响他的汉学研究,只是夫人的一再催促,才勉强成行。两年的合同他只呆了八个月就回国了,他宁愿在书斋里读中国古书,而不想继续在北京教德语。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中国,后来著有《北京八个月》(Acht Monate in Peking)记其事。②

孔拉迪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首先他继承了其前任嘎伯冷兹对语言学的研究传统。他早年发表的《印度支那语使役动词和派生动词的构成》③被誉为开辟了汉藏语言比较学研究领域的著作。尔后他在《亚洲学刊》发表过一系列汉藏语言比较的论文。孔氏比较语言学研究的另一项成果是他去世那一年出版的《东西方的古文化词汇》(Alte Westoestliche Kulturwoerter,1925),研究古代汉语中的印欧外来语成分。他的纯古汉语的研究论文也不少。但是孔拉迪又不仅仅是局限于纯语言的研究,而是扩及文化、历史、民俗、民族等研究领

域。他对中国上古文明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凡成绩。他的《易经研究》一书提出八卦是最原始的文字符号，易经是中国文字的起源的观点。

孔拉迪最受称道的一部著作是1910年发表的《乌尔斯泰世界史》(Ullsteins Weltgeschichte)，该书第三卷介绍中国历史。由于他善于从比较民族学、比较语言学的角度来进行研究，使他的论述能给人以丰富的思考。1920年他在斯德哥尔摩出版的《斯文赫定楼兰所获汉文写本与其它文物》(Die Chinesischen Handschriften und Senstigen Kleinfunde Sven Hedins in Lou-lan)，反映了作者对中国边疆民族史的研究兴趣。1925年孔拉迪去世，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他主编的《通报》上著文悼念，称孔拉迪的去世是汉学界的"巨大损失"，认为孔拉迪的汉学成就特别是语言学上的贡献是同时代西方汉学家所难以企及的。以前的汉学家解释中国经典，只是依据或翻译中国古书的旧注，而孔拉迪则是第一个从社会学、宗教历史学的角度去解释古史，并因此而创造了一个学派。④

孔拉迪遗留下的手稿比他发表的东西远远要多得多。《亚洲学刊》主编申得乐曾将这些遗稿列了一个详细清单，计有语言学方面的手稿59份；语法学方面69份；文学史方面88份；古地理方面16份；宗教方面39份；艺术史方面14份；历史与文化史方面105份，共390份。孔氏的这些手稿中绝大部分是研究先秦语言、历史、地理和宗教文化的。如他研究古汉语虚词"何"、"式"、"止"、"思"、"其"、"兮"、"言"等，举证几乎都是出自《诗经》、《楚辞》等先秦典籍。孔氏也研究中国边

疆民族语言，手稿中关于藏语的至少有8种。⑤

1931年，孔拉迪的女婿及得意门生艾克斯（Eduard Erkes）教授将孔氏的《〈天问〉——中国艺术史上最古老的文献》整理出版。⑥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为此发表书评说："艾克斯教授娴熟地整理了大师的这部遗著，并以精美的装帧出版，其价值与意义是无庸置疑的。因为它的作者是孔拉迪。""翻译的学术性、注解的丰富和文化史的眼光使该书成为近年来最重要的汉学著作之一。"高本汉对孔氏的治学风格及其弟子也有述说："孔氏是一位卓越的中国上古研究专家。他具有丰富的见解，独到的睿识，却相对地较少发表论著。他的思想首先直接传授给了他的学生。他的学生们也始终不渝地忠实地继承了他的衣钵。"⑦1936年颜复礼教授论及莱比锡的汉学时也提到："思想丰富的孔拉迪创建了莱比锡的汉学。从中产生了像艾克斯、申得乐、魏勒、哈隆等一批学者。莱比锡汉学不仅置身于蓝普若希特（Lamprecht）的宏观世界历史之下，⑧也受到普通民俗学某种程度的影响。虽然孔拉迪有时也涉猎印度支那语言的研究，但是他的主要兴趣则是上古和古代中国及该时期的语言。这种学术传统一直保留到今天。"⑨可见莱比锡学派的治学特点是得到了学术界公认的。

（二）出身莱比锡的孔门弟子

孔拉迪的学生很多，成名者也不少。如韦德玛耶（Andre Wedemeyer，1875—1958），在任莱比锡大学世界文化与历史研究学院东亚部主任时，就师从孔拉迪学习汉学。⑩劳佛（Berthold Laufer，1874—1934），先就读于柏林，后在莱比锡获得

博士学位。著有《藏语语音学研究》、《藏人鸟卜》和《藏文名称的汉文转写》等，是国际著名的藏学家。但是公认的莱比锡学派的传人则主要是哈隆、申得乐、魏勒和艾克斯等人。艾克斯我们在后文谈原东德汉学时再另加叙述。

古斯塔夫·哈隆(Gustav Haloun，1898—1951)出生于奥地利。开始在维也纳，后来在莱比锡大学学习汉学、日本学、上古史和宗教学。1923年他在孔拉迪指导下，完成了《中国部族移民史》(Siedlungsgeschichte Chinesischer Clans)的博士论文。这部书讨论上古时代中华氏族和部落的迁徙问题，1924年以英文发表的《中国古代部落分布论集》就是其中的一部分。⑪其内容论及北边的嬴姓，南部的三苗，东部的夷，西部的犬戎等部族的历史。哈隆1925年发表的《中国上古史辨伪》则是其上古历史研究的副产品。三十年代他还研究过先秦儒家著作和先秦诸子，如《逸周书》、《诗经》、《孟子》、《管子》等。福赫伯称"哈隆是西方少数能够真正研究金文的学者之一"，他在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方面都有造诣，他对古典文献作文字考据的工夫赢得著名学者高本汉等人的普遍赞誉。哈隆的力作之一《中国人知道大夏人或印欧人始于何时》(Seit Wann Kannten die Chinesen die Tocharer oder die Indogermanen Ueberhaupt) 1926年在莱比锡出版后，马伯乐等西方学者共发表了11篇书评（按此处大夏人指吐火罗人）。他的《关于"月氏"问题》(Zur Uee-Tsi Frage) 也在西方汉学界获得好评。⑫哈隆从语言文字学和民族学方面研究中国古史，可谓深得孔拉迪的莱比锡学风正传。

哈隆嗜书如命，购求汉学图书，不遗余力。1927年，他曾在哈勒(Halle)致力为德国东方学会（DMG）图书馆建立一个中文部。1930年至1931年冬学期他应聘到哥廷根大学任教，1934年任教授。当年在此研究梵文的季羡林先生常常奉命向琉璃厂等中国书店邮购古籍。在短短的几年间，哥廷根大学汉学图书便具相当规模。⑬ 1938年11月，哈隆应聘到英国剑桥大学任汉学系教授兼系主任。直至逝世都致力于剑桥中文图书建设。1949年他到中国和日本，主要就是为了搜购汉学图书。有人说："剑桥今日之所以能成为欧洲最好的汉学图书馆之一，首先应归功于哈隆。"⑭

《亚洲学刊》(Asia Major) 的创办人及主编布鲁诺·申得乐 (Bruno Schindler，1882—1964)也是孔拉迪的重要传人。他1915年和1916年在柏林《东亚杂志》(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发表的《中国文字基本构成要素的演变》和《中文造字原理》两文，虽然在结论上已被新的出土文物所否定，却是德语区早期较罕见的研究古汉语史的作品。在《亚洲学刊》他还发表了一些研究古汉语虚词如"其"、"厥"、"乃"、"之"等连载。在上古史研究方面申氏的代表作有专著《中国上古的巫师》(1919)和论文《中国上帝观念的演变》(1923)、《中国古代的旅、埋、郊祀典》(1924)等，后文主要依据《尚书》及其它古文献探讨先秦的旅(出征)、埋、和郊等祭祀典礼。⑮

与纯学术贡献相比，申得乐最为人知的还是他创办《亚洲学刊》(Asia Major)。据海尼士的回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通报》(T'oung Pao) 不刊登德国学者的文章。因此除了普通东方学杂志外，几乎没有可供德国汉学家发表论文的

园地。因此 1924 年申得乐创办《亚洲学刊》作为亚洲学特别是汉学的专门杂志，便成为一件大事。该刊得到柏林民俗博物馆馆长米勒(F.W.K.Mueller)的大力支持。发表了许多有水平的论文，很快成为有国际声誉的汉学及东亚学学术杂志。1936年由于希特勒的种族迫害政策，申得乐被迫离开德国。战后在伦敦继续编辑《亚洲学刊》。但它已经不是德国的期刊了。海尼士高度赞扬申得乐主编老《亚洲学刊》的贡献，称他是建筑"德国汉学的老板"(Ein Bauherr der Deutschen Sinologie)。⑯

申得乐的同学兼同事弗里得里希·魏勒(Friedrich Weller，1889—1980)出身于德国南部一个小提琴制作师家庭。在莱比锡期间兼攻印度学及汉学。他跟孔拉迪做的教授论文是《梵文、中文与东亚宗教史》(Sanskrit,Chinesisch und Ostasiatische Religionsgeschichte)，尔后魏勒的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基本上便围绕着佛教、梵文、中国佛学史而展开。《亚洲学刊》创刊，魏勒也是主编之一。1930年，由于海尼士的帮助，魏勒得以赴华在燕京大学中印研究所任教。回国不久出任莱比锡大学印度学教授。他开设的课程有"梵文"、"巴利文"、"古汉语"、"古藏语"、"古蒙文"及其它佛教历史课程如"玄奘《大唐西域记》"和"义净《南海求法巡礼行记》"等。威廉·饶(Wilhelm Rau)教授这样说："评价他(指魏勒)的全部学术成就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因为其治学范围太广，而且还因为，我们今天没有人能像他那样熟练地掌握如此众多的语言。"⑰

总之，如果说哈隆着重继承了孔拉迪先秦文化和历史研

究的传统；申得乐更多地继承了孔拉迪纯古汉语研究的传统，那么显然，魏勒则偏重发展了孔拉迪研究梵文及中国边境民族语言和历史的一面。他们各人的治学范围和成绩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了他们的老师。但是在整体上又都保持和反映了孔拉迪创造的学术特色。

---

① Eduard Erkes:Georg von der Gabelentz und August Conrady, in:Karl Marx Universitaet,Leipzig (1409—1959)——Beitraege zur Universitaetsgeschichte, Erster Band, S.1, Verlag Enzyk ldopaedie,Leipzig,1959.(《莱比锡大学（1409—1959）历史论文集》，第一册)

② 同上，第451—457页。

③ Eine indochinesische Causativ-Denominativ-Bildung und ihr Zusammenhang mit den Tonaccenten, ——Ein Beitrag zur vergleichenden Grammatik der indochinesischen Sprachen,insonderheit des Tibetischen, Barmanischen und Chinesischen, Leipzig,1896.

④ Paul Pelliot:Auguste Conrady (1864—1925)T'oung Pao(1926), Vol.24,S.130—132.(伯希和：《奥古斯特·孔拉迪》)

⑤ Bruno Schindler:Der Wissenschaftliche Nachlass August Conradys,Asia Major, Vol.3(1926), S.104—115.(申得乐：《孔拉迪的学术遗著》)

⑥ A.Conrady: Das aelteste Dokument zur Chinesischen Kunstgeschichte,T'ian-wen,uebersetzt und erklaert,Abschlossen u. hrg.von Eduard Erkes,Leipzig,Verlag Asia Major,1931.(孔拉迪：《中国艺术史上最古老的文献》)

⑦ Bernhard Karlgren: Das T'ian-wen des K'ueh Yuean, OLZ, 1931,Nr.9/10,S.815—818.(高本汉：《屈原的天问》)

⑧ 蓝普若希特(Karl Lamprecht) 是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以十四卷本（正编十二卷，补编二卷）《德意志历史》(Deutsche Geschichte)而蜚声国际学术界。曾任莱比锡大学校长。创立莱比锡大学世界文化与历史研究院并任院长。该院设有一个东方部。蔡元培1908年至1911年在莱比锡大学留学时，曾在该院学习过。

⑨ Fritz Jaeger:Der gegenwaertige Stand der Sinologie in Deutschland,Ostasiatische Rundschau,Nr.21,1936, Hamburg,S.562—563.(颜复礼:《德国汉学研究的现状》)

⑩ Horst Hammitzsch:Andre Wedemeyer in memoriam (1875—1958),in:Oriens Extremus,Nr.5,S.252—254,1958.(哈米茨施:《怀念韦德玛耶》)

⑪ Gustav Haloun: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lan Settlement in Ancient China, Leipzig:Asia Major. Vol.1(1924), pp.76—111 and 587—623.(哈隆:《中国古代部族迁徙史》)

⑫ Herbert Franke: Gustav Haloun (1898—1951)in memoriam,S.1—9.(福赫伯:《怀念哈隆》)

⑬ 季羡林:《留德十年》,《人物》1991年第6期,第33—34页,北京。

⑭ Herbert Franke:Gustav Haloun(1898—1951) in memoriam.S.2.

⑮ Bruno Schindler:On the Travel,Wayside and Wind Offerings in Ancient China, Leipzig: Asia Major.Vol.1(1924), pp.624—656.(申得乐:《中国古代的旅、堙、郊祀典》)

⑯ Erich Haenisch: Bruno Schindler und die alte Asia Major, in:Oriens Extremus, Nr.12, 1965.(海尼士:《申得乐和老〈亚洲学刊〉》)

⑰ Wilhelm Rau: Friedrich Weller (Nachruf), ZDMG, Vol. 132 (1982),S.1—21.(威廉·饶:《弗里德里西·魏勒》)

八　大墙外的汉学家

——查赫与库恩

这里我们再介绍两位另一类型的汉学家——查赫（Erwin Ritter von Zach，1872—1942）和库恩（Franz Kuhn，1884—1961）。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不曾在大学任汉学教授，也没有在博物馆或图书馆谋得职位，是所谓大墙外的汉学家。但是他们却是那个时代少有的研究和介绍中国古典文学的德语国家的学者。查赫虽然出身于奥地利，但因为他的著作主要在德国用德语发表，生前与德国学者有打不尽的笔墨官司，死后他的著作也由德国汉学家整理清点。历来德国学者谈德国汉学，总不会忘记提他。

（一）查赫的中国古典诗文翻译

三十、四十年代北京有这样的说法：中国古籍分经、史、子、集四部，近几十年来德国的汉学研究突飞猛进，卫礼贤治经，福兰阁治史，佛尔克攻子部（哲学），查赫攻集部（诗文）。可见查赫的学术声誉非同寻常。①

冯·查赫（Erwin Ritter von Zach，1872—1942）出身于奥地利一个高级军人家族。家族中的一位将军1800年在摩洛哥跟拿破仑作过战，虽败犹荣。父亲也是一位陆军军官。查

赫本人则弃武从文，最初在维也纳大学学习医学、自然科学和高等数学。同时还学过中文，尽管当时维也纳大学没有汉学系。1896年至1897年间他赴中国前，又在莱顿大学师从薛力赫、高延等继续进修汉语。结业后至1901年止受英国人雇佣在中国海关任职。后来成为奥地利驻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处领事馆的外交官。此期间查赫一头扎进中国古典文献之中，打下了深厚的汉学功底。1909年他利用休假回到维也纳大学，顺利地通过了博士学位考试。

查赫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业余汉学家。他提前从待遇丰厚的职位上退休回家，就是为了能潜心游泳于中国古典之中。他的汉学著作都是在任外交官期间和退休后完成的。霍福民(A. Hoffmann)教授曾将他的全部著作整理成一个细目，计有318种。其中成书12种，杂志论文84篇，书评最多，共224篇。② 佛尔克在悼念文章中说："他像一位中国学者那样，抛弃高官厚禄，独自蛰居，献身学术。他像杜甫那样醉心于他的为秋风所破的茅屋。更为类似的是，他必须像一个中国学者那样亲自为自己的著作出版奔劳和掏腰包。"③

查赫的汉学贡献首先在于他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特别是李白、杜甫、韩愈的诗歌几乎全部由他译成了德文。他自己说，他的翻译是纯粹给学汉学的人看的，而不是为普通德语读者；是学术性的而不是普及性的。因此在翻译诗歌原文之外，他还旁征博引，解释典故，考释出处。用中国朴学的方法来治唐代诗歌，查赫可以说是西方第一人。他也翻译过司马相如、张华、陶渊明、白居易、李商隐、苏东坡等人的作品，以及扬雄的《法言》和左思的《三都赋》等。1976年美国旧金山出版

了他译的扬雄《法言》德译本，可见其译作的生命力。

查赫对《昭明文选》推崇备至，认为是西方汉学家的必读书。查赫翻译了《文选》中的大部分作品，散见于各种学术杂志。1958年，哈佛大学出版社搜集到查赫翻译的《文选》，整理出版德文本两大册，作为"哈佛燕京学社丛书"第18种。1987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英译《文选》全译本，题记称"献给查赫"。"序言"中称查赫实际上已经翻译了《文选》的百分之九十。

查赫是一位严格得近乎苛刻的批评家。他给翟里斯(Giles)的《中文词典》提出了一千条补充意见，其中大部分在再版中被采纳。他批评许多西方编纂的辞典忽视了《佩文韵府》。他著文纠正《佩文韵府》、上海版《辞源》中的字误和注音、引文错误。他引《文选》和唐诗中的例句对嘎伯冷兹的《中国文言语法》给以补充和更正。除中文外，查赫还精通满文、藏文。他对满文、藏文词典与语言学著作也发表了很多批评性论著，受到重视。查赫所写的书评、文评从来不说多少好听的话，开门见山就是找人家理解或翻译中文原著时的瑕疵，而且措辞辛辣不留情面。著名学者如法国的伯希和、英国的韦利(Arthur Waley)、德国的福兰阁和佛尔克等大家均受到过他尖刻的批评，为此他没少得罪人。据说谁若在柏林大学汉学教授高延面前提起查赫的名字，准会遭到一顿臭骂。④但是查赫学识之渊博，中国旧学根底之扎实则是学者们公认的。

(二)库恩的中国古典小说翻译

弗朗茨·库恩(1884—1961)是另外一种类型的翻译大师。

从个人道路来看，毋宁说他是一位自由作家。库恩出生于德国东部的弗兰肯贝格城(Frankenberg)，家族中颇出了几位东方学家。父亲当过该市的市长，后来升任德累斯顿市政委员和部门负责人。1903年夏库恩入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次年10月转到柏林大学。在东语所兼修了两年的中文课程。对此他后来回忆说："通过日俄战争引发了我对远东的兴趣。……我打算到中国去从事翻译和领事馆工作。"⑤于是1909年1月他在莱比锡大学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后，便于同年9月到中国任外交译员。在那里他感到"在中国的外国人对于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对于其礼仪风俗，对于儒道佛三大学说毫无所知，对中国的文字和文学更是一窍不通"。原因在于中国文字简直是一个阻隔中外沟通的思想壁垒。⑥

为了冲破这个壁垒，库恩于1912年毅然辞去公职到刚刚创办的柏林大学汉学系攻读汉学。老师是著名汉学家高延教授。库恩既有天才而又勤奋，很快在普鲁士皇家科学院学术报告上发表了《崔寔和他的"政论"》(1914)的学术论文。不久又发表一篇研究朱熹哲学的论文。以研究中国宗教民俗见长的高延希望他选关于中国宗教、哲学或历史方面的题目做教授论文。但是库恩却被《今古奇观》中的"卖油郎独占花魁"所吸引。他感到了中国古典小说具有震撼人心的魅力。当库恩拿着这篇译文去见高延时，高延认为他是不务正业，一怒之下把他赶出了汉学系。从此库恩放弃了福兰阁、佛尔克式的从外交官到汉学教授的道路，而成了一名"自由翻译家"。他认定中国文学中所反映的人情世态，所描述的故事情节一定能吸引西方读者。

最初库恩只是选译《今古奇观》中的一些片段，已经受到读者的欢迎。1930年在莱比锡岛屿出版社(Insel Verlag)出版《金瓶梅》节译本，获得突破性的成功。1932年他为此获得萨克逊莱辛文学奖。此后该书即畅销不衰，不断再版重印。二战结束前，他翻译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主要有《好逑传》、《二度梅》、《红楼梦》、《水浒》、《隔帘花影》、《三国志演义》，以及多部中国古代短篇小说选集。他还翻译了茅盾的长篇名著《子夜》等现代小说。战后作者主要翻译了唐代传奇和出版了多种文学选集。⑦ 库恩的许多译作在西方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如他六十年前翻译出版的《红楼梦》节译本，有788页，冠以库恩撰写的长篇序言。在荷兰、比利时、法国、美国、英国、加拿大、意大利等国出版了数十版。它至今仍是该书唯一的德文译本。为了表彰库恩在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方面的贡献，1952年，联邦德国总统授予他一枚大十字勋章。

库恩生前最后一部大的译著是明代小说《肉蒲团》。《肉蒲团》在中国一向是官方的禁书，认为比《金瓶梅》还要"黄"。库恩的德译本1959年在瑞士苏黎世出版，也因其色情内容遭到书刊检察官的查禁，官司打到法院，译者出足了风头。从此《肉蒲团》在西方不胫而走，美国、法国、英国、丹麦、荷兰、芬兰、意大利等国出版了各种转译本，印数累计不下数十万。

库恩自称他的翻译不是给汉学专家看的，而是面向最广大的读者大众。这一点正好跟查赫相反。所以他注重文笔的生动传神，而不拘泥于原著的一字一句。有人这样评论说："库恩译作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从其印数之高和再版、重版之多可以反映出来。如果他只是用学究式的语言去翻译，则达不

到这样的成功。他有删节和压缩的勇气，有一枝化腐朽为神奇的生花妙笔。他具有一个艺术家的才能，人们完全可以把他看作一个自由作家。"⑧

库恩一生靠翻译中国小说为生，这在西方、在世界上恐怕是独一无二的。对于他翻译中为了使故事情节紧凑所采取的一些艺术的而非学术的处理手法，学术界确实不无微词。但是正是库恩全身心的投入和天才的妙笔使中国文学在德国、在西方赢得了最广大的读者。因此库恩的贡献还不仅在于把众多的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德文，并进而被转译成英文、法文、意大利文等众多西方文本，而且在于他扩大了汉学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对此著名汉学家、曾任德国科学协会(DFG)副主席的福赫伯教授这样评价说："汉学是本世纪才在德国被接受为正式专业讲座的。这一学科涉及到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的语言、历史、文学和文化及其四千年不曾中断的传统。中国拥有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库恩翻译的这些文学作品使广大读者得以对此获得直接的认识，从而有助于在我国形成一个建设该专业的最佳气候。他的工作使中国文化在最广大的范围内获得了一个可感觉到的实在的轮廓。""对于许多德国读者和文学爱好者来说，是库恩的这些中国古典中长篇小说把他们第一次带入中国文化世界。我本人即是其中的一个。我之决定学习汉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好奇心：我在中学时代就读过的库恩翻译的那些小说，有朝一日若能够一睹原著的风采，该有多好！""专业工作者有足够的理由感谢他！库恩以他自己的方式帮助我们创造了一个学术性汉学研究成长所需要的良好气候。"⑨福氏的这一评价可以说是十分中

肯的。

① Alfred Forke:Erwin Ritter von Zach in memoriam,in ZDMD, Bd.97.S.1—15.(佛尔克:《纪念查赫》)

② Alfred Hoffmann:Dr. Erwin Ritter von Zach(1872—1942),in: Oriens Extremus,Bd.10(1963),S.1—60.(霍福民:《纪念查赫博士》)

③ 同注①。

④ Erich Haenisch:Bruno Schindler und die alte Asia Major,in: Oriens Extremus,Nr.12,S.7—9,1955.(海尼士:《申得乐和老〈亚洲学刊〉》)

⑤ Hatto Kuhn:Dr.Franz Kuhn(1884—1961)——Lebensbeschreibung und Bibliographie seiner Werke,S.11—12,Wiesbaden,1980.(奥托·库恩:《弗朗茨·库恩的生平及其著作目录》)

⑥ 同上。

⑦ 库恩译著除见上书外，又见：Hartmut Walravens: Franz Kuhn, Ergaenzungen und Register zur Bibliographie von Hatto Kuhn, Wiesbaden, 1980.(瓦拉文斯:《弗朗茨·库恩论著目录的补充和索引》)中文目录可见王丽娜:《德国著名汉学家弗朗茨·库恩及其译著》,《中华文史论丛》第46辑,上海,1990年。

⑧ Herbert Franke: Geleitwort, in:Hatto Kuhn: Dr.Franz Kuhn (1884—1961),S.2—4.

⑨ 同上。

九　从柏林到北京

——西来取经与东行求法

柏林大学首任汉学教授高延(de Groot)被德国人认为是"道家型"(Taoistisch)的学者。虽然著作不少，却崇尚无为而治，不属于所谓"开拓型"人物。所以伯希和在纪念孔拉迪的文章中说：孔拉迪在莱比锡吸引了大批学生，创立了自己的学派，作出一番颇有气象的成绩，高延却无法在柏林做到这一点。[①] 因此，柏林大学汉学研究所建所之初，颇为冷清。但是当福兰阁、海尼士先后主持柏林大学汉学研究与教学工作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柏林日益变成德国中国学研究最活跃的地区。

福兰阁时代(1923—1931)柏林大学汉学所的学生数达到30人，比过去最好时候还多一倍。博士研究生也显著增加。主专业汉学，另有副专业蒙古学、满文和藏文。[②] 当此之时，不但有越来越多的德国青年汉学家到中国去留学"求法"——他们已有别于那些以外交官或传教士身份赴华的前辈们；而且还有一些中国学者来德国"取经"。这时期可以说是德国汉学的"盛世"。

关于福兰阁我们已经在前文有过专门介绍。这里重点介绍一下海尼士。海尼士的研究工作最突出地表现了二战前德

国柏林中国学的特色。

(一)海尼士和柏林的中国学

埃里希·海尼士(Erich Haenisch,1880—1966)出身于一个普鲁士官僚家庭。中学毕业后,1899年入柏林大学,师从顾路柏(W. Grube)学习中文、满文和蒙文;兼修印度学和亚述学等东方学科。1903年他以一篇利用中文与蒙文资料研究蒙古历史的论文取得博士学位。在柏林大学东方语言研究所短期工作后,转赴中国任武汉新军学堂德文教员,达七年之久,直到清政权被推翻为止。1913年他以《论吴三桂起兵》(Der Aufstand des Wu San-kuei)为题在新成立的柏林大学汉学所通过了教授论文,成为德国在本国完成全部汉学教育的第一人。1920年汉学研究所新设一个蒙古学和满文教授职位,海尼士荣膺其选。次年,高延去世,海尼士实际全面主持所内教学与研究事务,直至1923年福兰阁前来接任。1925年,作为孔拉迪的接班人,他受聘为莱比锡大学汉学系教授。1932年福兰阁在柏林大学退休,海尼士于是又回到柏林,任汉学研究所教授兼所长,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海尼士曾是德意志科学院、萨克逊科学院和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赫尔辛基芬兰语—乌戈尔语(Finnisch-Ugrisch)协会通讯会员,德国东方学会、德国自然和人类学会荣誉会员,并获德国星级大十字勋章。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表彰海尼士在中国学上所作出的贡献。③

海尼士一生发表的论文和著作约140多种。主要的研究范围是关于蒙古和满清时代中国语言和历史,尤以关于《蒙

古秘史》的研究最为杰出。早在1866年俄国汉学家帕拉丢斯(Palladius)就发表过《蒙古秘史》的中文与俄文对译本，海尼士的贡献在于，他根据对中文音译的研究，复原出《秘史》的蒙文原文，从而为《秘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此他先后发表的论著有《元朝秘史的研究》(Untersuchungen ueber das Yuan-chao mi-shi,1931)、《关于成吉思汗最后一次远征及其死亡——据东亚流传的资料》(Die letzten Feldzuege Chinggis Han und sein Tod nach der Ostasiatischen Ueberlieferung,1933)、《蒙文〈元朝秘史〉——根据中文恢复〈元朝秘史〉的蒙古原文》(Manghol un niuca tobca'an. Aus der Chinesischen Transkription im Mongolischen Wortlaut Wiederhergestellt,1937)、《元朝秘史辞典》(Woerterbuch zu Manghol un niuca tobca'an,1939)等。

海尼士清史和满文的研究也有不凡的成就。特别是利用汉、满、蒙、藏等多种语言知识所做的研究，尤其体现了德国学者的长处。还在福兰阁时代就组织过这样一个合作项目，即将汉学家兼满、藏语专家劳佛(B.Laufer)从中国带回的四语碑铭进行整理，由福兰阁负责汉文部分，豪尔(E.Hauer)负责满文部分，富让克(A.H.Francke)负责藏文部分，海尼士负责蒙文部分。海尼士本人也发表过利用多种文字研究考释中国碑铭的论文。例如《北京碧云寺的四语奠基碑》(Die viersprachige Gruendungsinschrift des Klosters Pi-yun-sze bei Beijing)、1755年和1758年两块关于准噶尔之役的四语碑(Zwei viersprachige Inschriften zum Dsunggarenkrieg aus den Jahren 1755 und 1758)、《1765年热河安远

庙四语奠基碑》(Die viersprachige Gruendungsinschrift des Tempels An-yuan-miao in Jehol von Jahr 1765)等等。④

海尼士在柏林大学的头衔是“汉学及乌拉尔—阿尔泰语言教授”(Prof. fuer Sinologie und Uralaltaische Sprachen)。在海尼士1925年去莱比锡期间，由豪尔担任柏林满、蒙文教授。豪尔(Erich Hauer,1878—1936)也是外交官出身，1901—1917年在华任职。回国后入柏林大学学习汉学，1921年博士毕业，两年后又完成教授论文。豪尔翻译过清代《开国方略》，研究过明末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其它语言研究方面的主要著作有《满蒙文文法》(Mandschu-Mongolische Grammatik)、《满汉文文法》(Mandschu-Sinesische Grammatik)及《满文词典》(Handwoerterbuch der Mandschusprache)等。后者在他死后多年才出版，被认为是最好的一部满文词典。⑤

(二)西行“取经”的中国学者

如所周知，德国的中国学总体上属于东方学的范围，汉学曾经是一般东方学的兼职。本世纪以来，汉学自立门户，但仍然是东方学大家庭的一员，各学科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德国东方学研究有数百年的传统，其成就举世公认。由于印度日耳曼语言比较研究的推动，而梵文对比较语言研究又具有重要性，使德国在梵文及其相关的东方语言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一些东方古文字是德国和西方学者揭开奥秘的。而中国古代西北史地的研究需要通晓多种语言，西域出土文书相

当一部分是用这种语言书写的。由于中国历来缺乏这方面的研究，因此本世纪以来频有一些西来"取经"的中国学者赴德国留学。著名者如陈寅恪、姚崇吾、韩儒林、邵循正和季羡林等。

陈寅恪先生第一次是1910年到柏林大学学习的，第二次是1921年到1925年。他的老师是著名印度学家海里西·吕德斯(Heinrich Lueders，1858—1943)。吕德斯毕业于哥廷根大学，是以研究梵文语法和碑铭著名的基尔霍恩（Franz Kielhorn)教授的学生。1909年到柏林大学任印度学教授三十多年，主攻巴利文和梵文佛教文献，尤其是致力于吐鲁番佛教文书的整理研究。他的夫人媛尔瑟·吕德斯(Else Lueders)博士，也是一位梵文学家，也从事过整理吐鲁番文书残卷的工作。[6]给陈寅恪以影响的另一人是柏林民俗博物馆馆长F.W.K.米勒(Mueller，1863—1930)博士。米勒是一位佛学造诣很深的东方学家，精通多种东方语言，他虽然不在柏林大学教书，却在柏林民俗博物馆开设了佛经文献阅读课程。柏林大学的学生也去听课。估计陈寅恪就是作为当时的听众之一，而与米勒博士交往的。陈先生回国后在清华研究院开设的课程是"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梵文文法"等。指导学生的研究范围是"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比较研究"、"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文译本之比较研究"、"蒙古满洲之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等。[7]陈先生还掌握蒙文、藏文、满文，其《蒙古源流》研究四篇和《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释序》等论文，就反映了他利用多种文字的史料进行文献考释的功夫。显而易见，陈寅恪先生这些教学和研究活动是受到了

当时柏林大学中国学研究风气的影响的。

著名的蒙古史、元史专家韩儒林 1933 年到比利时鲁汶大学初攻欧洲中世纪史，次年转到巴黎大学跟伯希和学习蒙古史和中亚史。但是在 1936 年回国前他主要是在柏林大学深造，学习蒙古、藏、突厥文和波斯文，而当时在柏林执教蒙古史者正是海尼士。韩儒林先生的成名作关于突厥三碑的考释，就是在留欧期间根据德文和英文译本翻译成汉文，并加注释的。邵循正先生 1931 年由清华大学派往法国攻读蒙古史和中亚史，次年也是转到德国，在柏林大学攻读蒙古史一年有余。海尼士和豪尔其时均在柏林。

季羡林先生 1935 年先到柏林后转到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和巴利文。指导教授瓦尔德施米特(Ernst Waldschmidt, 1897—1985)是陈寅恪先生当年在柏林的老师吕德斯(H. Lueders)的高足，也是一位在研究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成就卓著的学者，且通中文。[8] 季先生回国后，在研究印度历史与语言的同时，在研究新疆出土的吐火罗等文书残卷及西域关系史上也作出了很大成绩，为一般学者所无法企及，应该说得益于他留德十年所植下的根基。

由于这些中国学者汉文功底远在西方学者之上，所以当他们掌握多种文字之后，便能在研究中显示出自己的优长之处。例如著名蒙古史、元史专家姚崇吾先生二十年代曾留学柏林，三十年代则被海尼士请到柏林大学任客座教授。海尼士谈到柏林大学的汉学课程时还特别提到："1932—1933年度蒙古史专家、北京大学姚崇吾教授提供了极大的帮助。"[9] 今日的柏林自由大学则视姚先生为该校聘任的第一位中国教

授。[10]

(三)留学北京的德国汉学家

二十、三十年代更多的德国学者来华作学术考察，在中国研究中国。海尼士分别于1928年和1936年先后到中国的蒙古地区作实地调查；到北京档案馆查阅文献档案。对德国汉学家留华起重要作用的是“中德学会”。海尼士在一篇论述柏林大学汉学的文章中还说：“值得提及的是，过去的十年间，北京成立的中德学会给那些年轻的汉学家提供了他们所期待的到中国去进修的机会。”[11]

关于“中德学会”，据曾任该会秘书、1933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的胡鸳吟女士回忆说：“北京的中德学会是在1933年由中德两国学术界人士首创的纯粹学术性团体。”学人郑寿麟鉴于德国法兰克福有卫礼贤始创的“中国学社”，乃捐出他的所有私人藏书创立“中德学会”(Deutsch Institut)，后来得到德国学术机构(DAAD)的支持，成为一个既介绍德国学术文化，又研究传统中国文化的学术团体。原来只是在北京图书馆借用几间小屋，不久移至北海公园附近、距辅仁大学不远的地方。创建时的德方会长是卫礼贤的哲嗣卫德明(H. Wilhelm)，他当时正在北京编纂《德华词典》。后来的会长是德国研究中国图书事业史的专家谢理慈(Ernst Schierlitz，1902—1940)。他是辅仁大学图书馆馆长。[12]冯至先生曾任该会中方干事。对于德国来华汉学家来说，这个学会相当于一个研究俱乐部。清史及满洲史专家福克司(W. Fuchs)继任该会会长，明史及近代史专家傅吾康(W. Franke)曾任干事，年轻

的汉学家除卫德明(H.Wilhelm)之外，还有霍福民(A.Hoffmann)、罗越(M.Loehr)、宾格尔(K.Buengel)、蒙古史学者海西西(W.Heissig)等都曾是这里的研究员。

中德学会出版德文版学术杂志《汉学杂志》(Sinologische Arbeiten)。由于战争的关系可惜只在1943—1944年出版了三期。第1期刊有傅吾康的《论〈明实录〉的版本和流传》，卫德明的《关于顾炎武和张尔岐的书信往来》等文章；第2期刊有罗越的《商代的青铜铭文》和海西西研究蒙古史的论文；第3期刊有傅吾康的《论永乐北征》、罗越的《容庚的商代甲骨文论著简目提要》和宾格尔的《〈通典〉关于唐代法律的章节》等。每期杂志除了德国学者的论文外，还有中国学者的中文论著的德文提要。如谢国桢的《雪堂所编丛书解题》、赵万里的《魏宗室东阳王荣与敦煌写经》和谢刚主的《朝鲜李朝实录纂修述略》等等。对于中德学会的工作，傅吾康在1951年从中国回到汉堡时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莱布尼兹在北京设立一个研究所的理想的实践"。⑬

三十年代德国学者在北京创办的另一份学术杂志是《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它是1935年德国汉学家鲍润生(Franz Xaver Biallas，1873—1936)在主持辅仁大学校务期间创办的，得到当时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先生的大力支持。《华裔学志》的刊名就是陈先生题写的。"华"者，华夏；"裔"者裔远之邦。寓意可谓深长。这份年刊在北京共出了十三期，除陈垣先生外，著名学者沈兼士、英千里、张星烺等人均曾担任过编委工作。⑭1949年后，该刊先后迁居日本和美国，1972年，才又回到波恩附近的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早就

听说《华裔学志》杂志社有一个丰富实用的图书馆。1990年4月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陶泽德（R.Trauzettel）教授驱车带笔者前往参观，果然名不虚传。中文和西文藏书有8万余种，以中国古代文史方面为主，收藏内容极似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虽然图书数量不及剑桥，但却超过了德国大学里的中文图书馆。目前《华裔学志》除杂志外，还不定期编辑出版《华裔学志》研究丛书。由于杂志与丛书都具有较高水平，又有教会方面充沛的经济资助，因此，《华裔学志》社在德国今日汉学研究中是有一定地位的。⑮

---

① P.Pelliot: Auguste Conrady, T'oung Pao, Vol.24, S.130, 1926.（伯希和：《奥古斯特·孔拉迪》）

② Erich Haenisch: Die Sinologie an der Berliner Friedrich Wilhelms Universitaet in den Jahren 1889—1945, in: Studium Berolinense, Aufsatze und Beitraege zu Problemen der Wissenschaft und zur Geschichte der Friedrich Wihelms Universitaet zu Berlin, S.563, Berlin, 1960.（海尼士：《1889—1945年柏林大学的中国学》）

③ Wolfgang Bauer: Erich Haenisch(Nachruf), in: ZDMG, Nr.117, S.205—210, 1967.（鲍尔：《悼念海尼士》）

④ Herbert Franke: Erich Haenisch zum 80.Geburtstag, in: Studia Sino-Altaica, Festschrift fuer Erich Haenisch zum 80.Geburtstag, S.1—11, Wiesbaden, 1961.（福赫伯：《海尼士八十诞辰》）

⑤ Erich Haenisch: Erich Hauer(Nachruf), in: ZDMG, Vol.107, S.1—6, 1957.（海尼士：《悼念豪尔》）

⑥ Ludwig Alsdorf: Die Indologie in Berlin von 1821—1945, in: Studium Berolinense, Aufsaetze und Beitraege zu Problemen der Wissenschaft und zur Geschichte der Friedrich Wihelms Universitaet zu Berlin, S.574—577, Berlin, 1960.（阿尔斯多夫：《1821—1945年柏林的印度学》）

⑦ 《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年2月，第53页。

⑧ Herbert Haertel:Ernst Waldschmidt(Nachruf),in ZDMG,Vol.137,S.6—11,1987.(赫尔特耳：《悼念瓦尔特施米特》)

⑨ 同注②。

⑩ Chinablaetter,Nr.15,S.25,1986.（《中国简报》第十五期）

⑪ 同注②。

⑫ Chang Tien-lin:Dr.Ernst Schierlitz(Nachruf),Ostasiatische Rundschau,Vol.21,S.63,1940.(张天麟：《谢理慈博士》)

⑬ Wolfgang Franke: Die Entwicklung der Chinakunde in den Letzten 50 Jahren,Nachrichten der OAG, Vol.72, S.6, 1952, Hamburg.（傅吾康：《近五十年来中国学的发展》）

⑭ 《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创刊号，1935年，北京。

⑮ 参见任大援短文：《〈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见《中国文化》第3期，第206—207页，北京，1990年。

十　战后的残局和汉学的重建

希特勒政权的法西斯统治和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德国学术界带来的损失是惨重的。一方面一批优秀的学者被迫离开德国，远走欧美，另一方面国内的图书设备流失，或被战火焚毁。风光一时的德国汉学在战后呈现一片萧条冷落的局面。

(一)战后的残破局面

无论是牛津，还是剑桥，都以自己所收藏的稀见古本而自诩。但是德国人却没有这份自豪。德国大学的中文图书馆给我最突出的印象是，没有多少古旧书。不要说善本、孤本，就是线装书也是屈指可数。这可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恶果。以战前德国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柏林大学为例。这里曾是汉学研究的中心，经过高延(De Groot)、福兰阁(O. Franke)和海尼士(E. Haenisch)的多年经营，拥有德国最好的图书设备。二战后却全部化为乌有。海尼士教授回忆说："1944—1945年冬学期末，位于茨格尔大街(Ziegel Strasse)的汉学研究所被军队强占为医院，那些剩余的能够保留下的图书，其中包括大型丛书、类书和高延书斋的馆藏，从原来所占的八间屋子被堆塞到其中的一间。当我锁上这间房屋，把钥匙交给学校当局，高延1912年创建的具有三十多年非凡历史的教学和

研究基地也就从此关闭了，德国东亚研究史上的一章也就从此结束了。”① 两年后当海尼士重访旧地时，“原先八大屋子藏书，被偷的偷，拿的拿，已经所剩无几了”。笔者本人 1991 年 2 月曾访问过洪堡大学的汉学系图书馆，那里的藏书果然令人失望，而且基本上是后来新添置的。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莱比锡、法兰克福和哥廷根大学。哥廷根大学的汉学研究所由于哈隆教授的一手经营，三十、四十年代已经具有相当规模，在欧洲颇有名气。季羡林先生作为经事者在《留德十年》中也有具体的描述，② 战后这里被炮火夷为废墟。1990年 7 月，我到哥廷根大学开会，特地拜访了汉学系的中文图书馆，实在是寒酸得令人不敢恭维。经历过战后残局的福赫伯教授说：“当时教学设备奇缺，研究工作的困难程度令人今日无法想象。有些学者搭乘拥挤不堪的火车旅行数日之久，只是为了去查阅某一本图书。”③

1946年海尼士受命建立慕尼黑大学汉学系。他退休后在《慕尼黑东亚研究学科的建立》一文中对当年惨淡经营的情景有一段生动的描述：“我1946年夏季学期临时接受了慕尼黑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教授的职位，一年后转为讲座教授。……在慕尼黑过去还从没有过的东亚学专业，筹建工作是如此之艰难，大学和图书馆均遭毁坏，既缺房舍，又少图书，我的处境比《列子》寓言中那位想用残年余力搬走大山的愚公还糟。他还能指望儿子孙子，我却只能求助于我自己。在柏林的最后一个学期，我们经常必须刚刚开始上课就得马上离开教室，转移到地下室里去，几乎无法进行正常的教学。而在慕尼黑，我们夏天有时在过道里，有时在木板棚下上课，冬天则在属于语言研

究所的那座唯一完整的房子里。……后来1949年夏季学期我们才获得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它既是图书馆，又做教室，又当办公室。……我们没有书，也无从购买。再说经费也很少。逐渐地我们能够找到这样或那样一本书。所幸的是，我本人的藏书在巴伐利亚安然无恙，可供我教学之需。"④

（二）人才的严重流失

人才荒也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在国社党的种族歧视政策和法西斯统治下，许多德国汉学家出走欧美，造成了德国汉学界战后后继乏人的局面。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哈隆（G. Haloun）、伦敦大学教授西蒙（W. Simon，1893—1973）均为德籍学者。《亚洲学刊》战后从莱比锡迁往伦敦，申得乐（B. Schindler）侨居在那里出任主编。曾参加1930—1935年斯文赫定中瑞考古探险队的勒辛（Ferdinand D. Lessing，1882—1961）教授在美国加州大学讲课授徒。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1896—1988）从法西斯集中营里出来后，从伦敦转道美国，潜心研究中国历史，他与冯家升1949年发表的合著《辽代中国社会史》，享誉西方汉学界。

许多优秀青年学者如福兰阁的高足白乐日、艾伯哈也被迫出走德国。白乐日（Etienne Balazs，1905—1963）出生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1923年到柏林大学攻读汉学，1930年博士毕业。他的博士论文《唐代经济史》（Beitraege zur Wirstchaftsgeschichte der T'ang-Zeit）受到西方学者的交口称赞。1932年他发表《哲学家范缜及其神灭论》是西方最早系统论述和全文翻译《神灭论》的论著。⑤ 由于他的非"纯正"德国

血统，被迫出走巴黎。白乐日曾是倡导和推动欧洲"宋计划"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他本人主要研究汉代至宋代的经济和政治史，他翻译的《隋书·食货志》曾获法国巴黎科学院的"儒莲奖"(Stanislas Julien Preis)。所译《隋书·刑法志》也获欧美学人好评。主要论文结集后名为《中华文明与官僚政治》，是西方最重要的汉学著作之一。⑥

艾伯哈(Wolfram Eberhard，1909—1989)生于波茨坦，由于受卫礼贤翻译的中国经典的影响，遂决定学习汉学和民俗学。1927年入柏林大学，1929年开始在柏林民俗博物馆工作，1933年以研究汉代天文学获得博士学位。次年到中国各地游学。回国后于1936—1937年任莱比锡格拉西博物馆(Grassi Museum)亚洲部主任。其后设法离开国社党统治的德国，在土耳其安卡拉大学任教授长达十一年。1948年赴美，不久任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艾伯哈著作等身，主要有《中国边疆民族的文化与徙居》、《古代中国的区域文化》和《中国历史》等等。他的包罗宏富的作品，已编辑成文集在美国、德国、台湾和香港等地出版。⑦

随便数来，便可看出，战后英、法、美等西方大国的第一流汉学家来自德国者，不在少数。可见德国汉学界人才流失之严重。有人说，"当时在国外的德国汉学家比在德国境内的还要多"，⑧决不是无稽之谈。

汉学人才是如此之缺乏，以至唯一免于兵燹之灾的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在颜复礼教授1948年退休后，汉学讲座竟空缺数年，无人为继。柏林、莱比锡还是一片废墟。所以，在一段时间内，整个德国只有慕尼黑大学一个汉学专

业，而在那里，刚开始又只有海尼士一人授课。这种情况下，三十、四十年代以各种身份滞留中国的一批德国学者，便在五十年代以后德国汉学界扮演着重要角色。

（三）汉学的恢复和重建

二战后德国汉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惨淡经营的。但是条件尽管艰难，德国学者却能一丝不苟地去做。慕尼黑大学当时学习中文的学生并不多，海尼士给他们开的课程是"两个学期的语言入门课之后，是简易读物的阅读，接着是文学作品选读。然后有古典作品：《史记》、《通鉴纲目》、《战国策》、中长篇古典小说、公牍文书，特别是散文作品"。[9] 1948年入学的鲍吾刚（W. Bauer）回忆他和同学德博（G. Debon）当日读书情景，海尼士教授如何给他们讲《春秋》和《左传》，讲司马迁的《史记》和满文、蒙文，海尼士还请他们到自己的私人图书馆读两周的中文古籍。他说"当时大学里已经有些颇为热闹的大专业，而在东亚研究所人们却得到一块宁静的世外桃源，只想安安静静地埋头钻到书本里"。[10]

从1950年开始，德国汉学渐渐进入复苏的局面。1951年夏季学期，已有柏林洪堡大学、波恩大学、富莱堡大学、哥廷根大学、汉堡大学、科隆大学、莱比锡大学、美因兹大学、马堡大学、慕尼黑大学、蒂宾根大学和维尔茨堡大学开设中文课程。在西德汉堡大学有傅吾康教授讲先秦历史文选、现代学术论文选读；恩歌曼博士讲汉语入门和中文翻译；有两位代课教师讲中国医学与整个中国文化的关系、中国的造型艺术；李书华（后执教美国）和胡隽吟带中文口语和写作课。慕尼黑大学有

海尼士教授讲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历史文选、蒙古佛教及资料选读；福克司(W.Fuchs)博士讲文言文初阶、十七和十八世纪东西方关系及资料选读；罗越(M.Loehr)博士讲中国的造型艺术。这是西德当时仅有的两个设有讲座教授的汉学专业。其余大学只是维持语言教学的水平。在东德，洪堡和莱比锡大学其实都只有艾克斯(Eduard Erkes)教授一人支撑。在莱比锡他讲古汉语入门、中国古文字学、诗经、韩非子、列子、老子和韩非、中国古代宗教、中国历史(一)以及从孙中山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洪堡大学他教中国古文字学、庄子和中国历史(二)。[11]

以攻读汉学取得博士学位者也有增多。1952年福克司(W.Fuchs)、宾格尔(K.Buenger)、霍福民(A.Hoffmann)、海西西(W.Heissig)分别取得汉学或蒙古学教授资格。1953年在汉堡、慕尼黑和哥廷根大学培养出战后第一批研究中国文史的博士6人。[12] 其中如葛林(T. Grimm)、鲍吾刚(W. Bauer)和德博 (G.Debon) 后来都成为德国有影响的汉学家。1958年完成和正在写作中的博士论文就有28篇(含中国艺术史和蒙古史论文6篇)。[13] 其中一些人如吉穆(M.Gimm)、拉斯德特(O.Ladstaetter)成为今日学界的中坚。

设置汉学专业的大学有所增加。首先是1956年福克司出任新成立的柏林自由大学非讲座教授，因为这里新设了一个汉学专业。1960年，科隆大学成立东亚研究所，福克司应聘任讲座教授兼所长。1957年海西西出任波恩大学蒙古学特批教授。霍福民出任马堡大学汉学系特批教授。截止1960年，厄尔朗根、法兰克福、明斯特甚至哈勒大学也开设了中文

课程。

学术杂志的创刊和复刊及学术丛书的编辑也是德国汉学复苏的一个标志。《德国东亚自然和人类学会通讯》(NOAG)1945年在东京以第70号停刊后，1951年8月在汉堡编辑了第71号，此后每年两期。1961年以前，兼载东亚学消息，后来只刊学术论文和书评。1954年《远东学报》(Oriens Extremus)在汉堡创刊，由傅吾康、福克司等主编，该刊副题称"远东地区语言、艺术和文化杂志"。创刊号上傅吾康详细介绍了中国北京同年创刊的《历史研究》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各期的论文。尔后多年一直由傅吾康和福赫伯介绍《历史研究》与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它迄今仍为德国最有声望的东亚学术杂志之一。通常由汉堡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化研究所和日本语言文化研究所讲座教授联合担任主编。

1954年停刊多年的《德国东亚自然与人类学会报告》(MOAG)在汉堡恢复出版。这实际上是一套东亚研究丛书，每本均是一部专著。同年出版的还有《哥廷根亚洲研究》，副题称"南亚、东亚和中亚民族的历史、语言和文学研究丛书"，至1958年所出十部，几乎全部都是关于中国学特别是中国蒙古、突厥等古代边疆少数民族的语言和历史的研究专著。1959年，波恩大学编辑出版《亚洲研究》，副题为"东亚与中亚历史、文化和语言研究丛书"，是《哥廷根亚洲研究》的续编。海西西任主编。

《德国东方协会杂志》(ZDMG)是德国最早的一本东方学术期刊，创刊于1873年，开始年刊四期，后来为年出一巨

册。但1945年至1949年仅出一册，1950年开始又恢复正常。1954年创刊的《东方研究所学报》是东德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编辑的杂志，年出一册。作者也包括西德学者。这两本杂志都是一般东方学刊物，也登载中国学方面的文章。

战后成立的欧洲青年汉学家学会也对德国汉学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个学会在1948年第一次在英国剑桥开会，只是三、四位同好在一起晤聚。座中言及第二年再聚时，各人再带几位同行熟人在荷兰相会，纯属私人性质。会议均在暑假进行，费用各人自理。1950年在伦敦、1951年在巴黎召开第三次、第四次会议，始成规模。1952年在德国科隆举行的第五届会议上，十四位论文报告人中有五位来自德国。此后1957年（马堡）、1961年（汉堡）、1967年（波鸿）均在德国举行。1955年中国学者顾伯赞、周一良先生等曾出席过在莱顿的第八次会议。⑭五十、六十年代进行的《汉学论著评介》编辑工作和"宋代研究计划"均是欧洲汉学家会议的成果。德国学者积极参加了这些协作项目，在战后欧洲中国学研究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

① Erich Haenisch: Der Aufbau der Ostasiatischen Studien in Muenchen, in: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aendischen Gesellschaft,Bd.103(1953), Wiesbaden,S.46—48.（海尼士：《慕尼黑东亚学科的建立》）

② 季羡林：《留德十年》，刊北京《人物》1991年第6期，第33—34页。

③ Herbert Franke:Sinologie an Deutschen Universitaeten, Wiesbaden(1968),S.32.

④ 同注①。

⑤ Der Philosoph Fan Dschen und sein Traktat gegen den Bud-

dhismus,Sinica 7,1932,S.220—234.

⑥ Wolfgang Franke: Etienne Balazs im memorium,Oriens Extremus,S.1—5.Jg.12,1965,(傅吾康:《纪念白乐日》)

⑦ Hartmut Walravens,In memoriam Wolfram Eberhard, Oriens Extermus,1990,S.5—10.(瓦拉文斯:《纪念艾伯哈》)

⑧ Wolfgang Bauer:Herbert Franke und deutsche Chinaforschung nach dem Krieg, in: Studia Sino-Mogolica, Festschrift fuer Herbert Franke,Wiesbaden,1989.(鲍吾刚:《福赫伯与战后德国的中国学研究》)

⑨ 同注①。

⑩ Wolfgang Bauer:Die "Geradheit" in den "Liedern",Erinnerungen an das Studiun mit Guenther Debon, in:Ganz allmaelich, Festschrift fuer Guenther Debon, hrsg. von Roderich Ptak u. Siegfried Englert,Heidelberg:Heidelberger Verlaganstalt,1986. S.13—25.(鲍吾刚:《诗的率直——回忆与德博的学习生活》)

⑪ Nachrichten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uer Natur-und Voelkerkunde Ostasiens,No.71(1951),S.24—28,Hamburg.

⑫ 同上,No.75(1953),S.67—68.

⑬ 同上,No.84(1958),S.90—92.

⑭ 周一良:《我国历史学家参加在莱顿举行的青年汉学家会议》,《历史研究》1956年第2期,第49页。

十一　从“三分天下”到“诸侯称霸”

——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德国汉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意志国家被分裂成两部分：东德和西德。但是，在中国学领域里，却是三分天下：以慕尼黑海尼士、福赫伯为中心的中国中古史、以汉堡傅吾康为中心的明清史及中国近现代史，和东德地区以艾克斯为首的先秦文史的研究。二战后到五十年代末，德国只有这三个汉学讲座，他们分别代表了战后德国汉学的三种类型。海尼士、福赫伯是二战期间留在德国境内的德国自己培养的汉学家的代表；傅吾康是二战期间侨居中国、战后回国的汉学家代表；艾克斯则代表了纳粹时期被迫隐居，战后接受马克思学说的汉学家。[1]这三种类型的汉学家，各有自己的治学特点，扮演了德国五十、六十年代汉学研究的主角。

（一）傅吾康的明清史与近代史研究

傅吾康（Wolfgang Franke）1912年7月24日生于汉堡，是德国汉学界泰斗福兰阁的哲嗣。1930年中学毕业后他先后在汉堡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汉学，是柏林东语所毕业生。除主修汉学，还兼修日本学和历史。1935年傅吾康以《康有为及其变法派》一文取得汉堡大学博士学位，建议他做这个题目的正

是他的亲身经历过这一运动的父亲。福兰阁说他的最小的儿子选择汉学为终身职业，完全是孩子自己的决定，但是，家庭环境的熏陶显然也有很大作用。②

1937年傅吾康只身赴华进修访学，先到上海、南京等地访问，不久到北京，任中德学会秘书，后来实际主持学会的工作，编辑《汉学杂志》(Sinologische Arbeit)。在那里他与天津南开大学毕业的胡隽吟女士结婚、生子。1948年，冯至先生任北大西语系德文专业主任时，傅吾康曾受聘任德文教授。1950年汉堡大学中国学讲座后继乏人，聘傅吾康为中国语言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长。一个濒于停顿的汉学系因此被挽救了。

也许由于独特的人生经历，也许由于对中国文化深刻的了解，傅吾康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认为在许多方面，西方向中国要学习的东西比中国人向西方要学的东西多得多。如，人际关系方面，中国人远比西方微妙。在今日情形下，欧洲人克服"欧洲中心主义"，比中国人克服可能有的"中国中心思想"，更为重要。为此他主张在一般学校教育中要把中国传统文化列入教学内容，普及对中国的了解。更进一步，他主张德国所有大学都应该设立汉学研究机构，用他的话说是："一个大学没有汉学系，还叫什么大学！"由于五十、六十年代，西德学生没有可能到大陆留学，因此他主张把散落在德国大学的中国人请到大学里来，以便在大学里营造一点中国文化的气氛。六十年代德国大学增设教授职位，傅吾康推荐两位华裔出任，引起一些德国人的非议。他著文辩驳，认为此举可以提高德国汉学研究水平。③傅吾康还主张在著名的德国科研机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

tut)设立东亚历史研究所，研究商周以来的中国历史。④傅吾康如此推崇中国文化，大力推动对中国的研究，在德国确实是不多见的。在战后德国汉学的重建和发展中，傅吾康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创建了德国汉堡亚洲研究所，这是由联邦外交部资助的一个以研究东亚特别是中国为重点的学术研究机构。他曾任德国东亚学会主席，亚洲学会副主席。1972年，中德建交，他是德国建交访华团的特邀代表和顾问。

傅吾康个人的汉学研究，主要在明清史、近代史和近代以来东南亚华人碑刻史迹的考察方面。其代表作《明代史籍汇考》出版于1968年，而资料的搜集工作三十年代在华时即已开始。该书搜罗宏富，除中文文献外，还包括西文资料，是西方治明史者的必备书。《中国近百年革命史(1851—1949)》初版于1958年，1980年又出版增订本。作者把太平天国以来中国近代史上的事变看成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在西方学术界颇获好评。他的另一部中国近代史著作是1962年出版的《中国与西方》。该书对近代西方列强在华的侵略行径持批评态度，是值得一读的好书。六十年代，傅吾康曾受聘到马来西亚大学创办中文系，这使他的研究兴趣转到东南亚华人史迹上，这也正好是明清史的一部分。1977年，傅吾康退休，受聘到马来西亚大学中文系任教授，更集中精力开展南洋华人历史的研究，这项工作获得德国科学协会的慷慨资助。目前他在星马各地搜集的金石碑刻，已编辑成《马来西亚华人铭刻萃编》等出版。傅吾康几十年来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及书评。1989年在新加坡出版了《傅吾康学术论文选集》一巨册。内容包括明史、清史、东南亚华人史和海外中文教育以及德国汉

学研究等方面。大体反映了傅氏一生治学的历程。

傅吾康在汉堡大学二十七年，培养了22名汉学博士，其中绝大部分是攻读明清及近代史的，不少人是德国汉学界的中坚。最近（1992年7月）汉堡亚洲研究所及汉堡大学中文系和他在各地的弟子与同仁在汉堡庆祝他的80寿辰，并出版了纪念论文集。

（二）福赫伯的中国中古史研究

如果说战后德国明清史专家多半是傅吾康的学生的话，那么，五十年代以后，德国的宋元史学者大多向福赫伯（Herbert Franke）执过弟子礼。

福赫伯（Herbert Franke）1914年9月27日生于科隆。父亲是位博学的书商，与文人学士交游颇笃，这使他从小就浸润在书籍的海洋里。二十年代库恩（F. Kuhn）翻译的中国古典小说吸引了博览群书的福赫伯，使他决定学习中文。

在柏林大学期间，福赫伯的第一专业是法学，同时于1936年取得东语所中文专业文凭。1947年福赫伯在法学博士之外，又获得科隆大学哲学（汉学）博士学位。两年后，又进一步完成了教授论文。1953年，英国剑桥大学和德国慕尼黑大学同时聘任他为汉学教授，福赫伯选择了后者，继他在柏林时期的老师之一海尼士出掌慕尼黑大学汉学讲座。1979年退休后，任名誉教授。⑤

福赫伯著述甚丰，主要学术领域是宋辽金元史、蒙古史，对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化史等也有研究。成书的著作有《蒙元时期的货币与经济》、《元朝文化史论丛》、《中国墨的文化

史》、《吐鲁番蒙古纪事长编残稿》等。主编有《宋人传记》四册，这是欧洲"宋代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合著有《百宝箱——中国古典小说译文集》(与鲍吾刚合作)、《中华帝国史》(与陶泽德合作)等。其中1949年在莱比锡出版的《蒙元时期的货币与经济》共分四章。第三章关于元朝的货币，在"纸币"一节分别讨论了"忽必烈的货币政策"、"中统宝钞"、"卢世荣及其财政改革计划"、"1287年的货币改革"、"1309年的货币政策"、"1350年的货币政策"、"计划外纸币的发行和伪钞"及云南流行的贝钱等问题。作者还在第四章分别从矿业、贸易、农业、人口、国家收支和物价等方面，对元代的经济统计问题作了专门研究。这部著作奠定了福赫伯在西方学术界的地位。至今西方学者还认为，西方对元代经济史的研究没有超过这部书的水平。⑥ 福赫伯最近几年发表的著作以《南宋战争史》(1987)最为重要。该书以襄阳保卫战为中心，研究南宋的军事和宋金关系，是作者多年研究的力作。他还是《剑桥中国史》第六卷"辽夏金元"卷的主编，该书已于最近出版。福赫伯的蒙古史研究继承了海尼士(E.Haenisch)的事业。但是他主要不是从多种语言比较研究入手，而是着重于经济史、文化史、制度史的角度。"他在许多方面与海尼士比相距很远，但又在有些方面超出了海尼士。"⑦ 鲍吾刚(W. Bauer)的这个评价是中肯的。

海尼士(E.Haenisch)和福赫伯的这种差别实际上也折射了时代和学风的不同。海尼士继承了德国历史语言学派的治学传统，可以说是脱胎于德国普通语言学和东方语言学的最后一位汉学家。在柏林大学，由于汉学系不授现代汉语，学

生的口语训练均在东语所完成。但是战后在慕尼黑，海尼士也不授现代汉语。他的名言是“汉学就是古文字学”(Sinologie ist Philo Logie)，认为“汉学的秘密就是要经常地大量地阅读”。[8] 他对学生说：“口语知识对于在这个国家访问当然有好处。但是对于我们在本国学习汉学的人来说，则意义不大。因为汉语口语不具有学术性，人们并不视之为一个学科专业。”[9] 这种轻视口语的态度曾受到操一口流利中文的傅吾康的公开批评，认为是厚古薄今的保守思想。[10] 鲍吾刚(W. Bauer)教授则对自己老师海尼士的态度，表现出更多的理解。他认为战后德国汉学界一派荒凉景象和困难状况是那些长期在中国呆过的学者(暗指傅吾康等)无法理解的。[11] 实际也是如此。以海尼士在慕尼黑的情况，当时要开设汉语口语，也找不到胜任的教员。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海尼士时代的中国和傅吾康时代的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福赫伯继海尼士任慕尼黑大学汉学教授后，虽然本人的科研重点仍是中国中古史，但是对现代汉语的教学和中国近现代的研究已给予重视。[12] 五十、六十年代，福赫伯与傅吾康同是推动和组织德国汉学研究的核心人物，都是享有国际声誉的汉学家。福赫伯曾是德国东方学会主席、国际东方学会联盟秘书长、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客座教授，担任过德国科协(DFG)副主席、巴伐利亚科学院院长等重要职务。

(三)艾克斯以来的东德汉学研究

战后东德汉学界的领袖人物是二十、三十年代已经成名的艾克斯(Eduard Erkes,1891—1958)。1913 年艾克斯就以

研究屈原的《招魂》在莱比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1917年又以《论〈淮南子〉的世界观》为题通过教授论文。他是孔拉迪（A. Conrady）的高足和女婿。三十年代，艾克斯已是莱比锡大学的教授。希特勒统治时期，他由于是社会民主党党员，被迫离开大学，埋名隐姓。1947年，莱比锡大学第一个在东德恢复东亚系，艾克斯被请回学校任教授兼主任。[13] 1950年柏林洪堡大学新开汉学课程也由艾克斯兼职。[14]

在科研重点上，艾氏继承了乃师的治学传统，主攻先秦语言文学，特别是在诗经、楚辞的研究中倾注了大量心血，取得了丰硕成果。1950年以后，受世风的影响，艾克斯注重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编写中国通史。代表作有《远古至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Die Entwicklung der Chinesischen Gesellschaft von der Urzeit bis zur Gegenwalt，1953）、《从中国历史的童年到外国资本的入侵》（Geschichte Chinas Von Anfaengen bis zum Eindringen des auslaendischen Kapitals，1956）等。福赫伯评介说：这些著作"是在马克思学说的架构下写作的"。[15]

五十年代东德大学实行院系调整。1953年拉契讷夫斯基（Paul Ratchnevsky，1899—　）从莱比锡抽调到柏林，担任洪堡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拉氏也是研究古代中国的，发表的代表作有《蒙古大汗和佛教寺院》（Die Mongolischen Grosskhane und die Buddhistische Kirche，1954）。

东德汉学研究受中苏关系影响很大。五十年代初，颇有一段"蜜月"。有中国学者受聘到德国执教。东德也派留学生到中国，主要是在北京大学留学。东德汉学研究与中国国内

研究的关系也较密切。如关于奴隶制的讨论，艾克斯发表过《中国的奴役问题》(Das Problem der Sklaverei, 1952)。费路(Roland Felber)教授在北京大学留学达七年之久，他对笔者自称是翦伯赞的学生。回国后他发表有《商鞅变法和中国的奴役问题》(Die Reformen des Shangyang und das Problem der Sklaverei in China)、《井田制的乌托邦》(Die Utopie vom Brunnenfeld)以及《"商"与"贾"的语义——关于中国古代交易的特征》(Zur Bedeutung der Termini Shang und Ku——eine Betrachtung ueber den Charakter des Austauschs im alten China)。这些选题显然受到五十、六十年代中国史学界学术风气的影响。

自从中苏交恶，东欧国家对华关系日益冷淡，从而也殃及汉学的教学与研究。不久前《德国大学通报》(DUZ)发表洪堡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梅爱华(Eva Mueller, 1933—)对记者谈话说，她1954到北大学习时的气氛还很不错，回国时就在变了。1960年梅爱华就将老舍的《茶馆》译成了德文，但是不准出版。"文革"中老舍自杀，她的译稿竟受到"株连"，在出版社被捣成纸浆。[16]

研究古代中国的更是没有出路，有的被迫改行。战前即成名的魏勒(F. Weller)专攻印度学，韦德玛耶(A. Wedemeyer)专攻日本学，基本上放弃了他们过去曾作过的中国古代研究。艾克斯晚年有志于编纂一部《中国古文字字典》，对古文字的形、音、义的演变作一系统全面的归纳和分析。他是把这作为一生治学的一个交代来做的，可惜1958年他就赍志以没了。此后莱比锡的汉学研究更是名存实亡。整个东德

只有洪堡大学有中国学专业。1959年由主攻中国近现代史的毕尔僧(Siegfried Behrsing, 1903—)出任该专业的主任教授。古代中国作为一个专业实际上取消了,到 1985 年才有三个学生重新获得学习古汉语的机会。而当毕尔僧致力于建立起同苏联和东欧各国汉学家之间的联系时,同中国同行的关系在六十年代以后基本上不复存在了。[17]

东德科学院古代东方历史与考古研究所是六十年代以来惟一的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机构。唐代文学研究专家蒂洛(Thomas Thilo)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过。1983年发表《唐代传奇小说中的奴婢问题》,是他的博士论文。作为对唐代传奇的进一步研究成果,1989年出版了译著《虬髯客——唐代传奇选译》。蒂洛曾主持了东德所藏吐鲁番文书的编目工作。他本人的另一个研究兴趣则是中国古代建筑,1977 年在莱比锡出版的《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结构原则和社会功能》颇受读者欢迎。近年来他的研究重点是唐代的长安。

东德科学院的另一位研究员是施密特 (Gerhard Schmitt)博士。他的主要研究兴趣是中国古代边疆民族及其对中国文明的影响。1970年出版过《周易贞术》。近几年研究古代神话、《离骚》等。在这些方面倒是可以看出孔拉迪和艾克斯等人的治学传统。两德统一后,东德科学院解散,施密特被安排到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系做研究工作,蒂洛则挂靠在柏林洪堡大学中文系,两人的工资均由联邦政府支付。

六十年代以来,当东德的汉学研究由于政治气候的影响而萎缩时,西德的汉学却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汉堡和慕

尼黑大学先后设立了第二汉学讲座教授职位；波鸿大学成立了颇有规模的新型东亚学院；许多大学都先后办起了汉学系或东亚专业。德国汉学阵营里除了傅吾康和福赫伯等领袖人物外，还有一些有成就的汉学家，代表了这个时期德国汉学的研究水平。其中如福克斯(Walter Fuchs)、海西西(Walther Heissig)、霍福民 (Alfred Hoffmann)、艾士宏 (Werner Eichhorn) 等人五十、六十年代创建了新的汉学或蒙古学教学与科研基地，为德国汉学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一般七十年代均已退休。稍晚一辈的是葛林(Tilemann Grimm)、德博(Guenther Debon)、鲍吾刚(Wolfgang Bauer)等，他们一般五十年代取得博士学位，是六十年代以来德国汉学发展中的骨干力量，其中大多数在八十年代退休，属于承上启下的一代。五十年代"天下三分"的格局正由于这些人和各地汉学系的崛起，迅速让位于"诸侯并峙"的局面。

(四)福克斯、海西西的满清、蒙元研究

福克斯(Walter Fuchs,1902—1979)生于柏林，由于其父对民俗学和地理学有浓厚兴趣，使福克斯也迷上了东亚和中国。1925年他在柏林大学以《吐鲁番地区唐以前的外部变迁》完成博士论文。主专业是汉学，副科有满文、民俗学和哲学。1926 年他得到在中国沈阳医科大学教德文和拉丁文的机会，从此他在中国一呆就是 20 多年。在沈阳的 12 年(1926—1938)，他注意搜集满洲早期的历史资料，对于满文的学习也更加精益求精。1938 年，福克斯应聘任辅仁大学教授。除参与编辑《华裔学志》外，他主要集中精力研究十七至十八世纪西

方传教士协助绘制的中国地图。1943年他在北京出版了《康熙时代耶稣会士的地图》两大册，400多页，收录包括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地图在内的各种地图36幅，介绍了这些地图的历史背景，还附有名词索引。⑱

在北京期间，福克斯曾任"中德学会"会长，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德国汉学家。二次世界大战后只身返回德国，他在中国的图书丧失净尽，开始几年他先后在慕尼黑大学、汉堡大学任教和在慕尼黑民俗博物馆供职。1957年柏林大学将一个民族学教授职位改为汉学教授职位，聘福氏主其事。1960年科隆大学新设汉学系，福克斯受聘任教授兼系主任，直至1970年退休。

福氏毕生致力于清史及满文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早在中国期间，他就注意搜集工作，1936年就在日本东京出版了《满洲图书文献学研究》。1966年又出版了《德藏汉文及满文手稿和稀见版本的研究》，介绍的图书包括《永乐大典》残本等珍稀典籍。学者评论，福克斯是西方汉学界熟悉清代史料的第一人。晚年他还研究乾隆南巡及康熙微服出访的满文文献，于退休后出版了《十八世纪乾隆皇帝南巡图册》(1976)等。他告诫其弟子，如果研究中国历史而不懂满文，将不能直接利用许多清代史料。他的大弟子、科隆大学教授嵇穆(Martin Gimm)目前是德国汉学系中唯一开设满学专业的。再传弟子冯门德(E.v.Mende)任柏林自由大学教授，是德国目前能够开设满文课程，掌握满文资料的极个别汉学家之一。

1978年退休的波恩大学中亚研究所海西西(Walther

Heissig)教授是德国最著名的蒙古学专家。他出生于1913年，28岁时以一篇研究满蒙文化关系的论文在维也纳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四十年代他也是北京"中德学会"的中国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回国，先在哥廷根大学教授蒙古语言与历史，主编《哥廷根亚洲研究》(Goettinger Asiatische Forschungen)丛书(1954—1958)。后任波恩大学蒙古学教授，创建中亚研究所，主编《亚洲研究》(Asiatische Forschungen)丛书和《中亚学》(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丛刊。

海西西早年研究现代蒙古语言和历史。1941年与人合著《现代蒙文词典》，并附有简明语法，在维也纳和北京出版。在北京期间，他参与调查北京喇嘛寺庙中的碑铭文字，进而研究明清时代蒙古文学和历史语言。五十年代以来他系统地整理蒙古文献，在"蒙古文学史资料"的标题下，先后出版了《北京喇嘛蒙文木版文献》(1954)和《蒙古家庭和寺院的历史记述》，后者又按时代先后分成两册，第一册为十六至十八世纪(1959)；第二册为十九世纪(1965)，内容是四部编年史书。他还主持过《蒙古世系谱》的翻译，在蒙古佛典的翻译、蒙古神话、童话、民间宗教，以及蒙文石刻和手稿残卷等方面也发表了不少论著。经过数十年资料搜集和基础研究工作，海西西于1972年出版了《蒙古文学史》(Geschichte der Mongolischen Literatur)两大册，共约1000页，为德国蒙古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海西西主持波恩大学中亚系期间与欧珀里西特(Peter Olbricht)教授领导的波恩大学汉学系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1970年双方拟订的合作的项目有：(一)汉以前关于亚洲

历史和地理的汉文记载；(二)元代中国的管理问题；(三)关于蒙古早期历史的汉文记载。最后一项的具体内容又包括：第一，整理著名蒙古史专家海尼士(E.Haenisch)遗稿，如《蒙鞑备录》、《黑鞑事略》等的德文翻译。第二，关于成吉思汗以前的蒙古人的汉文文献。第三，整理研究张德辉的《岭北纪行》。第四，整理研究王鹗的《汝南遗事》。[19]

(五)霍福民、艾士宏的文史研究

初见波鸿大学名誉教授霍福民(Alfred Hoffmann)给人的印象，就是他那一口地道的京腔。这在德国老一辈汉学家中是很少见的。霍氏生于1911年，原在汉堡和柏林大学学习汉学。三十年代翻译过胡适、冰心、鲁迅和朱自清的小说和散文，也译过胡适、顾颉刚与阿英的文史学术著作。二战前他在中国呆了八年。1945年在上海出版的《南京》一书，记南京城市的历史和现状，有254页，照片200帧，就是其时的成果。

五十年代以来，霍福民致力于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和研究。1950年他在科隆出版了全译南唐后主李煜词集——《南唐后主李煜的词》。这是他在汉堡大学1949年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次年他又出版了一部宋词选——《春花秋月》。此外他还翻译研究过王维的诗歌。查赫(E. v. Zach)所翻译的古典诗文作品，如白居易的诗，韩愈的散文及《昭明文选》等，散见于各书刊杂志，是由霍福民整理结集，交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出版的。晚年他花了很大气力研究中国的鸟类名称，1975年以来出版了《中国鸟名大全》三大本。

霍福民曾任教马尔堡大学，后担任柏林自由大学、波鸿大

学中国文学教授兼系主任。特别是他参与创建了德国规模最大的波鸿大学东亚学院，为五十至七十年代德国汉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1976年，他65岁退休时，波鸿大学特出了一本纪念文集。他的学生顾彬(W.Kubin)等人在《前言》中称赞自己的老师为了波鸿大学东亚学科建设，牺牲了个人的利益，放弃了自己的研究工作；称赞他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他的老师福兰阁(O.Franke)、佛尔克(A.Forke)、颜复礼(F.Jaeger)等人的学术传统，而且开创了新的一代风气。[20] 这是就霍福民不仅研究传统汉学，而且身体力行提倡研究现代中国文学与语言而言的。

"大器晚成"而一生坎坷的汉学家是蒂宾根大学汉学系创始人艾士宏(Werner Eichhorn，1899—1991)教授。艾士宏起先在海德堡、柏林和哥廷根大学学习，攻读的专业有哲学、心理学、艺术史、社会学和国民经济学。1926年以研究莱辛(Lessing)的论文取得艺术史专业的博士学位。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他于次年又到莱比锡大学东亚系研究汉学，老师是海尼士(E.Haenisch)和艾克斯(E.Erkes)。1932年他翻译出版了周敦颐的《通书》，顾路柏(W.Grube)早年翻译过《通书》一至二十条，至此成为完璧。

1932年艾士宏到中国留学。在清华大学他的老师有张君劢、冯友兰和胡适等。1935年回国后，他在波恩大学任助教，次年完成张载《西铭》的翻译与研究工作，通过了教授论文。此后他先后执教于哥廷根和法兰克福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被迫征召入伍，打断了其学术道路。战后他随其英国妻

子到牛津大学图书馆供职，后任职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此期间他与人合作编辑了《汉学报刊论文索引(1920—1955)》(Index Sinicus)，颇受好评。六十年代，在西德经济起飞的同时，文化教育事业也迅速发展，其中许多大学增设汉学系，艾士宏以61岁接近退休的年龄，出任蒂宾根大学汉学系主任。

艾氏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并且都被征入兵营服役。一战时他在战壕空隙里写下的日记诗文，前几年偶尔公布后，以其动人的文笔获得德国南方电台的大奖。二战时他成为英军俘虏，身陷囹圄。晚年出掌蒂宾根大学汉学系，以年龄太高，竟被迫签字画押，保证不拿退休金，可谓一生坎坷。但是，艾氏仍然笔耕不辍，计有论著56种。厄尔朗根大学荷乐瑟(Klaus Flessel)教授在《纪念艾士宏》[21]的文章里将他的老师的研究工作分成四个方面：一是对中国哲学与宗教，特别是对宋代哲学和道教的研究，如1976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宗教与国家祀典》；二是对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戏剧和古典小说的研究；三是对中国社会史，特别是对农民起义问题的研究，在这方面他发表的研究论文，包括东汉的张角、东晋的孙恩、宋代的王小波和李顺、明代的唐赛儿以及近代太平天国等。他可以说是西方当之无愧的研究中国古代农民起义问题的专家。四是对中国通史的研究。他1964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中国文化史》，在西方颇受欢迎，先后被译成荷兰文(1967)和英文(1969)出版。

(六)葛林、德博和鲍吾刚的文史哲研究

德国五十年代初博士毕业，基本是战后才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汉学家，以葛林(Tilemann Grimm)、德博(Guenther

Debon)和鲍吾刚(Wolfgang Bauer)为代表人物。他们是傅吾康或海尼士和福赫伯的学生，较前述几位汉学家都要晚一辈，属于承前启后的人物。

葛林(T. Grimm)是傅吾康在汉堡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生于1922年，从一岁到十二岁，即1923—1934年是在中国的北京和天津度过的。父亲是位医生，母亲在当时就发表过介绍中国的文章。这对葛林后来以汉学为专业有很大影响。[22] 1953年以《明代的倭寇》为题博士毕业，即留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任教。汉堡亚洲研究所成立，他是第一任所长。1962年，他到明斯特(Minster)大学创办汉学系。1965年，受聘任波鸿大学中国历史系教授，与霍福民同为该校东亚学院的创始人。1974年葛林转到蒂宾根大学汉学系任教授，不久，出任该校副校长。1989年退休。

葛林是德国的明代史专家。除前举博士论文外，他的教授论文是1960年出版的《明代的教育和政治》，他还研究过明代的监察制度等问题。在这方面，可以说继承了傅吾康的衣钵。他的学生如富莱堡大学教授格莱纳(Peter Greiner)等都搞明史研究。他还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和当代政治问题。这不仅是因为乃师傅吾康的提倡，还因为葛林有在亚洲研究所的直接经验。他在1964年就翻译出版过《毛泽东选集》；1967年翻译出版过《毛主席语录》。是德国提倡研究近现代中国最力的汉学家之一。[23] 葛林注重研究历史上的中国和现实中国之间的联系的治学特点，有人把它归结为五个方面：一是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在传统和现代的影响和命运；二是从文化和思想史的角度深入考察中国的思想和文学；三是探讨中国历史

发展过程的条件和特点；四是从中国历史性的联系中弄清十九和二十世纪在中国发生的巨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从明代文献到毛泽东著作的大跨度研究；五是发掘“世界中的中国”这个题目，即研究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特别是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㉔

德博(G. Debon)生于1921年，是海尼士在慕尼黑大学的关门弟子。在学生时代他就翻译出版过一本中国古典诗歌集。1953年博士毕业，论文是翻译研究司马迁《史记》卷101袁盎、晁错传和卷102张释之、冯唐传。1959年完成教授论文，并任教于科隆大学，1964年为副教授。1968年受聘任海德堡大学汉学教授兼系主任。1986年退休。

德博是德国当代研究中国古典诗歌最有成就的汉学家之一。他翻译出版过多本《唐代诗歌集》(1957，1964)和先秦诗选——《公元前12—7世纪中国诗集》(1957)。他也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和艺术理论，代表作为1962年出版的《论〈沧浪诗话〉——中国诗学研究》。与人合著有《忠实于自然的褒奖——邹一桂(1686—1772)的〈小山画谱〉》(1969)。这方面的著作还有1978年出版的《中国文字学的基本概念及其与诗、画的联系》。他退休后著有《中国诗歌——历史、结构和方法》(1989)。其学生陈月桂博士也是研究唐代诗歌的。近年来由于中德文化及学术交流的扩大，德博又研究歌德与中国文化，1984年在海德堡主持召开了国际“歌德与中国”讨论会。主编《歌德与中国》、著有《席勒与中国精神》及《再论席勒与中国精神》等。㉕

慕尼黑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巴伐利亚学院院士、莱茵—威斯特法伦科学院院士鲍吾刚（W.Bauer）教授是海尼士在慕尼黑大学的另一位高足。

鲍氏生于1930年，与德博有同学之谊，却要年轻得多。1953年，当鲍氏以研究汉初开国功臣张良和陈平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时，只有23岁。1958年完成教授论文，至1960年，在他任教于慕尼黑大学期间，连续出版了《中国人的姓名》、《春秋三传》、《百宝箱》和《中国——从皇朝国家到共产主义》等书。其中《百宝箱》是他与福赫伯两人合译的中国古典小说选集，选译了先秦至清代小说，有400多页，至今畅销不衰。1964年在纽约出版了英文译本。

1960年到1962年，鲍吾刚先是在美国密西根大学任客座教授，后到伯克利加州大学、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以及香港、台湾、日本和夏威夷等地做研究工作。1962年至1966年，他任海德堡大学汉学系教授兼系主任。1966年以后任慕尼黑大学教授。

鲍吾刚的研究范围很广。他跟海尼士学过满文和蒙文。但他首先是作为一个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学者知名于西方学术界的。他1971年出版的《中国人的幸福观》早在美国就有英文版，中文版也即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他从历史的长时段来考察中国人的乌托邦思想。他的研究不是泛泛之论，而是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分析基础之上的。他1990年出版的《中国人的自我》（Das Antlitz Chinas）长达900多页。作者广泛搜集了从先秦以来至当代中国人的自传性作品，爬理梳抉，把自传者分成各个不同的类型，从中描述和考察中国人

的"自我"(Das Ich)人格特征的发展,并且同欧洲相比较。全书按历史时代分为九章:一,自我和孤独(600—200v.Chr.);二,历史学家和哲学家(200v.—200n.Chr.);三,英雄和隐士(200—600);四,僧侣和诗人(400—900);五,旁观者、忠臣和贬逐者(900—1400);六,清心寡欲者和自嘲者(1400—1700);七,现实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1700—1800);八,作家和鼓吹者(1770—1940);九,信仰者和批判者(1920以后)。作者引据资料极为丰富,出版后学术界纷纷发表述评。海德堡大学教授瓦格纳(Rudolf G. Wagner)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书评称鲍氏此书是"对中国自述文学的开拓性研究",是作者三十多年来研究成果的结晶。㉕

此外,他还主持编纂了《〈国语〉词语索引》两大册和《〈人物志〉词语索引》一册,二书分别于1973年和1974年在台北出版。目前,他领导一个课题组,研究德国文化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和中国人关于德国的研究。

---

① Wolfgang Bauer:Herbert Franke und die deutsche Chinaforschung nach dem Kriege, in:Studia Sino-Mongolica, Festschrift fuer herbert Franke, Wiesbaden 1979.(鲍吾刚:《福赫伯和战后德国的中国学研究》)

② Bodo Wiethoff:Wolfgang Franke,in: Oriens Extremus, 1977.(魏波度:《傅吾康》)

③ Wolfgang Franke: Ostasiatische Professoren an Westlichen Hochschulen,in:Nachrichten der OAG, Vol. 117, S. 67—73.(傅吾康:《西方高校里的东亚籍教授》)

④ 同注②。

⑤ 同注①。

⑥ 《中国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4期,第25页。

⑦ 同注①。

⑧ Wolfgang Bauer: Die "Geradheit" in den "Liedern", Erinnerungen an das Studium mit Guenther Debon, in: Ganz allmaelich, Festschrift fuer Guenther Debon, Heidelberg, 1986. (鲍吾刚:《诗的率直——回忆与德博的学习生活》)

⑨ Erich Haenisch: Der Aufbau der Ostasiatischen Studien in Muenchen, ZDMG, Bd. 103, 1953, S. 47. (海尼士:《慕尼黑东亚学科的建立》)

⑩ Wolfgang Franke: Die Entwicklung der Chinakunde in den letzten 50 Jahren, Nachrichten der OAG, Vol. 72, S. 6, 1952. (傅吾康:《近五十年来中国学的发展》)

⑪ 同注①。

⑫ Wolfgang Franke: Problem und heutiger Stand der China Forschung in Deutschland, in: Moderne Welt, 1959, S. 409—429. (傅吾康:《德国中国学研究的问题与现状》)

⑬ Fritz Gruner: Eduard Erkes, in: Karl Marx Universitaet Leipzig (1409—1959)——Beitraege zur Universitaetsgeschichte, Band II, S. 390—399. (格汝纳:《艾克斯》)

⑭ Herbert Franke: Sinologie an deutschen Universitaeten, S. 37.

⑮ Asiatica, Weller Festschrift, Leipzig, 1954.

⑯ Deutsche Universitaetszeitung 6, S. 34—35, 1992.

⑰ Fritz Gruner: Zur Geschichte der Sinologie an der Humboldt Universitaet zu Berlin, in: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Neusletter, No. 3, 1990. (格汝纳:《关于柏林洪堡大学汉学的历史》)

⑱ Tilemann Grimm: Walter Fuchs in memoriam, in: Oriens Extremus, Jg. 25, 1978, S. 121—122; Wolfgang Franke u. a.: Walter Fuchs in memoriam, in: Oriens Extremus, Jg. 27, 1980, S. 141—150; Martin Gimm: Verzeichnis der Schriften von Prof. Dr. Walter Fuchs, in: Oriens Extermus, Jg. 19, 1972, S. 1—7. (葛林:《纪念福克斯》;傅吾康等,《纪念福克斯》;稔穆:《福克斯教授论著目录》)

⑲ Newsletter Nr. 6, S. 5, Muenchen, Maerz, 1970.

⑳ China——Kultur, Politik und Wirtschaft, Festschrift fuer Alfred Hoffmann zum 65. Geburtstag, S. 8, Horst Erdmann Verlag, Tuebingen und Basel, 1976. (《霍福民六十五岁诞辰纪念文集》)

㉑ Klaus Flessel:In memoriam Werner Eichhorn,Oriens Extremus,33,Jg.2.heft,1990,S.11—20.(苻乐瑟:《纪念艾士宏》)

㉒ China:Dimensionen der Geschichte,Festschrift fuer Tilemann Grimm anlaesslich seiner Emeritierung, S. ix—x, Attempto Verlag Tuebingen,1990.(《葛林退休纪念文集》)

㉓ Tilemann Grimm und Roland Schneider:Gegenwartsbezogene Ostasienwissenschaften, in:Oriens Extrem,Nr.24,1977.(葛林、施耐德:《"当代东亚"学科》)

㉔ 同注㉒。

㉕ Ganz allmaehlich, Festschrift fuer Guenther Debon aus Anlass seiner Emeritierung und seines 65.Geburtstages,Heidelberg,1986.(《渐渐集——德博退休暨六十五岁诞辰纪念文集》)

㉖ Rudolf G.Wagner, Das Chinesische Ich,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5,Oktober,1991, Literatur.(瓦格纳:《中国人的自我》)

十二 “中国热”时代的汉学

1980年柏林的学术论坛出版社（Colloquium Verlag Berlin）出版的一套题目为“研究与情报”（Forschung und Information）丛书中，在《控制论的基本问题》、《通讯》、《学习与教育》、《计划和决策》、《物理学和宇宙学》、《生物学》、《海洋地理学》等现代气息十分浓郁的时髦学科的分册之外，有两个分册特别引人注目：《二十世纪的亚洲》和《中国》。《中国》分册的副标题是“历史、哲学、宗教、文学和科技”。这有趣地表明古老的中国文明与现代科技文化一样在西方普通读者那里，是一个时髦的东西。用德国汉学家的话来说，“中国在过去十年又成为德国人喜爱和感兴趣的地方”。①

八十年代在西方掀起“中国热”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由于中国推行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政策，中国与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贸易关系和文化交流密切起来。其次，台湾、香港等地区和其它历史上同处于中国文化圈的东亚国家的经济起飞，不仅促进了这些地区与西方的经济贸易联系，而且能进一步引发一般民众对具有异国情调的中国文化的“热”升温。②

（一）“中国热”的几点特征

所谓“中国热”，实际上就是一般民众对中国的兴趣增加，除了电视、广播及报刊杂志等大众传媒外，研究和介绍中国的

书籍也明显增多。

据马汉茂(H. Martin)教授介绍，八十年代中期，每年德国新出版的关于中国的书籍达四百来本，近年来更多达六百多本。市面上出售的关于中国的书籍更多。1989年乌特·石勒出版社(Verlag Ute Schiller)出版了一本《德文东亚书籍供货目录》，收录全国五百家出版东亚书籍的出版社和书店可供提货的图书目录，其中关于中国的图书约1470多种。这还不算已售罄的及英语和其它语种的著作。该目录计划每年出版一本，1990年出版的第二册，收书3000种，关于中国的图书占三分之二左右。

近年来德国关于中国的专门杂志有十几种，加上有关东亚及亚洲的杂志，约在20种左右。其中像《中国简讯》、《现实中国》、《中国贸易》、《中国文学杂志》、《新中国》、《中文教学》、《袖珍汉学》、《龙舟》、《竹叶》、《中国象棋》等基本是面向大众或普通学生的刊物。近年又有《龙的信使》、《中国与妇女》等刊物问世。

中文教学也开始在中学及成人高校(Volkshochschule)开设。还有不定期的中文速成班、短训班等。如北威州1980年在波鸿建立一所东方语言学院，其中文专业常年举办短训班。巴伐利亚州翻译学院的中文专业也办得很有生气。莱法州特利尔大学乔伟教授主持的暑期中文班受基金会委托已办了六届，招收非汉学专业的文理医工各科大学生，只有成绩优秀的学生才能入选。

汉学界对"中国热"的直接反映是各大学招生数的成倍增长。柏林自由大学曾经在第一学期招得学生360名。一般大

学的学生数都在百人以上。慕尼黑、汉堡、波鸿则达300—500人。据1989年的统计全国以汉学为主专业的学生约6000人左右。③各大学汉学专业近30个。这些数字在欧洲各国均居首位。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的中国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已经开始走出汉学系，进入政治系、经济系、国际关系系、民族学系、哲学系、教育学系、历史学系、社会学系和法学系等等学科专业。如亚琛科技大学社会学专业开设有"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的课程。波鸿大学教育学系开设有"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教育"的课程。富莱堡大学科技政策专业有"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课程。慕尼黑大学国际政治专业有"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课程。明斯特大学、富莱堡大学历史系均有"中国通史"课。杜塞尔多夫大学哲学系有"中国传统哲学"的课程。马尔堡大学宗教学所有"中国宗教"的课程。柏林工业大学有"中国道教"和"中国科技史"方面的课程。④科隆大学的法学系、特利尔大学政治系都有以中国法律和政治问题为研究和教学重点的讲座教授。马普协会的一些研究所也有中国课题的重点研究小组。

"中国热"导致了大众汽车基金会设立"中国项目"(China Programm)专项资助计划。德国大众汽车基金会是独立的机构，基金来源主要是联邦政府和下萨克逊州投资大众汽车公司的股息收益。1986年股金约14亿马克。1988年以来，联邦政府推行私有化政策，变卖了在大众汽车公司的股份约8.08亿马克，这一部分遂改由联邦政府直接拨款给基金会，到1997年为止，每年3500万马克左右，从1989

年开始，联邦政府必须把变卖股份的8亿多马克还给基金会。目前基金会每年资助金额2亿马克以上。“中国项目”特别资助计划的宗旨是倡导和支持德中科学工作者之间的合作，一般由德中两国学者联合立项，至少必须有中国学者参加，课题必须有利于中国的科技进步和学术发展。截止1991年已批准257个研究项目，资助金额3030万马克。1989年以前，自然科学占的比重较大，1989年经过调整，重点改为资助人文、社会和经济学科，特别是支持对传统中国文化及其对现代中国的影响等问题的研究。据1990年和1991年《大众基金会通报》(Volkswagen Stiftung Bericht)，这方面批准的研究项目有，自由大学东亚系冯门德(E.v.Mende)教授同辽宁社会科学院乌丙安教授合作的“辽宁农村民俗图册”；波鸿大学哲学系何仑施坦(E.Holenstein)教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李幼蒸副研究员“儒家注疏的研究”；由德国教授主持，有中国学者参加的项目有波鸿大学东亚学院中文专业马汉茂教授等主持的“中国的现代化”的研究；慕尼黑大学医学史研究所温树尔德(P.U.Schuld)“中国传统自然哲学和医学经典《黄帝内经》和《素问》的德文翻译与内容分析”；东亚系波尔克特(M.Porkert)教授《国际标准中医词典》；特利尔大学汉学系乔伟教授“中国传统概念‘气’对现代汉语的影响”；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系郭恒玉教授“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顽固性”以及《中德关系史资料》(与洪堡大学亚洲学院合作)；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顾彬(W.Kubin)教授的《电脑检索汉语歇后语词典》；汉堡亚洲研究所的“1945年以前的中国留德学生”；科隆大学教育系莱西(K.

Reich)教授的“中国传统的教与学”等。此外还资助了慕尼黑大学鲍吾刚教授(W.Bauer)主持的“中国哲学及其与欧洲哲学的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蒂宾根大学卜松山(K.H.Pohl)教授主持的“中国近百年知识分子”讨论会。

“中国项目”特别资助计划将于1992年底结束。但是德国“大众汽车基金会”对中国研究以及对德中学术界合作的支持仍将继续下去。

(二)八十年代以来的几个研究热点

八十年代以来德国汉学界的学术讨论会很多,如“宋代讨论会”、“唐代讨论会”、“红楼梦讨论会”和“近百年中国知识分子讨论会”等等。但相比之下,形成研究热点,并有一批成果问世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的现代化”、“中国哲学与欧洲哲学的比较研究”和“近百年来德中文化关系”等课题。围绕着这些问题的讨论,近年在德国先后举行过大型的国际学术讨论会。

一、关于儒家思想与中国的现代化问题

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针对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的中国观而提出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曾认为儒家及道家思想都不能像西方新教伦理那样促进现代化的实现。但是近几十年来东亚儒家文化圈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分明对韦伯影响极大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因此重新审视韦伯关于中国的研究,便成为国际汉学界的热门题目之一。早在六十、七十年代,德国就有论述韦伯的中国研究的书出版。[5] 近年来慕尼黑大学施米特—葛凌策(H.Schmitt Glin-

tzer)教授获大众汽车基金会资助，领导一个课题组从事这一问题的研究。

1978年波鸿大学东亚研究年刊即以“东亚现代化过程中的东方和西方因素”为中心主题出版了创刊号。这个题目便更加成为引人注目的一个讨论热点。1988年，德国阿登纳基金会和中国孔子基金会联合在波恩举行“儒学与中国的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有中国大陆、台湾和德国、美国、日本、新加坡、以色列、苏联、法国和英国等东西方学者与会。会议中心议题是孔子学说及其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与会议的主要报告人之一的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极力推崇儒家文化对现代化的积极影响相反，德国学者一般持否定态度。波恩大学陶泽德(Rolf Tauzettel)《关于儒家思想的世界化问题》认为儒家思想对现代化没有积极作用。因为他太过分强调“集体主义”，在孔子那里，只有“集体”，而没有“社会”。他的同事顾彬(Wolfgang Kubin)教授也持相同看法。顾彬在《不安静的猴子——关于儒家中的自我问题》论文中认为传统中国根本没有“自我”，因而缺少形成近世资本主义和个人化的条件。中国人只知道“自我控制”，“努力谋求协调”，“在中国的传统与现代化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直接的联系”。他强调说，“自我”这个概念在欧洲也只是十八世纪以后才有的，古代中国不可能有真正的“自我”，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往往犯方法上的错误。

一些研究现实中国和中国经济问题的学者更具体把儒家思想同中国的改革联系起来。德国东方和国际问题联邦研究所的沙尔平(Thomas Scharping)博士在《中国改革政策中

的传统和现代》一文中说，中国开展的孔子问题讨论的核心是试图挽救一个在实际上早已破损了的民族传统，儒家思想资源对现代化的作用是保守的和无所助益的，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其他与会的德国学者也多少有相同的在我们看来显得比较激进的意见。

这次讨论会论文集正式出版后，[6] 法兰克福大学汉学系罗兹(Heiner Roetz)博士发表书评，对德国学者一些偏激的看法，有所批评，但是从笔者本人所了解的情况看，德国学者对儒家抱否定态度者不在少数。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主任司徒汉(Hans Stumpfeldt)教授提出儒家思想的历史变迁应该加以注意。他在《孔子和儒学——他们的过去如何？后来变成了什么？今天应该及可能怎样？》的文章中说，《论语》从语义上和哲学上，向来有不同解释，后来的儒家思想更是一个融合诸家的大杂烩，孔子和儒家本来就不是一个统一的东西，谁若要谈论儒家，就应该先搞清，他谈得是哪一个孔子和哪一个儒家。遗憾的是与会者并没有顾及这种区分。罗兹博士也批评德国学者大都把孔子等同于儒学，忽视了荀子等的思想。1991 年 9 月德国汉学界在莱比锡大学曾专门召开孔子思想讨论会。我们期望德国学术界对儒家及孔学的研究今后更加细致和深入。

二、关于中国思想史与哲学史的研究

德国民族是富于哲学思辨的，整个西方哲学史都说明了这一点。佛尔克的三卷本《中国哲学史》这样的大书虽然再没有出现过，但是德国汉学界注重研究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的风气仍在。八十年代以来，卫礼贤翻译的几部哲学著作又得

再版，并出版了便携简装本。图文并茂的《圣迹图》和《老子八十一化图说》⑦等书的出版，反映了学术界为满足一般读者对中国思想史的兴趣所作出的努力。

《易经》的研究是热点之一。仅奥艮·底得里西斯(Eugen Diederichs)出版社推出的《易经》研究与翻译著作就不下7种。除卫礼贤、卫德明(Helmut Wilhelm)父子的《易经》、《周易述要——关于易经的八篇论文》(Die Wandlung——Acht Essays zum I Ging)外，还有译自英、美的《周易》译著。恩格勒尔(Friesrich K.Engler)1989年在瑞士出版的《关于〈易经〉的讨论——人类命运的自由和秩序》(Diskussionen ueber das I-Ching——Freiheit und Ordnung im Menschenschicksal)则是对北宋哲学家李觏(1009—1059)《易论》的翻译与研究。原东德学者施密特(Gerhard Schmitt)有《周易贞术研究》(Sprueche der Wanglungen auf Ihrem Geistesgeschichtlichen Hintergrund)，作为柏林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丛刊第76辑出版。

道家和道教的研究也是德国汉学的热点之一。光《老子》的德文译本就有50多种。关于庄子的研究著作主要有张聪东《庄子的诡辩、智慧和实践哲学》(Metaphysik, Erkenntnis und Praktische Philosophie im Chuang Tzu)等。汉学家石泰宁格(Hans Staniger 1920—1991)教授被称为马伯乐之后欧洲最重要的道教专家。⑧他原毕业于莱比锡大学东亚系，后在西德厄尔朗根大学获博士学位。其教授论文是研究关尹子的。1956年出任维尔茨堡大学远东语言教授。八十年代他主持了欧洲研究计划中的《道藏》研究项目，引起世

人瞩目。他主编的维尔茨堡"中国学与日本学研究丛书"，收有多部研究道教的著作。如古恩赤 (Gertrud Guentsch)的博士论文《〈神仙传〉与神仙的形象》在对《神仙传》翻译、评注的基础上，分析讨论了"仙"显身的外在形象特征。莱特(Florian C. Reiter)通过对《三洞珠囊》的研究，讨论了唐初道教史问题。他还在"慕尼黑大学东亚研究"丛书中发表了《道教的基本要素和发展趋势》(Grungelemente und Tendenzen des Religioesen Taoismus)，讨论金元及明初道教的统合分离关系问题。收入这套丛书的还有恩格尔哈特(Ute Engelhardt)的《气功的古典传统》(Die Klassische Tradition der Qi-Uebungen)，该书对司马承祯的《服气精义论》作了翻译和研究，对"气"、"精"、"神"、"形"等概念作了逐一分析。《华裔学志》研究丛书第20册也有一部研究唐代著名道士司马承祯的论著，即科恩(Livia Koehn)的《七步得"道"——司马承祯的〈坐忘论〉》(Seven Steps to the Tao:Sima Chengzhen's Zuowang Lun)。《坐忘论》是反映司马承祯(647—735)"修心主静"的道教学说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另一学术热点是宋明理学。慕尼黑大学的傅敏怡(Michael Friedrich)和郎宓谢(Michael Lackner)博士等人将张载《正蒙》译成德文，即将出版。于佩和(Monika Uebelhoer)1982年的教授论文是《王艮(1484—1541)及其学说》。她还翻译了日本学者岛田虔次的《朱子学和阳明学》(1987)。近年研究朱熹的还有欧默尔伯恩 (Wolfgang Ommerborn)。他1987年在波鸿大学的博士论文是《朱熹及其理气观的现实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思想史研究》。1991年7月，国际

中国哲学学会和慕尼黑大学东亚系举办“中国哲学和欧洲哲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世界各国共100多位学者就中欧哲学的关系与影响、儒家哲学、道家哲学、佛学、中国宗教、新儒家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其中宋明理学及儒学传统是讨论得较充分的问题之一。

三、关于近代德中文化关系问题的研究

傅吾康、鲍吾刚都曾研究过近代德中文化关系。目前特利尔大学历史系和明斯特大学历史系都有教授带博士生，以德中关系为题。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则以此为该所的研究重点。早在1981年该大学就与中国北京大学达成协议：由自由大学东亚所和北大历史系共同编辑一本德中关系研究论文集。1986年该书作为“柏林中国研究丛书”之一在慕尼黑出版，题为《从殖民政策到合作——德中关系史研究》。德中双方各收论文7篇。德国学者的论文是：米歇尔（M. Michael）《关于义和团起义时期派遣到中国去的一个德国考察团》，葛兰素（Bettina Gransow）《一战前后德国机械出口和在华的工程教育》，魏波多（Bodo Wiethoff）《1931—1941年德中航空交通企业：大事记和图片资料》，郭恒钰（Kuo Heng-yu）《德国外交官眼中1927年的德国和中国》，马亭（Bernd Martin）《1927—1941年德国和国民党中国》，冯门德（Erling Von Mende）《关于一战前在华德国新教教士的几点看法》，罗梅君（Methild Leutner）《德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和在华德国人的作用：1890—1945》。东亚研究所关于这个课题已出版的书还有《德中关系论著目录（1860—1945）》（1984）、《德中关系论集》（1986），《1928—1938年的德中关系——依据德国外交

档案»(1989),«异国风情与现实真情»(1990)等。1989年7月16日至23日在柏林举行了一次“十九世纪至现今的德中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德国及欧洲其它国家的学者出席了讨论会。会议论文以同一题目于1991年出版。从去年开始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系与柏林洪堡大学亚洲研究所开展一个大型合作项目——近百年德中文化关系史,计划出多卷本著作。该项目获德国大众汽车基金会70多万马克的资助,由郭恒钰(自由大学)和费路(Roland Felber,洪堡大学)牵头负责。

(三)八十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与未来研究趋势

然而,从总体上说,德国汉学家基本上以个人独立研究为主,较少大的合作项目;以个人兴趣选择课题为主,较少趋时赴热。因此简单用几个“热点”来概括德国八十年代以来的汉学研究是很不全面的。实际上德国汉学家近几年在中国历史、文学、宗教、艺术等等方面,都有许多研究成果。各大学出版的研究丛书就足以反映这一点。慕尼黑大学的东亚研究丛书已出50多本。所收主要是博士论文或教授论文。文学方面有«元好问的文学批评»、«1100至1450年的中国戏剧»、«中国文人的自然观»等;历史方面有«成吉思汗的生平事业»、«方孝孺»、«十三世纪的中国家庭史»、«南宋中国东南水利事业的发展»、«四川盐业的研究——从公元三世纪至1911年»等;哲学与宗教史方面有«王国维与叔本华——哲学的碰撞»、«中国佛教的统一和大藏经的编纂——宋代思想史的一个研究»等。此外,波鸿大学、科隆大学、海德堡大学、柏林自

由大学等均有自己的研究丛书。波鸿大学马汉茂教授主编的《中国论文集》(China Themen)丛书已出100余册，以收入硕士论文和青年学者的作品为主。

《东亚自然和人类学研究报告》(MOAG) 最早在日本东京出版，六十、七十年代以来一般在汉堡出版，目前也由汉堡大学中国学和日本学教授任主编。现已出100多本。其中以日本学论文最多。由于汉堡大学是德国研究明清史的中心之一，故该丛书关于中国的论著也以明清及近代为多。1980年以来出版的论著有《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和新中国的历史科学——关于五十年代历史分期的讨论》、《中国古代官僚制国家产生的理论视角和社会条件》、《江南的奴婢和奴仆》、《太平天国的地方机构和土地政策》、《1844—1846年的法中外交关系》、《明代的屯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著作中秦始皇的形象》、《革命与传统——学者章炳麟政治生涯》、《关于〈庚子日记〉》等。

波恩大学《亚洲研究》丛书是由该校中亚研究所创始人海西西主编的。目前已出112本，德国最重要的关于蒙古历史和文化的研究论著基本都收入这部丛书中。值得特别一提的还有在波恩附近圣奥古斯丁出版的《华裔学志丛书》(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丛书》收入高水平的以传统汉学为主的研究著作。目前已出书27种。其中如卜松山(Karl Heinz Pohl)的《郑板桥，诗人·画家·书法家》(1990)，代表了西方从艺术史的角度全面研究郑板桥的诗、画和书法的最新成果。已出和即出的还有《道德的启蒙——莱布尼兹和沃尔夫(Wolff)论中国》(1992)、《汤若望在中国

——皇家天文学家和顾问大臣》(1991)及陈垣的《史讳举例》等。

一批综合性的研究著作相继问世。除鲍吾刚(W. Bauer)的《中国人的自我》一书为作者数十年研究中国个人传记的总结性著作外，施米特一葛凌策(H. Schmidt Glintzer)的《中国文学史》从《诗经》、《楚辞》一直讲到八十年代的朦胧诗，吸收了中外学者的许多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德语中迄今最详尽的一部介绍中国文学史的综合性著作。波恩大学教授顾彬(W. Kubin)正在写作一部五卷本《中国文学史》。而特利尔大学卜松山(K. H. Pohl)教授则准备撰写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在历史方面，维尔茨堡大学教授笛特·库恩(Dieter Kuhn) 1988年出版的《宋代文化史》被认为是欧洲第一部综合性的宋代史著作。波恩大学威尔斯(Michael Weiers)教授主编、陶德泽(Rolf Trauzettel)教授等合作撰著的《蒙古历史与文化》(Die Mongolen, Bitraege zu ihrer Geschichte und Kultur)，在《前言》中也强调它是一部旨在加强学科建设和向读者提供全面知识的综合性作品。

从研究范围和趋势来说，传统中国的研究在德国汉学中仍占统治地位，对近现代文学和历史的研究将会进一步得到加强。根据对1975—1979年西德、奥地利和瑞士汉学专业毕业的硕士、博士论文和教授论文的统计，现实问题和传统中国的研究之间的比例是：硕士论文8:8，博士论文41:37；教授论文5:10。三项总计的比例是54:55。这一趋势在八十年代还会保持下去，但是从笔者对德国大学教授的统计看，约有三分之二的教授的科研重点是关于传统中国的，只有三分之一

左右的教授研究现代中国。与此相反的是，在大学教学中，关于近现代中国的教学却占优势。以此做硕士论文的也较多。所以不仅搞传统中国的开设了关于现实中国的课程，而且还有一些教授转向研究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和历史。如波鸿大学的马汉茂(Helmut Martin)教授六十年代就研究李渔及其戏剧，波恩大学顾彬(Wolfgang Kubin)教授过去研究唐代诗歌，但是，目前他们却是德国介绍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两位主要人物。柏林洪堡大学亚洲学院的中国研究一直以现代为研究重点，酝酿中的洪堡大学新的汉学系很可能成为德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至于汉学系以外的研究和教学机构基本以研究中国现实问题为主。如汉堡亚洲研究所，据它最近提供的中国书目录，出书达 140 余种，研究对象几乎都是关于本世纪以来特别是 1949 年以来的中国现实问题。

---

① Einleitung:Interessen und Faszination, in:Berlin und China, S.1,Berlin, Colloquium Verlag,1987.(《柏林与中国》"引言：兴趣和魅力")

② 参看Wolfgang Bauer:Die Bedeutung Ostasiens fuer Europa Heute, in: August Pfizmaier (1808—1887) und seine Bedeutung fuer die Ostasienwissenschaften, hrg.Otto Ladstaetter und Sepp Linhart, S.11—22.Wien,1990.(鲍吾刚:《东亚对今日欧洲的意义》)

③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Newsletter,No.3, 1990,p.7.(《欧洲汉学协会通讯》)

④ Asien, Deutsche Zeitschrift fuer Politik, Wirtschaft und kultur,Nr.43, April,1992,S.131—169.(《亚洲——德国亚洲政治、经济和文化杂志》)

⑤ 如 Reinhard Bendix:Max Weber——Das Werk, Muenchen,

1964. Arnold Zingerle: Max Weber und China, Berlin, 1972.

⑥ Konfuzianismus und die Modernisierung Chinas, Hrsg. Silke Krieger und Rolf Trauzettel, 1990, Mainz. (《儒学与中国的现代化》)

⑦ Hans Stumpfeldt: Das Leben des Konfuzius, Bilder zu den Taten des Weisen, Zuerich, 1991; Florian C. Reiter: Leben und Wirken Lao-tzu's in Schrift und Bild, Wuerzburg, 199.

⑧ Religion und Philosophie in Ostasien, Festschrift fuer Hans Steininger Zum 65. Geburtstag, 1985, Wuerzburg. (《东亚宗教和哲学——石泰宁格六十五岁纪念文集》)

⑨ Tilemann Grimm und Roland Schneider: Gegenwartsbezogene Ostasienwissenschaften, in: Oriens Exterums, Jg. 24, 1977. (葛林等:《"当代东亚"学科》)

十三　今日大学的汉学系

西方的汉学研究，无论是研究重点还是组织机构，西欧与北美都有所不同。中国学在美国的大学里被分割在历史系、哲学系、宗教系、社会学系、经济学系、政治学系和人类学系。原来意义上包容一切的东方（或东亚）语言文学系已经不复存在，留下的只是纯语言和文学了，与中国的中文系相似。但在欧洲却不然。传统的汉学系依然是从事中国教学和研究的主要地方。在德国虽然最近十几年其他各系陆续开设了一些关于中国的课程，但是，这里以中国学为重点的教授职位简直是凤毛麟角。因此，不了解汉学系，便无从了解今日欧洲和德国的中国学研究。

（一）汉学系的一般情况

汉学系（Sinologisches Seminar），在德国有时又称做"中国语言文化系"（如汉堡大学），有时又与日本学或朝鲜学合在一起称"东亚系"。一般属于大学的东方学院（如汉堡、海德堡），或古典学学院（如慕尼黑）、文化学学院（如蒂宾根）、哲学学院（如明斯特），也有归入语言文学学院的（如特利尔）。德国有二十多个汉学系，这不包括大学专科和只有纯公共汉语的大学。关于各个汉学系的具体情况，我们将在附录里作简要介绍，这里只谈汉学系的一般情况。

1.编制：德国大学教师编制很紧。汉学系一般六七个人。大的不过十人，最小的仅三人。东德洪堡大学原有十八位汉学教师，是德国最大的汉学系，目前已经大量裁减，仅设教授三人。汉学系教师的基本结构一般是主任教授一人，讲师一人，语言教师一人。中等规模的在此基础上又增加非主任教授一名，讲师一名，语言教师一名。更大规模一些的则有两位主任教授。如汉堡、慕尼黑、海德堡和波鸿大学。主任教授无可争辩的是当然系主任。没有什么选举不选举的问题。有两名主任教授一般是轮流坐庄，每人当一年或两年。不仅系主任如此，各学院院长也由本院教授轮流担任。在教学和科研上，教授有绝对的决定权。主任、院长、校长都无权干涉，这被称之为"学术自由"（Akademische Freiheit）。

2.课程：汉语当然是汉学系的基础课程，一般在前两年讲授。古代汉语一般从二年级开始。除了语言课之外，另有三类课程。

一是报告课（Vorlessung）。由教师就某一个大的题目，作系统的报告。如"中国近代史"、"中国文学史"、"中国思想史"等。这种课颇似中国的基础课。老师一人读讲稿，学生的任务是做笔记。并按照老师提出的书目去读书。学生可听，可不听；期末也没有考试。这种课，一学期一般只有一到两门，多数情况下，每次一小时。

二是练习课（Uebung）。这是汉学系学生主要课程。除了语言的练习外，最多的便是阅读练习课。包括报刊阅读、文学作品阅读和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法律等文献讲读。如笔者本人即开设过"《史记》选读"、"《聊斋志异》选读"和"中国历史

文选”等。一般是学生事先做好准备，上课时由学生把课文翻译成德文，教师更正，并对文中的典故、名词做出解释。

三是讨论课(Seminar)。分高级与初级两种。基本内容都是由教师提出一系列讨论题目和有关书目，分给每个学生去做。学生写出读书笔记，并分别在课堂上做报告，其他学生提问，进行讨论。最后老师做补充。初级讨论课，题目较宽泛，学生可以以西文资料为主，中文为辅写成报告。如笔者曾讲过“中国古代史引论”的讨论课。高级讨论班一般题目较窄。学生应该较多地利用中文原始资料来写读书报告。

3.学制：汉学系的学制一般为四年。前两年是基础课，以汉语为主。通过一个中间考试，才有资格进一步学习高级课。这时学生们大多到中国大陆或台湾去进修一年或两年的汉语。从中国回来后原则上再学习两年，完成毕业论文，便可取得硕士学位。实际上一般学生的学习年限均超过四年。汉学系的学生在主专业外，还得学习两门副专业，或一门第二主专业。有的大学将汉学分成现代汉学和古代汉学两个专业(如海德堡大学和特利尔大学)，有的分成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两个专业(如汉堡大学和波鸿大学)，便可以互以对方为副专业。

硕士毕业后若攻读博士学位，还须学习三年左右。主要任务是写博士论文。过去的博士论文不过是一篇文章，如今越写越长，非是一本书不可了。博士毕业后，可以继续做教授论文(Habilitation)。教授论文也是一本专著。原则上，只有通过教授论文的，才能取得申请做教授的资格。在原东德不称教授论文，而称第二博士论文。这与原苏联把第一博士称副博士大体相似。博士论文和教授论文都是专著，是德国

大学的汉学或东亚研究丛书基本稿源。

4.科研，德国大学文科的科研有三种情况。一是教师本人在教学之余从事的研究。德国每周只有五天工作日，大学假期较长。一年上课时间只有六七个月而已。教师有充足的时间可以搞科研。二是博士和教授论文。德国大学的助教和讲师职位，往往由博士候选人或博士后做教授论文者担任。按规定他们只需完成二分之一的教学工作量，以便有更多的时间写作论文。博士论文和教授论文是德国汉学研究的主成果。三是由基金会资助的研究课题。就德国的情况而论，主要有大众汽车基金会(Volkswagen Stiftung)和德国科学协会(DFG)以及其它一些小型基金会。基金会的资助主要是用于人头开支，所以有研究项目的教授，一般可以额外找年轻人前来工作，大都是读博士学位者或博士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者。当然也有邀请中国学者前来合作工作的。

5.图书馆，德国汉学系一般有自己独立的图书馆。藏书数量从几千种到七八万种不等。其中"丛书"、"类书"也都算一种。所以若按"册"算，大的图书馆收藏在十万册以上。且很少副本。一般二十五史、十通、丛书集成、四部丛刊和台湾近年影印的方志均约略具备。特利尔大学甚至还购买了一部《四库全书》。杂志一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几大研究(《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哲学研究》、《民族研究》、《文学评论》等)和《文史》、《中华文史论丛》和《社会科学战线》等，重要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收获》、《当代》、《十月》、《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各高等大学学报以汉堡大学最为齐备，柏林自由大学次之。"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的文

史哲经分册，大体都有。柏林、海德堡、特利尔大学还备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台湾出版的中文报纸。为中国留学生提供了最好的阅读场所。

（二）奥地利的汉学系和汉学研究

奥地利和维也纳大学汉学系的情况大体与德国的相同。这里我们想结合介绍两国汉学系，补充介绍一下它们各自的汉学研究情况。

1973 年，维也纳大学文科学院成立汉学系，这是奥地利历史上第一个也是至今唯一的大学汉学系。[①] 系主任拉德斯德特(Otto Ladstaetter)曾在德国波恩大学和蒂宾根大学当教授。著有《蒲松龄的生平及其白话著作》(1961)和《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语言构成》(1963)等。讲师皮尔茨(Erich Pilz)，已取得教授资格，主攻中国历史，曾出版《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中的社会史及其理论架构——关于汉代社会的讨论》(1991)等。全体教师7人，开设了29门课。

维也纳大学文科学院还有一个藏学和佛教学系。系主任史泰恩克尔讷(Steinkellner)是著名的藏学和佛教学家。是奥地利科学院院士和德国哥廷根科学院佛教学研究委员会委员。他及其助手开设了“藏文文学史”、“佛教术语”、“佛教艺术与考古”和“藏语口语”等课程。

维也纳大学汉学系虽然只有20 年的历史。但是大约 150 年以前就有过汉语课程。为此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前文一直没有机会提到的奥地利汉学先驱——菲茨迈耶（August Pfizmaier，1808—1887）博士。

菲茨迈耶是一位自学成才的东方学家。1808年生于卡尔斯巴德(Karsbad)，在德累斯顿和布拉格读完中学。本来打算上维也纳的东方学院。因名额限制而未果。转读医学，1835年获博士学位。但是，菲茨迈耶对当医生毫无兴趣，相反于东方语言却一往情深。在中学时他就出色地掌握了土耳其语等多种东方语言，并发表过关于东方题材的诗歌作品。1989年他在维也纳翻译出版了第一部土耳其诗歌集。他曾试图办一份"东方文学杂志"(原拟刊名为《统一的东方和西方》)，只是因为经费和人手的缺乏而夭折。因此他试图向当时的维也纳大学申请在大学开设东方语言课程。因拉丁语和希腊文教授斐克尔（Franz Fiker）的大力支持而获准，据1843年主管当局的一份批文称：批准申请人菲茨迈耶博士开设下列三门活语言课："其一，阿拉伯文。其二，和波斯文相联的土耳其文。其三，中文。每门课暂定一年，每周四学时。""作为最终的报酬，每个财力所及的学生上与波斯文相联的土耳其语缴10古尔登，阿拉伯语同样10古尔登，至于中文，鉴于讲授这门课程的代价很昂贵而很少有图书可供利用；鉴于预期选修这门课学生可能很少；鉴于教这门课太难太费心，要求每人交25古尔登。完全无法交费的学生可以免费听课。"② 菲茨迈耶在维也纳大学开设中文课，距今正好150年！

1847年奥地利科学院建立，成为奥地利最高学术机构。当时菲茨迈耶在维也纳已经颇有名气了。经过一番争议，1848年成为正式院士，从此开始了中文和日文的翻译生涯。其汉学上的成果是：正史二十四史选译了从《史记》到《新唐书》十六部中的纪、传、表、志；《太平御览》五百卷翻译了其中

的一百三十七卷；翻译了《医宗金鉴》、《离骚》和唐诗……据统计，从1850年到1887年，他平均每年要翻译中文古典文献200页，总计6500多页，其中正史占3500页！

菲茨迈耶的成果已足以令人感到惊异！但更使人惊异的是他的工作态度。多年来他足不出户，埋头译著，跟人通信，非关专业者，概不作复。维也纳一家报纸曾登了这样一则"新闻"："汉学家菲茨迈耶除了北京中文报纸，不读别的报纸。"事情原来是这样，普法战争(1870—1871)后隔了多年，菲茨迈耶有一次同别人谈起普鲁士同法兰西正在打仗。对方吃惊地问消息是从何而来？菲茨迈耶说是从新到的中文报纸上读到的。[8]一直到他死后多年，1920年3月3日的《格拉兹邮报》(Grazer Tagespost)还以《只读中文报纸的怪人》为题发表文章。

菲茨迈耶的译作基本上是在奥地利科学院报告上刊出的。恰巧在他死后的一百年——1986年，奥地利科学院做了两件事：一是在原来的亚洲文化和思想史研究部下专门成立了一个东亚研究室，以继续菲茨迈耶的事业。二是举行专门的学术讨论会，纪念菲茨迈耶逝世一百周年，讨论会的论文不久前由奥地利科学院出版社出版，题目是《菲茨迈耶及其在东亚学上的地位》。

(三)瑞士的汉学系和汉学研究

瑞士的汉学研究史上没有菲茨迈耶这样的人物，但是苏黎世大学早在1949年就成立汉学专业，远比维也纳大学要早。此外瑞士在日内瓦大学还设有汉学副专业，在伯尔尼大

学的实用语言学院设有中文组。

苏黎世大学的第一任汉学教授是查尔纳（E. H. von Tscharner）。查氏研究和翻译过李白的诗歌，还研究过老子和道家，是战后瑞士汉学的奠基人。他又是1947年创刊的《亚洲研究》（Asiatische Studiens）的主编之一。该半年刊由同年成立的"瑞士亚洲学会"（Die Schweizische Gesellschaft fuer Asienkunde）创办，它的前身是"瑞士东亚学爱好者协会"（Die Schweizische Gesellschaft der Freude Ostasiatischer Kunde）出版的《东亚学通讯》年刊。所有这些都得到了富有并有崇高社会地位而又热爱中国文化的法慈（Robert Fazy）博士的慷慨支持。

1968年苏黎世大学在汉学专业之外，又增设日本学专业，目前加上副专业朝鲜学，共同构成了东亚系，隶属于第一哲学学院。《亚洲研究》目前由苏黎世大学东亚系主编，瑞士社会科学院资助出版。至今已出90多期。又有《瑞士亚洲研究丛书》（Schweizer Asiatische Studien Monographien），所出数种，大部分为汉学方面的专著，如：第一本《中国立宪政府的产生（1905—1908）》、第五本《人民中国的党和法律》和第六本《榜样和漫画——1773—1890年德国文献中的中国和日本》④。

现任苏黎世大学汉学教授伽思曼（Robert Gassmann）主攻先秦两汉的思想和哲学。著有《正名——论中国古代哲学资料》和《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分别为《瑞士亚洲研究丛书》第七、第八本。⑤苏黎世大学汉学方面的图书有4万多册，包括丛书、类书、宋元明清的方志和佛道文献等。1992年7月，东

亚系新楼落成，曾向欧洲各国同行广下请柬，同庆乔迁之喜，一时成为盛事。

---

① 此外，维也纳经济大学在"经济语言系"开设的十六门外语中，也有中文口语和会话等四门课程。

② 关于菲茨迈耶的生平均见《菲茨迈耶及其在东亚学上的地位》一书(Otto Laedstdetter und Sepp Linhart, August Pfizmaier und seine Bedeutung fuer die Ostasienwissenschaften, Wien, 1990)，特别是第75—90页。

③ 后来有人说，菲茨迈耶看的不是中文，而是日文报纸。见上引书第87页注23。

④ Bd.1, Norbert Meienberger: The Emergence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n China(1905—1908). The Concept Sanctioned by the Empress Dowager Tz'u Hsi. 1980. 115 S.
Bd.5, Harro von Senger: Partei und Gesetz in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1982, 395 S.
Bd.6, Ingrid Schuster: Vorbilder und Zerrdilder: China und Japan im Spirgel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1773—1890. 1988, 402 S.

⑤ Bd.7, Robert H. Gassmann: Cheng Ming, Richtigstellung der Bezeichnungen. Zu den Quellen eines Philosophems im Antiken China. Ein Beitrag zur Konfuzius-Forschung. 1988. 436 S.
Bd. 8, Robert H. Gassman: Tung Chung-shu. Ch'ung-ch' iu fanlu. Ueppiger Tau des Fruehling und Herbst-Klassikers. Uebersetzung und Annotation der Kapitel Eins bis Sechs. 1988. 420 S.

附　录

1.德语国家中国学家小传

说明:1.1992年底以前已去世者不录。

2.按德文姓名字母顺序排列先后。

B

巴尔克(BARKE, Wolfgang)

汉学博士，汉堡亚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主要致力于研究中国当代政治、经济、外交和人物的传记撰写工作。自六十年代以来仅由《亚洲研究所》出版的专著即达十六种。主要有《中国的石油经济》(1975);《二十世纪一百名中国重要人物辞典》(1985);《1922—1988年中国党的领导人传记辞典和分析》(1990);《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名录》(Who's Who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Muenchen,1991)。后者1991年第三版收录人物2400多名,两册共1356页。

鲍威尔(BAUER,Wolfgang)

中文名鲍吾刚。慕尼黑大学东亚系汉学教授，系主任。1930年生于德国哈勒(Halle)。1948年入慕尼黑大学学习汉学、日本学、蒙古学和哲学。1953年博士毕业。博士论文

是《张良和陈平——两位西汉开国政治家》。1954年开始在母校任教。1958通过教授论文。1960曾任美国密西根大学客座教授。1961—1962年先后在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和香港、台湾、日本等地做研究工作。1962年受聘为海德堡大学主任教授，创办了该校汉学系。1966年开始任慕尼黑大学汉学教授至今。1981—1983年任慕尼黑大学古典学和文化科学学院院长，1984—1986年任校务委员。1985年当选为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1991年为莱茵—威斯特法伦科学院院士。鲍吾刚是国际知名的汉学家。1968—1969年和1977年他曾两度被美国密西根大学聘为客座教授，1984年曾受聘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日本筑波大学讲学。鲍吾刚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发表论著甚多，重要者有：

1. Der Chinesische Personenname. Die Bildungsgesetze und Hauptinhalte von Ming, Tzu und Hsiao-ming. (Asiatische Foeschungen, Bd.4) Wiesbaden, 1959, 406 S.（《中国人的名字——名、字和小名的构成规律和主要内容》）
2. Die Goldene Truhe. Chinesische Novellen aus zwei Jhartausenden (zusammen mit Herbert Franke) Muenchen, 1959, 1961, 1964, 444 S. Englisch Uebersetzang, The Golden Gasket. Chinese Novellas of Two Millenia New York, 1964.（《百宝箱——二千年来中国小说选》）
3. China und die Hoffnung auf Glueck. Muechun, 1971, 703 S.（《中国人的幸福观》）

4. Das Antlitz Chinas. Die autobiographische Selbstdarstellung in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von ihren Anfaengen bis heute, Muenchen, 1990, 928 S.(《中国人的自我——古今中国文献中自传性作品的自我描述》)

5. Das Chinesische Deutschlandbild der Gegenwart.(Muenchener Ostasiatische Studien, Bd. 56) Stuttgart, 1989.(合编:《中国人的德国形象》,中国人研究德国论文索引)

宝黛尔(BEUTEL, Helga)

女,汉学博士,原东德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人员。主要研究现代汉语语法,曾参加两卷本《德汉词典》编纂工作。

毕格(BIEG, Lutz)

科隆大学东亚系中国现代文学与哲学教授。

1943 年生于乌珀塔尔(Wuppetal)。先后在科隆大学和海德堡大学学习汉学、满族学、日本学、日耳曼语言文学和哲学。1971 年以一篇研究黄庭坚(1045—1105)的论文获海德堡大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1975—1977年进修图书馆学。1977—1982 年受德国学术交换处派遣,在广州、上海和香港任德文教员。1986 年在柏林自由大学通过教授论文。1989 年开始任科隆大学东亚系现代中国专业的教授,重点为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和中国哲学。其主要论著有《1978—1984 年间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倾向》(1986);译有白桦、陈若曦、余光

中等人的作品；发表论文二十多篇。

毕少夫(BISCHOFF, Friedrich A.)

1928年生于维也纳。1958年巴黎大学汉学专业博士毕业。1959至1982年先后在波恩大学、日本东京大学和美国印地安纳大学做教学和研究工作。1982年任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中国文学方面的主任教授。主要研究诗歌和赋，兼及蒙古学。著有《赋的诠释——中国文学修辞学的研究》(Interpreting the Fu, A study in Chinese literaty rhetoric. 1976)等。1993年退休。

宾格尔(BUNGER, Karl)

1903年生。二十年代末在柏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发表过介绍中国民法、私法和贸易法的文章。1931年以研究德国和外国法律取得法学博士学位。1934年出版《中国民事和贸易法律手册》，1946年在北京出版《唐代法律史资料》一书。二战前在北京"中德学社"做研究工作。1951年获得教授资格。五十年代以来主要研究中国现代政治、社会和法律。

C

张聪东(CHANG, Tsung-tung)

法兰克福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

1931年生。原在法兰克福大学学习经济学。1961年获博士学位。1970年又获哲学博士学位。1972年任法兰克福

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至今。主要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先秦史。

主要论著有：

1. Der Kult der Shang-Dynastie im Spiegel der Orakelinschriften, Eine palaeographische Studie zur im archaischen China, 1970, Wiesbaden.（《甲骨占卜所反映的商代祭祀——中国上古宗教的古文字研究》）

2. Metaphysik, Erkenntnis und Praktische Philosophie im Chuang-tzu, Frankfurt, a.M, 1982.（《庄子的诡辩、知慧和实践哲学》）

乔伟(CHIAO, Wei)

德国特利尔大学汉学系退休主任教授。

德籍华人。1926年生于河北深县。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和台湾大学中文系学习。1957年来欧洲求学。1967年开始在波恩大学东方语言系讲授中文。其后同时在该校汉学系教授中国文学和哲学。维也纳大学获得民族学博士毕业。曾任波恩大学东方语言系中文专业高级讲师和教授。1982年受聘代理新成立的特利尔大学汉学系教授，后正式任主任教授。1991年退休。

乔伟主要研究领域是汉语语言学，其博士论文是《中国山西和四川的地名》。1980年与人合著《汉语发音》。目前主持大众汽车基金会资助的《传统"气"的概念对现代汉语的影响》研究项目和其他词典及中文教科书的编纂工作。

D

德博(DEBON,Gunther)

海德堡大学退休教授。1921 年生于慕尼黑。1938 年中学毕业后曾被征人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英军所俘。被俘期间学得中文知识。1948 年释放后入慕尼黑大学学习汉学、满族学、日本学和梵文。1953 年博士毕业，在科隆大学教中文。1959 年取得教授资格，1964 年任该校教授。1968 年受聘任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直至 1986 年退休。

德博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古代诗歌，尤其是唐代诗歌。从五十年代以来他就翻译出版了多种唐诗选本及中国古典诗歌选集，受到德国学术界的好评。他本人也是一位诗人和散文作家。1989 和 1990 年分别出版了自己的诗歌和散文集。德博从八十年代以来致力于德国及欧洲文学关系史的研究。1982年他主持召开了"欧洲——中国"学第一届国际学术讨论会："歌德与中国——中国与歌德"；1988 年又主持了"欧洲——中国"学第三届国际学术讨论会："二十世纪的德中文学关系"。并于同年创建了"欧洲和中国"学会(Euro-Sinica e. V.)，任副会长。该会的宗旨是研究欧洲文化与中国文化相互影响和相互交流关系的历史。在这方面德博即将发表的著作和论文有《德国小说中的道家思想》，《叔本华理解的"道"是什么?》，《施瓦冰(Schwabing)和中国》等。汉学方面的主要论著如下：

1. Ts'ang-lang's Gespraeche ueber die Dichtung. Ein Beitrag zur Chinesischen Poetik. Wiesba-

den,1962.(《沧浪诗话》研究》)

2.Lob der Naturtreue. Das Hsiao-shan hua-p'u des Tsou I-kuei(1686—1772). Wiesbaden.1969.(《忠实自然的褒奖——邹一桂的《小山画谱》》,与周春山合著)

3. Geundbegriffe der Chinesischen Schrifttheorie und ihre Verbindung zu Dichtung und Malerei, Wiesbaden,1978.(《中国文字学的基本概念及其与诗和画的关联》)

4.Oscar Wilde und Taoismus,Bern, Frankfurt a. M.New York,1986.(《王尔德和道教》)

5.Chinesische Dichtung. Geschichte, Struktur, Theorie. Leiden, 1989.(《中国诗歌的历史、结构和理论》)

多默寺(DOMES,Jurgen)

德国萨尔兰大学中国政治教研室主任教授。

1932年生于吕贝克(Luebeck)。1960年博士毕业。1967年在柏林自由大学通过教授论文。同年任该校中国及东亚政治教研室主任。1969年任教授。1975年受聘任萨尔兰大学中国政治教研室主任教授至今。主要研究比较政治学和中国现代史、文革史。主要论著有:

1.Kulturrevolution und Armee, Die Rolle der Streitkraefte in der Chinesischen "Kulturrevolution".1967.(《中国文革中军队的作用》)

2. Vertagte Revolution, Die Politik der KMT in China 1923—1937. 1969. (《推迟的革命——1923至1937年间国民党的政策》)

E

艾伯斯坦(EBERSTEIN, Bernd)

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教授。1942年生于汉堡。1973年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博士毕业。博士论文《明代的矿山和矿工》(1974)。1980完成教授论文。1983年任汉堡大学教授。目前主要研究兴趣是中国戏剧史、近现代史。发表的论著有《中国现代剧本》(1980)、《二十世纪的中国戏剧》(Das Chinesische Theater im 20. Jahrhundert, Wiesbaden, 1983);《汉堡—中国关系史》(Hamburg-China. Geschichte einer Partnarschaft. Hamburg, 1988)等。主编《1900—1949中国文学作品选》第四卷《戏剧卷》(1990)。

爱默尔西(EMMERICH, Reinhard)

1981年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毕业。1986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李翱传》(Li Ao. Ein Chinesisches Gelehrtenleben. Wiesbaden, 1987)。目前任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讲师,同时做教授论文。

艾姆尔西(EMMRICH, Thomas)

汉学专业博士。1991年毕业于明斯特大学汉学专业。著有《中国古代的避讳》(Tabu und Meidung im Antiken

China. 1992,。

F

费尔伯尔(FELBER,Roland)

中文名费路。原洪堡大学中国历史教授。1935年生。1966年洪堡大学中国学专业毕业。1976年完成第二博士论文(相当西德教授论文)。1977年为洪堡大学中国历史教授兼教研室主任。五十年代曾在北京大学留学多年。早期研究中国古代史,发表过《商鞅变法和中国的奴役问题》、《井田制的乌托邦》等。后来研究中国近代史,发表过关于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研究论文。著作有《中国古代交换关系的发展》(1973)等。

芬丝黛布氏(FINSTERBUSCH,Kaete)

女,慕尼黑大学退休教授。1924年生于莱比锡。1950年慕尼黑大学汉学专业博士毕业。1971年完成教授论文。1977年任该校中国考古和艺术教授。1989年退休。著有《汉代表演的内容和主题索引》(1966)、《北齐和隋朝的考古》(1976)。

苻乐瑟(FLESSEL,Klaus)

厄尔朗根一纽仑堡大学欧洲以外语言文化系汉学教授。1940年生于德国热克岭豪森(Recklinghausen)。1961年开始先后在明斯特大学和蒂宾根大学学习英国语言文学、地理学、教育学、哲学、汉学和日本学。1971年以《黄河和中国历史水利工程》获蒂宾根大学博士学位,主专业汉学,副专业日本学和地理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曾赴台湾和日本作访

问研究。1983 年通过教授论文。1984 年担任厄尔朗根一纽伦堡大学汉学教授至今。

荷乐瑟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尤其是宋史和军事史、经济史等。目前是三卷本《古代文化词典》的主编之一，并承担全部中国文化条目的撰写，1990 年所出第一卷包括《中国的上古史和历史》、《中国的艺术》、《中国的哲学》、《中国的文字和语言》、《中国的医药》、《中国的法律和裁决》、《中国的科学》等。其它主要论著有：

1. Der Huang-ho und die historische Hydrotechnik in China. Leiden, 1974.（《黄河和中国历史上的水利技术》）
2. Das Militaer im Nord-Song-Reich, Tuebingen, 1984, 317 S.（《南宋的军事》）

福赫伯(FRANKE, Herbert)

慕尼黑大学东亚系名誉教授。

1914 年生于科隆。1937 年以出版《论公司法和贸易登记注册的改革》一书获科隆大学法学博士学位。而在该书出版前，他就发表过关于中国文学的文章。后在柏林大学东方语言研究所学习中文。1947 年又取得汉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并在科隆大学任教。1951—1952 年在剑桥大学汉学系做研究工作。1953 年任慕尼黑大学东亚系汉学专业主任教授。1979 年退休。他还担任过德国东方学会主席(1965—1970)；国际东方学会联盟秘书长(1968—1970)；巴伐利亚科学院院长和德国科学协会(DFG)副主席等职。

福赫伯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重点是宋元史和蒙古史，兼及中国文学史、文化史和边疆民族史。对于德国和西方的汉学研究史，也注意及时进行总结和研究。其著述甚丰，除主编《剑桥中国史》第六卷"辽夏金元卷"外，其它主要成书者有：

1. Geld und Wirtschaft in China unter der Mongolenherrschft. Beitraege zur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r Zuan-Zeit. Leipzig, 1949, 171 S.（《蒙古统治下中国的货币和经济——元代经济史研究》）
2. Orientalistik I. Teil Sinologie. Wissenschaftliche Forschungsberichte, Bern, 1953, 216 S.（《东方学：汉学》）
3. Beitraege zur Kulturgeschichte Chinas unter der Mongolenherrschaft. Das Shan-ku sin-hua des Yang Yu. Wiesbaden, 1956, 160 S.（《蒙古统治时期中国文化史研究》）
4. Die Goldene Truhe. Chinesische Novellen aus zwei Jahrtaasenden, Uebertragen von Wolfgang Baaer und Herbert Franke. Muenchen, 1959, 446 S.（合著：《百宝箱——两千年来的中国小说》）
5. Mittelmongolische Kalenderfragmente aus Turfan. Muenchen, 1964, 45 S.（《来自吐鲁番的中部蒙古的历书》）
6. Das chinesische Kaiserreich. Fischer Weltgeschichte Bd. 19, Frankfurt a. M. 1968. 384 S.（合著：《中华帝国》）

7. Studien und Texte zur Kriegsgeschichte der suedlichen Songzeit, Wiesbaden, 1987. 335 S.(《南宋战争史的研究与文献》)

傅吾康(FRANKE, Wolfgang)

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名誉教授。

1912年生于汉堡。先后在柏林大学和汉堡大学学习汉学和日本学、历史学。1935年以《康有为及其变法派》完成博士学位。1937年赴华,在北京"中德学社"工作多年。二战期间在北京大学和四川大学任教。1950年回汉堡大学任主任教授。六十年代曾在哈佛大学和马来西亚大学任客座教授。1977年退休。他曾任德国东亚协会主席等职。德中建交,任外交部访华团顾问。著名的德国东亚学术杂志《远东学报》(Oriens Extremus)和汉堡亚洲研究所也是其倡导创办的。

傅吾康的研究重点是明清史、中国近代史。退休后又侨居马来西亚,致力于研究东南亚华人史迹。其著述甚丰,除早年出版的《中国的文化革命》(1957);《1851—1959中国百年革命史》(1958,1980);《中国与西方》(1962);《中国科举制度沿革考》(1963);《明代史籍汇考》(1968)等书外,近年来在东南亚出版的著作主要有:

1. Chinese Epigraphic Materials in Malaysia, University of Malaysia Press, 1983, 1985, 1987. 3 Bde. 1510 S. (合著;《马来西亚的中文碑刻资料》,三册)

2. Chinese Epigraphic Materials in Indoneisa,

Singapore,1988,Bd 1.575 S.（合著：《印度尼西亚的中文碑刻资料》，一册）

3.Selected Papers on Ming and Qing History and on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1942—1988),Singapore,1989,618 S.（《明清史及东南亚华侨研究论文选，1942—1988》）

弗里德里西(FRIEDRICH,Michael)

中文名叫傅敏怡。1984 年慕尼黑大学东亚系汉学专业博士。博士论文是《玄学——魏晋思想史形而上学的研究》。1990 年在该校通过教授论文。目前任汉学专业讲师，并在瑞士苏黎世大学东亚系兼课。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思想史。除博士论文外，还合译过张载的《正蒙》。

G

伽思曼(GASSMANN,Robert H.)

苏黎世大学汉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著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作为瑞士亚洲研究专刊第八种 1988 年在伯尔尼和法兰克福出版。

嵇穆(GIMM,Martin)

科隆大学东亚系汉学专业主任教授。

1930 年生于德国瓦尔滕豪森(Waltenhausen)。大学毕业后于 1960 至 1963 年在台湾辅仁大学教德文。1964 年在科隆大学取得博士学位。1969 年完成教授论文。1970 年任该校

汉学教授。主要研究唐代文学和历史，满洲文献及清史。1966年出版的《段安节的〈乐府杂录〉——唐代音乐，戏曲和舞蹈的研究》(Das Yueh-fu tsa-lu des Tuan An-chieh. Studien zur Geschichte von Musik, Schauspiel und Tanz in der Tang-Dynastie) 受到学术界的很高评价。除古典汉学外，他还主持了德国大学惟一的满洲学专业，主编《科隆东亚研究丛书》。该丛书第四册即他与人合作主编的《德满词表》(Deutsch-Mandjurisches Woerterverzeichnis, 1978, Wiesbaden, 612 S.)。

格佩尔(GEOPPER, Roger)

1925年生。研究中国艺术史的教授。直至1990年退休前任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馆长。并任科隆大学东亚艺术史专业兼职教授。论著甚丰。主要有：《中国画的本质》(Vom Chinesischer Malerei, 1962)；《〈书谱〉——孙过庭论书法艺术》(Shu-P'u, der Traktat zur Schriftkunst des Sun Kuo-t'ing, 1974)；《东亚的艺术与艺术品》(Kunst und Kunsthandwerk Ostasiens, 1978)。

吉森卫尔(GISSENWEHRER, Michael)

1957年生于奥地利。曾学习戏剧、音乐和汉学。1983年维也纳大学博士毕业。博士论文是研究中国京剧演员的培养。1983—1985年在北京中国戏剧研究所研究进修。1987年上海京剧团在欧洲巡回演出，他负责学术筹备工作。目前在拜罗伊特(Bayreuth)实用文学研究所工作，1990年开始兼为美国

兹大学戏剧学教研人员。发表有《京剧——中国的戏剧时代》(1987)及有关中国戏剧剧本的翻译等。

格莱纳(GRAINER,Peter)

德国富莱堡大学东方学系汉学教授。

1940年生。中文名郭培德。1961年开始在明斯特大学学习汉学、日本学、哲学和历史学,1970年获波鸿大学中国历史专业博士学位。毕业后在该校任教。1974年任富莱堡大学汉学专业讲师。1979年在该校通过教授论文。1980年正式受聘任该校汉学系教授兼主任。格莱纳是德国有成就的明史专家。主要论著有:《明初至天顺末年(1368—1464)的锦衣卫》(Die Brokatuniform-Brigade der Ming-Zeit von den Anfaegen bis zum Ende der T'ien-shun Periode, Wiesbaden, 1975);《中国明代的登基大典和皇位继承》(Thronbesteigung und Thronfolge im China der Ming,Wiesbaden,1977)。目前的研究项目有:明代法典的翻译;明代官制的研究;唐代宫廷礼仪的研究;王建诗选注等。

葛林(GRIMM,Tilemann)

蒂宾根大学退休汉学主任教授。

1922年生。1923—1934年在中国北京、天津十多年。1953年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博士毕业。博士论文研究明代的倭寇。曾任亚洲研究所负责人。1960年取得教授资格。1962年为明斯特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1965年为波鸿大学中国历史专业主任教授。1974年转至蒂宾根大学任职。曾任该校文

化学院院长、副校长。主要研究明史和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史。曾参加《剑桥中国史》"明代卷"的编写工作。主要论著有：

1. Erziehung und Politik im Konfuzianischen China der Ming-Zeit (1368—1644), Hamburg, 1960.(《明代的教育和政治》)
2. China und Suedostasien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Koeln und Opladen, 1966. (《历史上和今天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
3. Meister Kung. Zur Geschchte der Wirkungen des Konfuzius, Opladen, 1976. (《孔子及其在历史上的影响》)
4. Sinologische Anmerkungen zum europaeischen Philosophiebegriff, Heidelberg, 1981. (《欧洲哲学概念的汉学诠释》)

车慧文(von GROELING, Huiwen)

女，德籍华人，汉学博士。1944 年生于北京。1969 年毕业于台湾淡江大学英语系。1973—1979 年在德国之声电台工作。1983 年在科隆大学东亚系汉学专业获得硕士学位。1983 年开始在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系任教。1988 年获博士学位。现为该校汉学专业讲师，主要研究和讲授中国教育、中国现代文学、台湾文学和社会、中德文化关系等。发表的论著有：

1. Leben und Werk des Chinesischen Sprachforschers Wang Li, Minerva Verlag, 1984, Mun-

chen.(《中国语言学家王力的生平和著作》)

2. Die Anfange der Frauenhochschulbildung in China an Beispiel von der Yanching University.(《中国最早的女子高等学校——燕京大学》)

格汝纳(GRUNER, Fritz)

1923年生。1962年莱比锡大学博士毕业。1967年完成教授论文。1970年开始任洪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授,1971—1975任亚洲学院副院长,1977—1986任东亚系主任。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和研究过鲁迅、茅盾、田间和王蒙的作品。他还兼治蒙古学、朝鲜学。1988年退休。

H

王海(HEBERER, Thomas)

特利尔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教授。

1947年生于美因兹的奥芬巴赫(Offenbach)。1967—1973年在法兰克福、哥廷根和海德堡大学学习政治学、汉学和民族学。1973—1977年在不来梅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1977—1981年在北京的外国文学出版社做德文翻译工作。1981—1982年获德国科学协会(DFG)资助,在凉山地区做田野调查工作。1983年以后,先后在杜伊斯堡大学和不来梅大学任教,讲授中国政治和经济课程。1989年完成教授论文。1991年为不来梅专科大学中国经济教授。1992年受聘为特利尔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教授,重点是东亚政治。王海曾访华十多次,曾经担任德国"德中友好协会"联邦委员会会长(1982—1985)

和首席会长(1985—1990)。他还是不来梅中国学社的主席，汉诺威和平与冲突研究所顾问委员。从1977年以来发表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论文和著作五十多种，主要有：

1. Dialektik von Partei und Massen. Zur Entwicklung der Massenlinie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Chinas. Bremen 1977. Dissertation.（《党和群众的辩证法——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发展》，博士论文）
2. Nationalitatenpolitik und Ethnologie in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Bremen 1982.（《中国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学》）
3. Vom Kaiserreich zur Volksrepublik. Chinas Wandel im Laufe der Jahrtausende, Bremen 1985.（《从皇朝到人民共和国——本千年来中国的变化》）
4. (ed.)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Aachen 1987.（主编：《中国的少数民族——传统与转变》）
5. Die Roll des urbanen Individualsektors fur Arbeitsmarkt und Stadtwirtschaft in China. Bremer Beitrage zur Geographie und Raumplanung, Bremen 1989, Habilitationsschrift.（《中国乡镇个体经济成分对劳动市场和城市经济的作用》，教授论文）
6. Korruption in China. Analise eines politis-

chen, Okonomischen und Sozialen Problems, Opladen 1991.(《中国的贪污腐化——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分析》)

豪塞尔(HEUSER, Robert)

科隆大学现代汉学专业教授。

主攻中国法律。曾在海德堡外国公法和民法马普研究所工作。著有《晋书的刑法志》等。1991年任科隆大学现代汉学专业法律教授。目前他还在海德堡大学、美因兹大学讲授中国法律课程。

韩翠西(HEINZIG, Dieter)

1961年东方和国际问题联邦研究所在科隆创建,主要研究东欧及亚洲共产党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韩翠西一开始就是该所负责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在科隆《东方及国际问题联邦研究所报告》(Berichte des BIOst)上发表有关中苏关系的论著多种。

亨策(HENZE, Jurgen)

1950年生。学习汉学、教育学和社会学。1977年通过国家师范资格考试,1978年为波鸿大学教育研究所比较教育研究室教师。著有《1969年以来中国的教育和培训事业》(Das Erziehungs-Bildungswesen der VR China seit 1969, 1978)和《八十年代初中国的教育和科学》(Bildung und Wissenschaft in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zu Beginn

der achtziger Jahre,1983)。

皮拉特(HERRMANN PILLATH,Carsten)

1959年生。曾学习经济学、汉学和罗马语族语言文学。博士毕业后在德国科隆东方和国际联邦研究所(Bundesinstitut fuer Ostwissenschaftliche und internationale Studien)做研究工作。其主要工作领域是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制度比较和部门经济等。目前与波鸿大学马汉茂合作主持大众汽车基金会资助的"八十及九十年代中国的现代化"的研究课题。著有《中国——文化和经济制度》(China:Kultur und Wirtschaftsordnung, 1990)等,1992年出任杜伊斯堡大学现代中国专业教授。

赫尔策尔(HERZER,Rudorf)

波鸿大学东亚学院高级讲师。

原在东德洪堡大学学习汉学。五十年代来到西德。1965年在波鸿大学东亚学院中国历史专业工作。主要研究明代历史。目前致力于翻译《明史·礼乐志》和关于"大礼议"的研究。

霍福民(HOFFMANN,Alfred)

波鸿大学东亚学院名誉教授。

1911年生。先后在柏林大学、汉堡大学学习中文,三十年代已翻译过胡适、冰心、鲁迅和朱自清、顾颉刚等人的文学作品或学术著作。在中国留学多年。1949年获汉堡大学博

士学位。先后任马尔堡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和波鸿大学中国学教授。1976年退休。主要著作有《南唐后主李煜词》(1950)及所译李煜词的德文本——《春花秋月》(Fruelingsblueten und Herbstmond,1950)。霍氏还是中国鸟名研究专家，曾花数十年精力写成《中国鸟名大全》三卷(Veroeffentlichungen des Ostasien-Instituts der Ruhr-Universitaet Bochum,Bd 13,1975;Bd 23,Bd 24,1978)。

霍夫曼(HOFFMANN,Peter)

1957年生。在蒂宾根大学学习汉学和德国语言文学。1988年开始在该校汉学与朝鲜学系做教学工作。致力于翻译中国现代诗歌。其中有闻一多的《死水》和顾城等人的作品。

何尔曼(HOELLMANN,Thomas O.)

汉学专业博士。现为慕尼黑大学人类学和非洲学研究所(Institut fuer Voelkerkunde und Afrikanistik)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边疆少数民族民俗与文化。著有《台湾中部少数民族的形成和变化》(1982)。

K

卡登(KADEN,Klaus)

洪堡大学中国语言学教授，1934年生。1963年洪堡大学汉学专业博士毕业，1976年完成第二博士论文(相当西德的教授论文)并留校任教。1983年任教授。1990年11月，出任

洪堡大学汉学系主任。主要研究汉语语法，其重要成果有：

1. Die Wichtigsten Transkriptionssysteme fur die Chinesische Sprache, Leipzig 1975,(2. Aufl. 1983).(《几种最重要的中文转写系统》)
2. Das Laut-und Tonsystem der Modernen Chinesischen Hochsprache, Dissertation B,Berlin 1976.(《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语音和语调系统》)
3. Einfuhrung in die Grammatik des Klassischen Chinesisch, Leipzig 1990. (合著：《古汉语语法入门》)

卡尔(KARL,Ilse)

女，汉学专业博士。原东德科学院语言研究中心"汉语词典学研究组"负责人。主要研究汉语语法和汉语词典学问题。是《汉德词典》主编之一。

考茨(KAUTZ,Ulrich)

1939年生，1980年洪堡大学汉学博士毕业。1987年完成第二博士论文(相当西德教授论文)，任洪堡大学讲师。主要研究现代汉语及德汉翻译理论。其第一博士论文是《德语关系从句的汉译》(Ubersetzung Deutscher Relativsatze ins Chinesisch,Berlin),1980年在东柏林出版，1984年又扩展成《德语和英语比较从句的汉译》(Chinese equivalents of German and English relative clauses.Paris)在巴黎出版英文版。另著有《德语和汉语的主动态和被动

态——比较与翻译学上的探讨》(Aktiv und Passiv im Deutschen und Chinesischen. Eine konfrontativ-uebersetzungswissenschaftliche Studie. 1991. Heidelberg)。这是作者以第二博士论文扩充而成的。主要译著有王蒙的《活动变人形》等。1991年任柏林德国中国研究会会长，目前在歌德学院工作。

坎—阿克曼(KAHN-ACKERMANN, Michael)

1946年生。1970—1975年学习汉学，兼及经济学和政治学。1975—1977年在北京大学学习中国近现代史。1981年开始在歌德学院工作，1988年任北京歌德学院校长。著有《门里边的中国》(China vor der Tuer, 1979)等。译作有张洁《沉重的翅膀》等。

卡姆朋(KAMPEN, Thomas)

汉学专业博士。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学院东亚和中国政治教研室讲师。主要研究中国当代政治和外交。

科恩(KERN, Iso)

1937年生于伯尔尼。先后在比利时鲁汶大学、德国富莱堡大学和台北、南京、北京学习欧洲哲学和中国哲学。博士论文为《胡塞尔和康德》。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完成教授论文。目前在瑞士的伯尔尼、富莱堡和苏黎世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和欧洲哲学。近著有《十七世纪中国佛教对基督教的批判》(Buddhistische Kritik am Christentum im China

des 17.Jahrhunderts,1992,Bern)。

克恩(KEEN,Ruth)

1952年生于伦敦。柏林自由大学汉学专业毕业。译作有萧红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1991)等。曾做过著名文艺杂志《时序》(Die horen)第138辑中国文学专号的编辑工作。目前在编写一部《中国作家词典》。

金德曼(KINDERMANN,Gottfried-Karl)

慕尼黑大学戈氏政治学研究所 (Geschwister Schill Institut fuer Politische Wissenschaft)教授、副所长。主要研究中国当代政治、外交及中国大陆与台湾和香港的关系。

科格尔沙兹(KOGELSCHATZ,Hermann)

汉学专业博士,慕尼黑大学东亚系讲师,主要研究中国思想史、科技史,重点是古代数学史。著有《王国维和叔本华——一个哲学的碰撞》(Wang Kuo-wei und Schopenhauer, Eine Philosophische Begegnung.1986)等。

克勒普施(KLOEPSCH,Volker)

科隆大学汉学系讲师。汉学博士,研究中国文学。著有《论诗人玉屑》(1983)和《唐代诗歌选译》,发表关于中国古代与现代诗歌的论文译著。

科尔博(KOLB,Raimund)

1986年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系汉学专业毕业。博士论文《中国古代的步兵——战国前军事史的研究》。近年参加柏林自由大学的由德国科协(DFG)资助的浙江地方史和由大众汽车基金会资助的中国病虫害研究的项目。

科仑科(KOLONKO,Petra)

女，1955生于莱茵贝格(Rheinberg)。最早在《特利尔大众之友》报(Trierischer Volksfreund)实习。后来开始在慕尼黑大学学习汉学、历史学和经济学。曾于1979—1981年和1986年在中国进修。以关于中国历史编纂学的研究取得博士学位后，在《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n Zeitung)政治编辑室工作。1989年开始任该报驻北京记者。

科岑贝柯(KOTZENBERG,Heike)

女，中国书法艺术研究者。1957年开始先后在波恩大学、慕尼黑大学、汉堡大学和海德堡大学学习汉学、东亚及欧洲艺术史和比较宗教学，1970年波恩大学博士毕业。博士论文是《鲍照——其生平和著作的研究》。1971年留校任汉学系助教。1979年以《中国画中的图画和题词》为题完成教授论文。曾在台湾故宫博物院、日本和北京、杭州进修访问。1983—1985年任法兰克福艺术手工品博物馆东亚部代主任。1985年任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研究馆员。1992年代理馆长。

李玛可(KRIEGESKORTE,Magnus)

1948年生。1968年以来先后在科隆大学和波恩大学学习汉学、日本学和哲学，1984年在波恩大学汉学系获博士学位，毕业后曾在科隆大学兼课。1986--1988年在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明治维新后到辛亥革命前中国和日本的关系。目前他除在比利时鲁汶大学兼授"本世纪的日中关系"外，还参加特利尔大学"气"对现代汉语的影响的研究项目。出版有《虞集——蒙古统治下的一个文人官僚》(Yu Ji, ein Literaten-Beamter unter der Mongolenherrschaft,Bonn 1984)。拟写的教授论文是《中国留日学生的监督机构》。

关愚谦(KUAN,Yu-chien)

德籍华人，1931年生于广东，五十及六十年代在北京外事部门工作。1969年到德国。1973年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学习，并担任教学工作。1978年出版的《曹操的生平及其现实评价》(Cao Cao's Leben und seine gegenwaertige Bewertung,Hamburg 1978)即是其博士论文。现任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资深讲师，担任过欧洲华人学会副会长及会长。他参与编译的《鲁迅选集》德文本已经陆续出版。目前还从事《西厢记》的翻译工作。

顾彬(KUBIN,Wolfgang)

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系中文专业主任教授。1945年生于德国策勒(Celle)。1966年在明斯特大学学习神学，1968—

1973年改读汉学，兼修德国语言文学、哲学和日本学。1973年在波鸿大学获博士学位。1974—1975年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1981年在柏林自由大学通过论文答辩，获得汉学教授资格。1985年为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系中文教授。顾彬的博士论文是研究杜牧的抒情诗的，教授论文是已经译成中文的《中国文人的自然观》。目前主编《袖珍汉学》(Mini-Sinoca)。主持多卷本《鲁迅选集》的翻译工作。正在写作九卷本《中国文学史》。

库富思(KUHFUS,P.M)

1949年生，七十年代中蒂宾根大学汉学专业毕业。毕业后留校任教，先为该校汉学专业讲师。主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当代政治等。

迪特·库恩(KUHN,Dieter)

威尔茨堡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

1945年生。科隆大学东亚系汉学专业毕业。柏林自由大学完成教授论文。曾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工作多年。1988年任威尔茨堡大学主任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科技史和宋史。著述甚丰。七十年代发表有关于中国古代织机的论著。1987年出版的《宋代文化史》(Die Song-Dynastie, eine neue Gesellschaft im Spiegel ihrer Kultur, Weinheim)。有528页。地图20幅，插图170余帧。被誉为欧洲第一部系统的宋代断代史著作。他还是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九册《纺织技术——纺纱和缫丝》(1988)的编

著者。

1991年他又出版了《十世纪以前中国贵族的礼法》(Statusund Ritus.Das China der Aristokraten von den Anfaengen bis zum 10. Jahrhundert nach Christus, Heidelberg,1991)。目前除为《中国科学技术史》撰写第五卷第十册《织机和编织样式》外,还有德国科协(DFG)资助的辽宋金时期上层墓葬的社会考古学研究的项目。

郭恒钰(KUO,Heng-yu)

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系汉学教授。

德籍华人。1929年生于山东青岛。曾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来德后,先在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系学习并任教,七十年代末任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近年主编《柏林中国学研究丛书》,并承担大众汽车基金会"近代德中关系史"的研究项目。其发表的主要著作有:

1. China und die "Barbaren", eine geistesgeschichtli.Pfullingen 1967.(《中国和"蛮夷"——一个思想史的定位》)
2. Mao's Kulturrevolution.Pfullingen 1968.(《毛的文化大革命》)
3. Die Komintern und die Chinesesche Revolution,Die Einheitfront zwischen der KP Chinas und der Kuomintang 1924—1927. Paderborn 1979.(《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1924至1927年国共统一战线》)

库普夫(KUPFER, Peter)

汉学博士,美因兹大学实用语言学院中文系讲师。"汉语教学研究会"(德国、奥地利、瑞士)会长。《汉语语言学丛书》(Sino-Linguistica)主编之一。主要从事有关汉语教学和汉学语法的研究工作。

L

拉霍纳(LACHNER,Anton)

1987 年波鸿大学汉学专业博士毕业。博士论文是《王文兴的文学移风易俗——小说〈家变〉的语言和风格》。目前在伯尔尼大学语言学院实用语言系中文组工作。是德语区《汉语语言学丛书》(Sino-Linguistica)主编之一。

拉克纳(LACKNER,Michael)

中文名郎宓谢。八十年代中慕尼黑大学汉学专业博士。1990 年完成教授论文。主攻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曾任德国大众汽车基金会中国项目顾问,近年来先后在巴黎高等科学院、柏林科学院、日内瓦大学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1993 年受聘为哥廷根大学汉学专业教授。著有《忘却的记忆——耶稣会士研究记忆术的论著〈西国记法〉》(Das vergessene Gedaechtnis. Die jesuitische memotechnische Abhandlung Xiguo Jifa, 1986, Wiesbaden, 139 S.)等。

拉德斯德特(LADSTAETTER,Otto)

维也纳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

1933 年生，1960 年博士毕业，1967 年完成教授论文。曾在台湾政治大学学习，六十年代初任波恩大学东方语言系中文专业的负责人。其时他的研究重点是汉语语言学，特别是现代汉语语法，汉语中的外来语等。1970 年出任蒂宾根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1973 年转任维也纳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至今。近年来，拉德斯德特除研究汉语语言学外，还进而研究中国古代诗歌、戏剧和小说。著有《蒲松龄的生平及其白话著作》(1961)、《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语言构成》(1963)等。

郎鹤立(LANG, Heribert)

1947 年生。1970—1977 年在法兰克福大学学习汉学、哲学和普通语言学。1977—1980年曾在上海复旦大学进修。1981 年取得法兰克福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汉语和"语言的相对性原则"》(Die Chinesische Sprache und der "sprachliche Relativitaetsprinzip", 1981, Frankfurt)。1982 年至今在特利尔大学汉学系任教。教授论文准备研究中文构词法。

陈月桂(LAN-TAN, Goatkoei)

女，1948 年生，印尼华裔，德籍。开始学习音乐，后转读德国语言文学，获硕士学位。1984 年海德堡大学汉学专业博士，其博士论文《难觅的隐士——唐代的隐逸诗》(Der unauffindbare Einsiedler. Ermiterlyrik der Tang-Zeit. Frankfurt a.M. 1985)，把隐士分成儒家型、道家型、庄子

型和其他等类型。除古典文学外，她也研究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目前在慕尼黑大学做教授论文，同时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兼授中国文学课程。

劳武一(LAU,Ulrich)

洪堡大学汉学博士，原任洪堡大学讲师。担任中国古代语言和历史教学工作。专攻周代史和青铜器。1989 年完成的教授论文《西周土地分配和转让的史料研究》(Quellenstudien zur Landvergabe und Bodenuebertragung in der Westlichen Zhou-Zeit)将收入《华裔学志丛书》(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出版。目前参加柏林自由大学的一个研究项目。

雷德侯(LEDDEROSE,Lothar)

海德堡大学艺术史研究所东亚部主任教授。1942 年生于慕尼黑。1961—1969 年先后在 Cologne、波恩、巴黎、台湾和海德堡大学学习东亚艺术史、欧洲艺术史、汉学和日本学。1969 年获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博士学位。毕业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和哈佛大学作博士后研究(1969—1971)、在台湾故宫博物馆(1971—1972)、日本东京大学(1972—1975)和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1975—1976)做研究工作。1976年完成教授论文。同年出任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主任教授。1978 年任该校哲学和历史学院院长。雷氏是国际知名的学者，曾任德国东方学会 (DMG) 主席 (1984—1990)；国际东方学大会(ICANAS)主席(1986)。他还是德国海德堡科学院院士、英国

剑桥大学客座教授、美国华盛顿国家艺术馆客座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艺术史、历代书法艺术和敦煌石窟艺术等。著述甚丰，除1990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晋唐书法考——德国学者谈中国书法》外，主要有：

1. Die Siegelschrift (chuan-shu) in der Ch'ing-Zeit.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Schriftkunst. Wiesbaden, 1970.（《清代的篆书——中国书法艺术史研究》）
2. Mi Fu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of Chinese Calligraph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米芾和中国书法的古典传统》）
3. edit. Im Schatten hoher Baeume. Malerei der Ming und Qing-Dynastien. aus der Volkrepublik China. Baden-Baden, 1985.（主编：《高树荫下——来自中国的明清绘画》）
4. Orchideen und Felsen. Chinesische Bilder im Museum fuer Ostasiatische Kunst, Berlin. Gesamtkatalog, in press.（主编：《兰石——东亚艺术博物馆的中国画》，即出）

劳特娜(LEUTNER, Mechthild)

女，中文名罗梅君。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系汉学教授。

1949年生。在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系获硕士、博士学位。1990年任该校东亚系汉学专业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现为柏林市议会议员。主要著作有《北京的生死婚嫁——

十九世纪到现在的民间文化和精英文化》(Geburt, Heirat und Tod in Peking, Volkskultur und Elitekultur vom 19.Jahrhundert bis zur Gegenwart.Berlin,1989)。

刘奋明(LIEW,Foon Ming)

女，华裔德籍。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兼任教员。1982年汉堡大学硕士毕业，主修汉学，兼修英国语言文学。1984年以《明代的屯田》获得博士学位，1992年以《明代兵志译注》获得教授资格。目前除在汉堡大学讲授中国古代史外，致力于翻译《明史》。

林可(LINCK,Gudula)

女，德国基尔(Kiel)大学汉学教授。

1943年生于美因兹。1962—1968年先后在慕尼黑大学习新闻学、英文和哲学，在格尔默尔斯海姆(Germersheim)外国翻译学院(现为美因兹大学实用语言学院)学习法语和西班牙语，并获得法语和西班牙语翻译学位证书。1968年开始学习民族学、上古史和汉学。1971—1973在日本和台湾学习中文和日文。1975年硕士毕业。主专业汉学，副专业民族学和日本学。1978年完成博士论文，题目是：《台湾土著和汉人的联系与冲突的历史发展》。1978年以来在富莱堡大学担任研究和教学工作。1984年以研究中国十三世纪的家庭社会史取得教授资格。1986年在美国伯克利，1988—1989年和1989—1990年先后在北京做研究访问。1990年10月受聘为基尔大学汉学主任教授，创办该校东方学系的汉学专业。

林可的研究与教学重点是中国社会史，特别是家庭、婚姻、伦理、道德和人际关系等问题。发表的主要著作有：《十三世纪中国家庭的社会史》(Zur Sozial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Familie im 13.Jahrhundert.1986, 230 S. Muenchener Ostasiatische Studien,Bd.40.)等。

李佩尔特(LIPPERT,Wolfgang)

厄尔朗根一纽仑堡大学欧洲以外语言文化系汉学专业主任教授。1931 年生于撒克森的霍垦多夫(Hockendorf)。1952—1957 年在东德洪堡大学学习汉学、日本学和社会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59—1961年调任东德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持《汉德词典》(该书已于 1985 年出版)的编纂工作。1961 年到西德。1962 年开始在法兰克福大学东亚系任职。1964 年取得博士学位。主专业汉学，副专业日本学和斯拉夫语言文学。1965—1970 年出任日本大阪歌德学院校长。回国后先后在汉堡大学及蒂宾根大学任教。1976 年在汉堡大学通过汉学教授论文。1978年受聘为蒂宾根大学汉学专业主任教授至今。

李佩尔特主攻汉语语言学和中国现代史。主要著作有：

1. Das Satzthema in der modernen Chinesischen Sprache. Frankfurt a.M.1965. (《现代汉语的句子成分》,博士论文)
2. Entstehung und Funktion einiger Chinesischer Marxistischer Termini.Der lexikalisch-begriffliche Aspekt der Regeption des Marxismus in

Japan und China. Wiesbaden, 1979.（《若干中文马克思主义术语的产生和作用》，教授论文）

刘仁楷(LIU, Jen-kai)

汉堡大学汉学博士，汉堡亚洲研究所研究人员。

1946 年生。1975 年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博士毕业。1976—1977 年曾在香港工作。1981—1983 年为德中友好协会联邦总干事，《新中国》(Das neue China) 主编。1984 年为汉堡亚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目前为正式研究员。博士论文《新唐书中的佞臣、叛臣和逆臣》。近年发表过关于中国当代领导人的传记著作。

刘茂才(LIU, Mau-tsai)

德籍华人，出自汉军旗籍，1914 年生于中国东北，三十年代来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先后在哥廷根大学和波恩大学讲授汉语和汉学，并先后完成博士论文(1956)和教授论文(1966)。1967 年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设置第二位主任教授，刘茂才膺其选，1980 年退休，现为该校名誉教授。其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文学，突厥史和边疆史，兼及汉语语言学。重要论著有：

1. Die Chinesischen Nachrichten zur Geschichte der Ost Tuerken (T'u Kue). Wiesbaden 1958, 2 Bde. 831 S.（《关于突厥史的中文资料》）
2. Kutscha und seine Beziehungen zu China vom 2. Jh. v. bis zum n. Chr, 2 Bde, Wiesbaden 1969,

305 S.(《二至六世纪库车与中国的关系》)

娄文(LOUVEN,Erhard)

杜塞尔多夫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

1938年生于肯彭(Kempen)。早年在企业界工作。后在波鸿大学学习经济学和社会学。1975—1981年为该校东亚学院和研究和发展政策研究所工作。1981年为汉堡亚洲研究所研究员。1991年为杜塞尔多夫大学东亚系教授。著有关于中国经济的论著多种。如《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景》(Perspektiven der Wirtschaftsreform in China, Berlin,1987);《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科技合作》(合著)(Wissenschaftliche Zusammenarbeit zwischen der Volksrepublik Deutschland,Hamburg,1986);《九十年代初的中国经济:结构和改革》(主编)(Chinas Wirtschaft zu Beginn der 90er Jahre. Strukturen und Reformen. Hamburg,1989)。

露可丝(LUX,Claudia)

女,曾在波鸿大学学习汉学。1985年硕士毕业后又学习图书馆学。目前在柏林普鲁士文化遗产国立图书馆(Staatsbibliothek Preussischer Kurtulbesitz)工作。著有《延安时期——中国政治、经济的关键进程(1937—1945)》(Der politischoekonomische Entscheidungsprozess in China 1937—1945,die Yan'an-Periode,Bochum 1986);《中国的图书馆事业》(Das Bibliothekswesen der Volksrepu-

blik China,Muenchen,1986)等。

M

马汉茂(MARTIN,Helmut)

波鸿大学东亚学院中文系主任教授。1940 年生于德国卡塞尔(Kassel)。先后在慕尼黑、贝尔格莱德、巴黎和海德堡学习汉学和斯拉夫语言文学。1966 年在海德堡大学中国文学专业博士毕业。1967—1969 年在台湾大学、1970 年在日本京都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工作。1972—1979 年为汉堡亚洲研究所研究员,期间在汉堡大学通过教授论文。1979 年任波鸿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主任教授。1980—1982 年兼北威州东方语言学院第一任主任。1984—1986 年任波鸿大学东亚学院院长。曾多次作为客座教授访问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日本、美国。主编《中国论文》丛书(Chinathemen)。目前正在筹办"卫礼贤翻译学院",计划系统翻译介绍海峡两岸的中国文学作品。马汉茂主要研究中国文学,兼及中国政治。发表的论著很多,特别是主持翻译了王蒙、冯骥才、巴金、白先勇、钱钟书、李昂等的大量现当代文学作品和一些政治人物的著作。其他主要论著有:

1. Li Liweng Ueber das Theater,Heidelberg 1966. 395 S.(《李笠翁论戏剧》,博士论文;中文版,台北,1968 年)
2. 主编:《李渔全集》,台北,1970 年,共 15 册。
3. Chinakunde in der Sowjetunion,Hamburg 1972.(《苏联的中国学》)

4. Chinesische Sprachplanung, Bochum 1982.（《中国的语言计划》，教授论文）

5. Schwarze Augen suchen das Licht, Chinesische Schriftsteller der achziger Jahre. Hrsg mit Karl-Heinz Pohl. Bochum 1991, 105 S.（合编：《寻找光明的黑眼睛——八十年代中国作家创作谈》）

冯门德（von MENDE, Erling）

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系汉学专业主任教授。

1940 年生。大学主修汉学，兼修满族学、日本学等。1968 年科隆大学东亚系博士毕业。1971 年开始任该校汉学讲师。1979 年通过教授论文。1983 年任自由大学东亚系主任教授。

冯门德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清史、近代欧洲与中国关系史，兼及隋唐东北亚关系史。他是德国目前能够在汉学系开设满文的教授之一。近十年来他承担了德国科学协会和大众汽车基金会多项研究项目。如清代西北史地、谭嗣同研究、中国民俗研究、中国和欧洲的音乐等。发表的论文、著作和书评共五十多种，主要有：

1. Die wirtschaflichen und konsulaeren Beziehungen Norwegens zu China von der Mitte des 19. Jhs. bis zum 1. Weltkrieg. Koeln, 1971.（《十九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挪威和中国的经济与领事关系》，博士论文）

2. China und die Staaten auf der koreanischen

Halbinsel bis zum 12. Jarhundert. Eine Untersuchung zur Entwicklung der Formen zwischen staatlicher Beziehungen in Ostasien. Koeln. Wiesbaden 1982.(《十二世纪以前的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国家——东亚国家关系形式的发展的研究》，教授论文)

3. Einige Bemerkungen zu den Drachansgaben des mandjurischen Neuen Testamens. In: Oriens extremus No. 19,1972.(《关于〈新约全书〉满文版本的几点意见》)

4. Korea und das T'ang-Reich. Versuch eines Koreabildes anhand der Chinesischen Gesandtschtsdichtung. In: die Ver;fftlichung der Ring-Vorlesung zur Tang-Zeit, Bonn 1987.(《朝鲜和唐帝国——从中国使节的诗来看当时朝鲜的形象》)

宓塔克(MITTAG, Achim)

1984 年嘉尼黑大学汉学专业毕业，1989 年获汉学博士，现为嘉尼黑大学东亚系汉学专业讲师。著有《宋代的诗经学》。主要研究宋代学术史。

莫里茨(MORITZ, Ralf)

1941 年生于莱比锡。1969 年莱比锡大学博士毕业。1980 年完成第二博士论文(相当于西德的教授论文)。1984 年任该校汉学专业主任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史，重点是

先秦。著有《惠施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1973)、《哲学与自然科学——中国的自然哲学》(1978,再版1988)、《中国古代哲学》(Die Philosophieim alten China, 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Berlin,1990)等。后书讲先秦时期儒家及诸子哲学。

莫迟(MOTSCH,Monika)

女,汉学博士,波恩大学东方语言系中文专业讲师。著有《现代汉语简明语法》(1985);《清代小说〈醒世姻缘传〉》。译作有钱钟书的《围城》等。

梅爱华(MULLER,Eva)

女,洪堡大学中国文学教授。

1933 年生,1954 年曾在北京大学学习。1965 年洪堡大学汉学专业博士毕业。博士论文是《从开始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白蛇传"故事的流传和发展》。1978 年完成的教授论文是《人民中国叙事诗中的工人形象》。1983 年任洪堡大学汉学系教授,1985 年任系主任。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重点是诗歌。翻译介绍过艾芜、陈国凯、张辛欣、桑晔等的作品。

明策尔(MUNZEL,Frank)

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兼职教授,讲授中国法律等课程。曾著有《从〈明史·刑法志〉看中国古代的刑法》等书。

O

欧布里西特(OLBRICHT,Prter)

1909年生于魏玛(Weimer)。1950年在哥廷根大学通过教授论文。1956年在波恩大学汉学系任教。1963年任主任教授。1975年退休。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宋元史，兼治古代诗歌。著有《十一世纪中国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欧阳修》(1939)；《十三、十四世纪蒙古统治下中国的驿站》(1954)；合著有《东方的诗》、《中国的思想世界》、《中国诗歌三千年》、《〈蒙鞑备录〉和〈黑鞑事略〉》。

奥皮茨(OPITZ,Peter Joachim)

中国哲学思想史专家。1965年开始在慕尼黑大学戈氏政治研究所(Geschwister Scholl Institut fuer Politische Wissenschaft)工作。1978年任教授。目前任该研究所所长。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并讲授中欧古代政治哲学比较研究的课程。著有中国哲学和思想史论著数种。

P

佩舍尔(PESCHEL,Sabine)

女，1955年生。在蒂宾根大学学习汉学和德国语言文学。曾在台北进修。毕业后曾在日本教德语(1982—1984)。1985年后在柏林工作。1988—1991年在柏林艺术学院工作。翻译过巴金等人的文学作品和中国电影。并为报刊杂志和电台电视台撰稿。1992—1993年致力于为柏林世界文化大厦

(Das 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 Bolin) 的"中国新潮文艺"(Chinesisch Avantgarde)周做文学方面的组织工作，实际主持著名文艺杂志《时序》(Die horen) 第 169 辑(1993 年 1 月)中国文学专号的编辑工作。

皮尔茨(PILZ,Erich)

汉学博士,1941 年生，专长中国历史。七十年代维也纳大学汉学系创设之初,即在此任教,博士论文为研究马建忠的《马氏文通》。目前任该系讲师，讲授古代文献及中国历史课程。近著有《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中的社会史及其理论架构——关于汉代社会的讨论》(Gesellschaftsgeschichte und Theoriebildung in der Marxistischen Chinesischen Historiographie, zur Entwicklung der Diskussion um die Han-Gesellschaft, Wien,1991, 356 S.)。

卜松山(POHL,Karl-Heinz)

特利尔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1945 年生于德国萨尔兰州。1970—1975 年在汉堡大学学习汉学、日本学和艺术史。1975—1976 年在台湾辅仁大学学习中文，并曾在逢甲学院教德文。1976—1977年在波恩大学东方语言系中文专业学习,并取得现代汉语翻译文凭。1977—1978 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系学习汉学，获硕士学位。1981—1982年曾在南京作研究访问。1982 年以研究郑板桥的诗画和书法获多伦多大学博士学位。1983 年开始任威尔茨堡大学汉学系高级讲师。1987 年任蒂宾根大学中国文学和思想史教授。

1989—1991年为该校汉学及朝鲜学系主任，1990—1991年任文化学学院院长。1992年10月被聘为特利尔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主要研究中国文学史、美学史和思想史。发表的论著有：

1. Zheng Ban-qiao, poetry, paiting and calligraphy, monementa Sirea Bd. 1987.（《郑板桥——诗人·画家·书法家》）
2. Der Pfirsichbluetenquell, Gesmmelte Gedichte, Hrsg. Koeln, 1985.（主编：《桃花源——陶渊明诗集》）
3. Der Weg des Schoenen, Wesen und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kultur uad Aesthetik, Freiburg i.B. 1992.（主编：《李泽厚〈美的历程〉》）
4. Schwarze Augen suchen das Licht, Chinesische Schrifsteller der achziger Jahre. Bochum 1991. 105 S.（合编：《寻找光明的黑眼睛——八十年代中国作家创作谈》）
5. Ye Xie's "On the Origin of Poetry", A Poetic of the Early Qing. In: T'oung Pao, No. 78 (1992).（《论叶燮的〈原诗〉》）

鄂尔克尔特(PORKERT, Manfred)

慕尼黑大学东亚系汉学教授。主要研究中国针灸和中医史。著有《中医诊断教程》(1983)，翻译有罗冠中《三国演义》(1986)。

帕塔克(PTAK,Roderich)

美因兹大学实用语言学院中文系教授。1955年生。幼年在葡萄牙。1973年开始在海德堡大学学习汉学、东亚艺术史和普通语言学。1975年曾在中国、香港和加拿大做访问研究。并在加拿大取得国民经济学硕士学位。1978年在海德堡取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郑廷玉的戏剧》讨论了元杂剧家郑廷玉的《金凤钗》等五个剧本的语言风格、用典和人物形象等。1984年以研究明代小说和戏剧中的郑和探险故事获得教授资格。1986年为海德堡大学汉学系教授。1990—1991年为法国巴黎高等科学院访问学者。1991年受聘为美因兹大学汉学教授,实用语言学院中文系主任。

帕埃克的研究重点是明代文学与历史，特别是澳门的历史和经济,十四至十六世纪亚洲的航海事业,尤其是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此外还研究古今白话散文。其主要著作有:

1. Die Dramen Cheng T'ing-yus. Heidelberg,1979.(《郑廷玉的戏剧》)
2. Cheng Hos Abenteuer im Drama und Roman der Ming-Zeit,Stuugart,1986.(《明代戏曲和小说中郑和下西洋的探险故事》)

Q

柯维麟(QUIRIN,Michael)

1954年生于法兰克福。先后在法兰克福大学、波恩大学学习汉学和历史学。七十年代曾在北京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

进修。1985年获波恩大学汉学系博士学位。1982年至1990年在波恩大学汉学系任教。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史。著有《刘知几及其〈史通〉》(Liu Zhiji und das Chun Qiu, Frankfut a.M.1987)。目前正在写作中的教授论文是研究崔述的《考信录》。

R

拉尔(RALL-NIU,Jutta)

女,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教授。本是医学博士毕业,后改读汉学。1961年获汉堡大学汉学专业博士学位。著有《金元医学四大家》(1970)。目前还兼任汉堡大学东方学院院长。

莱特(REITER,Florian Caspar)

1948年生。1978年威尔茨堡大学汉学专业博士毕业。1986年完成教授论文。目前在该校任教。主要研究中国宗教文化史。著有《道教的基本要素和发展趋势》(1988)等多部研究道教和道家的著作。

罗兹(ROETZ,Heiner)

1950年生。1983年法兰克福大学汉学系博士毕业。1990年在该校完成教授论文。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重点是思想史。著有《中国古代的人与自然——论中国古代哲学的主客观对立》(1984);《轴线时代中国的伦理——突破常规思想的角度下的重建》(Die Chinesische Ethik der Achsen-

zeit.Ein Rekonstruktion unter dem Aspekt des Durchbruchs zu postkonventionellen Denken, 1992, Frankfurt a.M. Suhrkamp, 480 S.)。目前为法兰克福大学讲师。

罗斯纳(ROSNER,Erhard)

哥廷根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

1940 年生。先后在慕尼黑大学和波鸿大学学习。取得医学博士后,改读汉学。并取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 1964 年出版的《元朝法律中的"十恶"》。七十年代在波鸿大学通过教授论文。1977 年任哥廷根大学东亚系高级讲师。1978 年任主任教授。主攻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元史和医学史。近著有《辨录的治疗术》(Die Heilkunst des Pien Lu.Arzt und Krankheit in bildhaften Ausdruecken der Chinesischen Sprache.1991,Stuttgart,216 S.)。

S

沙尔平(SCHARPING,Thomas)

科隆大学东亚系现代中国专业主任教授。

1948 年生。1971 年柏林自由大学汉学专业毕业。1980 年获博士学位。1973年开始任科隆东方及国际问题联邦研究所中国部研究员。1989 年任科隆大学东亚系现代中国专业主任教授。致力于当代中国研究工作。主要论著有:《民主联盟及其前身(1939—1949)——国共之间的中国知识分子》(Der Demikratische Band und seine Vorlaeufer,1939—1949,

Chinesische Intelligenz zwischen Kuomintang und Kommunistischer Partei,1972)；《中国青年的上山下乡》(Umsiedlungsprogramme fuer Chinas Jugend 1955—1980，1981)等。八十年代以来仅以科隆《东方和国际问题联邦研究所报告》(Berichte des BIOst)的形式就发表了关于中国改革和政治问题的论著十多种。

史密特(SCHMITT,Gerhard)

原东德科学院古代历史和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出生于中国广东，曾与蒂洛一起负责原东德科学院所藏吐鲁番汉文文书的编目工作。主要研究中国秦汉时期边疆史、少数民族史等。目前在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系做研究工作。

施米特—格凌策(SCHMIDT GLINTZER,Helwig)

慕尼黑大学东亚系汉学专业主任教授。

1948 年生。1973 年慕尼黑大学汉学专业博士毕业。1979 年在波恩大学通过教授论文。1981 年任慕尼黑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化专业主任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中国佛教和中古史。著述甚丰，主要有：

1. Das Hung-ming chi und die Aufnahme des Buddhismus in China. Wiesbaden, 1976.(《弘明集》和佛教的传入中国》)
2. Die Identitaet der buddhistischen Schulen und die Kompilation buddhistischer Universalgeschichten in China. Ein Geistes geschichte der

Song-Zeit, Wiesbaden, 1982.（《中国佛教学说的统一和佛教全史的编纂》）

3.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von den Anfaengen bis zur Gewart, Muenchen, Bern, 1990.（《中国古今文学通史》）

4. hg. Max Weber Gesamtausgabe. Abteilung Schrift, Band 19.（主编：《马克斯·韦伯全集》，"著作"卷，第19册）

施尔乐(SCHAELLER, Monika)

女，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专业博士。现任汉堡亚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当代政治和外交。

施毕尔曼(SPIELMANN, Barbara)

女，1954年生于卡塞尔（Kassel）。1985年维也纳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博士毕业。曾在台北、北京和南京学习进修。1986—1987年在北京的一家外资企业工作。1987年以来在慕尼黑马普学会工作，专门负责与中国科学院的科技合作工作。译作有巴金的《寒夜》、张辛欣与桑晔的《北京人》等。

森格尔(von SENGER, Harro)

德国富莱堡大学东方学系汉学教授。

1944年生，瑞士人。曾在芬兰和英国剑桥大学学习法律。1969年在瑞士苏黎世大学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其后改攻汉学，先后在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1971—1973)、东京大

学(1973—1975)和北京大学(1975—1977)学习和进修。1981年在德国富莱堡大学以古代汉学研究取得博士学位。1982年以后在瑞士比较法研究所从事中国和日本法律方面的研究工作。1989年任德国富莱堡大学汉学教授。所著《三十六计》(Strategeme, Lebens und Uberlebenslisten der Chinesen,die beruhmten 36 Strategeme aus drei Jahrtausenden, Scherz Verlag,1988 Bern,Munchen,Wien)已有中文版。另有《传统中国的购买契约》(1970);《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党、意识形态和法律》(1982)以及中文版《一个瑞士人在台湾》(1989)等。

斯本格勒(SPENGLER,Tilman)

1947年生。先后在海德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学习汉学、社会学。1972年取得博士学位。1972—1973年在英国伦敦大学中国研究所做访问学者。1975年以来在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工作。发表有研究中国人口政策、近代经济和社会史方面的论著。并于1977年翻译出版过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施泰格(STEIGER,Brunhild)

汉堡亚洲研究所研究员。

1968年汉堡大学博士毕业。博士论文是《共产中国的孔子形象——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著作对孔子的新评价》。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用中文在华发表有《民族主义者对太平天国的看法》(1987)、《太平天国对早期国民党的影响》(1989)。

经常在《中国时事》(China aktuell)上撰写关于中国现实的评论文章。1993 年开始在蒂宾根大学代理教授职务。

施图姆费尔特(STUMPFELDT,Hans)

中文名司徒汉。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主任教授。

1940 年生于东德。中学毕业后来到西德。先在富莱堡大学学习汉学、历史学等，1969 年以研究先秦国家形态取得博士学位。七十年代在明斯特大学汉学专业任教，并完成教授论文。1979 年应聘为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主任教授。曾多次访问过中国。其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先秦史和汉唐史，兼及中国古代思想史和文学史。《远东学报》(Oriens Extremus)等杂志主编。近年发表的论著有：

1. Statsverfassung und Territorium im antiken China,1970,Duesseldorf,428 S.(《古代中国的国家形态和疆域》)
2. Das Leben des Konfuzius,Bilder zu den Taten des Weisen.Zuerich, 1991. (《孔子的生平——〈圣迹图说〉》)
3. Konfuzius und der Konfuzianismus, wai sie waren, was sie wurden, und was sie heute sollenund koennen, in: Konfuzianismus und die Modernisierung Chinas, 1990,S. 29—40.(《孔子和儒学——其原本怎样?后来怎样?今天应该和可能怎样?》)
4. Was der Meister so sprache. In:Festgabe fuer

Prof. Dr. Ulrich Unger, zum 60. Geburtstag, 1990.(《夫子如是说》)

T

塔菲尔一科仁(TAFEL-KEHREN,D.)

女，波恩大学汉学系博士毕业。因其丈夫曾任驻华使馆经济参赞，故在中国多年。又曾在日本京都大学和荷兰的莱顿大学进修。出版有《王梵志诗研究》(Wang Fanzhi, Einige Gedichte aus den Fonds Pelliot Chinois 3833, Bonn, 1982)。

陶波(TAUBE,Manfred)

五十年代莱比锡大学南亚和东亚系毕业，在该校完成博士论文和教授论文，并任讲师。主要研究藏学。最近为莱比锡大学藏学教授。

蒂洛(THILUO,Thomas)

原东德科学院古代历史和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1935 年生于柏林。1964 年柏林大学博士毕业。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多年。1981 年完成第二博士论文(相当于西德教授论文)。1963—1969 年任东德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研究人员。1969 年后任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唐代历史和文学。除第二博士论文《唐代传奇小说中的奴仆形象》(1983)外，还曾主持东德科学院所藏吐鲁番汉文文献的编目工作。目前集中研究唐代的长安城的历史。德国联邦政府特聘在柏林自由

大学和洪堡大学做研究和教学工作。主要论著有：

1. Klasische Chinesische Baukunst. Strukturprinzipien und soziale Funktion, Leipzig, 1977. 252S.（《古典中国建筑艺术——结构原则和社会功能》）
2. Der Fremde mit dem Lockenbart. Erzaehlungen aus dem China der Tang-Zeit, Berlin, 1989.（《虬髯客——唐代传奇选译》）
3. Aspekte des arbeitenden Volkes in den fruehen Werken des Dichters Bo Juyi, in: Aof 14, 1987, S.190—220.（《诗人白居易早期著作中的劳动民众观》）
4. Aspekte des arbeitenden Volkes in den spaeteren Werken des Dichters Bo Juyi, in: Aof 16, 1989, S.153—181.（《诗人白居易晚期著作中的劳动民众观》）
5. Volksmassen, Unruhen und die oeffentliche Ordnung in der Tang-Hauptstadt Chang'an, in: Aof 17, 1990, S.152—179.（《唐代首都长安的人群、骚乱和公众秩序》）

陶泽德(TRAUZTTEL, Rolf)

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

1930 年生于莱比锡。先后在莱比锡大学和慕尼黑大学学习汉学、日本学和哲学。1964 年博士毕业。1968 年完成

教授论文，并在慕尼黑大学汉学系任教。1972 年为哥廷根大学汉学教授。1975 年任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并曾一度兼该校东方语言系主任。主要学术领域为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宋代历史。发表的重要著作有：

1. Ts'ai Ching(1046—1126)als Typus des illegitimen Ministers. Bamberg 1964.（《蔡京——奸臣的典型》）
2. Das Chinesische Kaiserreich. Frankfurt 1968 (Fischer Weltgeschichte, Bd.19)（《中国皇朝史》，与 Herbert Franke 合著）
3. Individuum and Heteronomie. Historische Aspekte des Verhaltnisse von Individuum und Gesellschaft in China. in Saeculum 28(1977) S. 340—364.（《个体性和非自主性——中国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的历史考察》）
4. Die Mogolen. Beitrage zu ihrer Geschichte und Kultur. Darmstadt 1986, S. 217—282.（合著：《蒙古的历史和文化》）
5. Konfuzianismus und die Modernisierung Chinas. Mainz 1990.（主编：《儒学与中国的现代化》）

U

于佩和(UBELHOR, Monika)

女，德国马尔堡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

1940 年生。1968 年汉堡大学博士毕业。主专业汉学，

副专业日本学、哲学等。毕业后 1970 — 1978 年在汉堡大学任教，1982 年在蒂宾根大学通过教授论文。1988 年出任马尔堡大学汉学系主任。主要研究宋明思想文化史。发表的重要论著有：

1. Hsu Kuang-ch'i(1562—1623) und seine Einstellung zum Christentum, 1968.（《徐光启和他对基督教的看法》）
2. Wang Gen und seine Lehre, Eine kritische Position im spaeten Konfuzianismus, 1989.（《王艮及其学说》）

翁格(UNGER, Ulrich)

明斯特大学东亚系汉学专业主任教授。

1930 年生。原为东德莱比锡大学汉学系教师。五十年代末来到西德。先在富莱堡大学汉学系任教。七十年代转任明斯特大学汉学专业主任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古文字、古代汉语。著有《中国古代汉语教程》三大册。开设古代文献选读和德文译古汉语课程。目前致力于研究古汉语语法。

温树德(Paul U. Unschuld)

慕尼黑大学医学史研究所 (Institut fuer Geschichte der Medizin)所长，教授，汉学和医学博士。主要研究中国医学史，翻译过《黄帝内经》等中医古籍。著有《传统中国医学诊断的实践》(Die Praxis des traditionellen Chinesischen Heilsystems, 1973)、《医学和伦理学——古代中国

的社会冲突》(Medizin und Ethik. Sozialkonflikte im China der Kaiserzeit,1975)等。

V

韦廷霍夫(VITTINGHOFF,H.)

汉学博士，七十年代在威尔茨堡大学汉学系跟从石泰宁格(H.Steininger)研究道教，本人的博士论文研究宋代元祐更化和王安石变法问题。现为厄尔朗根—纽仑堡大学汉学专业讲师。

福格尔(VOGEL,Hans-Ulrich)

汉学博士，瑞士人，目前为海德堡大学汉学系讲师。主要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和经济史。著有《公元前 311 年至 1911 年四川盐史研究——专营和生产结构》(Untersuchungen Ueber die Salzgeschichte von Sichuan, 311 v.Chr.—1911,Sturukturen des Monopols und der Produktion, 1989)。

W

瓦格纳(WAGNER,Rudorf G.)

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

1941 年生于威斯巴登。1969 年慕尼黑大学汉学系博士毕业，后在美国访学并工作多年。1981 年在柏林自由大学完成教授论文。1984、1986 和 1987 年任哈佛大学访问教授。1987 年受聘为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他的研究领域

主要是魏晋玄学，特别是王弼的老子注，以及中国近现代历史和文学，著有《太平天国起义中宗教的作用》(1984)、《当代中国的历史剧》。后者讨论田汉的《关汉卿》、《谢瑶环》和其它新编历史剧及其政治命运，1990 年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1992 年获德国科学协会颁发的莱布尼兹奖。

瓦拉文司(WALRAVENS,Hartmut)

七十年代在科隆大学东亚系博士毕业后留校任职，曾任汉堡联邦军事高等学院图书馆高级馆员。目前在柏林工作。多年来致力于汉学书目和索引的编纂工作。著有《东方学报刊中的中亚和东亚学术论文索引》两册(1980，1981)及《汉堡东亚学书目》等。

韦伯—舍费尔(WEBER-SCHAEFER,Peter)

波鸿大学东亚学院东亚政治学专业主任教授。

1935 年生，在慕尼黑大学学习汉学，兼攻日本学、民族学、哲学和英国语言文学。1958 年博士毕业后在政治学研究所工作。1964—1965 年曾赴美国哈佛大学进修。1966 年通过教授论文，1968 年任波鸿大学东亚学院政治学教授，主攻东亚政治和政治思想史。

韦格尔(WEGGEL,Oskar)

汉堡亚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1935 年生于德国帕绍(Passau)。1954—1958年在慕尼黑大学学习法律。1962年通过国家律师资格考试。1963—1965年

在波恩大学东方语言系学习中文两年。1965—1967年在台湾进修。1968年后为汉堡亚洲研究所研究人员。主要从事中国政治和外交的研究工作。著述甚丰，主要有：《1975年的中国宪法》(Die Verfassung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1975, Wien,1976)；《中国法律史》(Chinesische Rechtsgeschichte, Leiden, Koeln,1980)；《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Geschichte Chinas im 20. Jahrhundert, Stuttgart, 1989)；《十七世纪以来的台湾史》(Die Geschichte Taiwans. Vom 17. Jahrhundert bis heute, Koeln, Weimar, Wein, 1991)。

魏格林(WEIGLIN-SCHWIEDRIZIK, Susanne)

女，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现代汉学专业主任教授。

1954年生。1978年波鸿大学东亚学院中国历史专业硕士毕业。1983年博士毕业，1988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编纂方法》为题完成教授论文。曾多次在北京清华大学等地访问进修。1989年任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现代汉学专业主任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现代史。发表的论著有：《鲁迅和知识分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史编写问题》(Probleme der Parteigeschichtsschreibung in der VR China)等。

布海歌(WERLE-BURGER, Helga)

1940年生于德国萨尔兰州。在汉堡大学学习汉学、艺术史和东亚政治。以研究中国地方戏取得博士学位。在香港、中国大陆及东亚地区学习和工作达十八年之久。专攻东亚传

统戏剧及其人物、道具和木偶。曾主持香港艺术中心项目的工作。1987 年任吕贝克(Luebeck)木偶戏博物馆馆长。主要著作有：《中国戏剧》(Chinesische Oper,1982)；《潮剧——中国粤东地区的一种地方戏》(Chao Oper——eine Chinesische Lokaloper in Ost-Guangdong,1985)。

魏波多(WIETHOFF,Bodo)

波鸿大学东亚学院中国历史专业主任教授。

1935 年生。1962 年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博士毕业。博士论文为《1368—1567 年中国的海禁政策和私人海外贸易》(Die Chinesische Seeverbotspolitik und der private Ueberseehandel von 1368 bis 1567)。毕业后先后在明斯特大学和波鸿大学任教。1972 年为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系汉学主任及教授。1975 年改任波鸿大学中国历史主任教授。除博士论文外，还著有《中国古代史概要》、《中国近现代史概要》以及《1928—1949 年中国的空中交通》(Luftverkehr in China 1928—1949. Materialien zu einen untauglichen Modernisierungsversuch, 1975)。主要研究兴趣是中国近现代史和明清史。近几年来研究课题有中国现代航空史、清代地区经济史等。

韦荷雅(WIPPERMANN,Dorothea)

女，先后在波恩大学和科隆大学、特利尔大学及南京大学学习，主修汉学，兼修普通语言学和德国语言文学。1985 年出版过《国语注音字母》(Das Phonetische Alphabet, Bo-

chum)，论述民国期间国语运动的起源和发展。1989年在特利尔大学博士毕业，博士论文《汉语连动式》(Liandongshi. Der Bgriff der Verbalserie in der Chinesischen Linguistik)，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对所谓的"汉语连动式"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被收入《汉语语言学丛书》(Sino-Lingustica)之三，于1993年出版，1984年以来即在特利尔大学汉学系担任教学和研究工作，目前正在撰写教授论文。

2. 德语国家的大学汉学系简介

1. 柏林自由大学(Freier Universitaet Berlin)

汉学专业在东亚系(Sinologie, Ostasiatisches)。有教师十余人，其中教授三人。主任教授冯门德(Erling Von Mende)研究重点为清代及唐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教授郭恒钰(Kuo Heng-yu)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和文学，中德关系史。教授罗梅君(Mechtthild Eutner)研究近代史、中国社会生活史。该专业可授予博士与硕士学位。每年图书经费三万马克以上，现有中文藏书约四万册，期刊一百多种。注册学生 1985 年 445 人，其中主专业 303人，副专业 142 人。目前约 300 多人。

该校政治学院另有东亚及中国政治教研室 (Arbeitsstelle Politik Chinas und Ostasiens) 研究中国当代政治、外交和现代史。封宁(Pfening)博士和卡姆朋 (Thomas Kampen)博士在此执教。

2. 波鸿大学(Ruhr-Universitaet Bochum)

东亚学院(Fakultaet fur Ostasienwissenchaft)下设(一) 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教授马汉茂(Helmut Martin)研究清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与政治。(二)中国历史专业，教授魏波多 (Bodo Wiethoff) 研究明清史和中国近代史，高级讲师赫尔策(Rudolf Hetzer) 研究明代史和历史编纂学。

另有东亚政治专业和东亚经济专业。韦伯—舌费尔（Peter Weber-Schawfer）教授研究中国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克仑纳(Klenner)教授研究中国经济和经济史。各专业均可授予硕士和博士学位。目前攻读中国学专业的学生约300多名。出版《波鸿东亚研究年刊》(Bochumer Jahrbuch zur Ostasienforschung)、《波鸿东亚学院丛书》(Vesoeffentlichungen des Ostasien-Instituts der Ruhr-Universitaet Bochum)和《中国论文集》(Chinathemen)丛书(马汉茂主编)。

系藏书在八万册左右，期刊一百多种。年图书经费五万马克。

3.波恩大学(Universitaet Bonn)

有汉学系(Sinologisches Seminar)和东方语言系汉语专业(Seminar fuer Orintal Sprachen,Chinesisch)从事中国学的教学和研究。汉学系授予硕士和博士学位。东语系是原柏林大学东语所的继续，以培养翻译人才为目的，授予翻译学学士学位。

汉学系主任教授陶泽德(Rolf Trauzettel)，主攻中国古代史，重点是宋史。有讲师及助手各一人。有图书约四万种，以中国传统文史哲为主。

东方语言系汉语专业主任教授顾彬(Wolfgang Kubin)原来研究唐代诗歌和古典文学，目前重点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中国思想史。有汉语教师三人，出版《袖珍汉学》和《东方语言系学报》。共有学生二三百人。图书数千册。

另有中亚语言文化系(Seminar fuer Sprach und Kur-

tulwissenschaft Zentralasiens)主要研究蒙古学，兼及藏学、满洲学和突厥学。是德国唯一的蒙古学专业。主任教授威尔斯(Michael Weiers)主攻蒙古、突厥和满洲通古斯语言和中亚历史；教授坎普非(Hans-Rainer Kaempfe)主攻蒙、藏、满文；教授第特·舒(Dieter Schuh)专攻藏族史和藏文文学史。出版《亚洲研究》(Asiatische Studien)杂志和丛书。

4.杜塞尔多夫大学(Universitaet Duesseldorf)

东亚研究所(Ostasien-Institut)中国学专业授予学士学位。

教授娄文(Erhard Louven)主要研究中国当代政治和经济。另有助教二人。原来只有中文教学，1990年开始设汉学专业，以现代中国为重点，学生约数十人。

图书馆在建设中。

5.厄尔朗根—纽仑堡大学(Universitaet Erlangen-Nuernberg)

汉学专业(Lehrstuhl fuer Sinologie)始建于1967年，目前隶属欧洲以外语言与文化研究所(Institutfuer Aussereuropaeische Sprachen und Kulturen)。

该专业原来以古代中国为教学和研究重点。1976年根据巴伐利亚州高等院校规划，改以现代中国社会和经济问题为重点。现任主任教授李佩尔特(Wolfgang Lippert)主攻汉语语言学和中国现代史。教授荷乐瑟(Klaus Flessel)研究中国古代史，重点是宋史。另有讲师和语言教员各一人。本专业可授予硕士、博士学位。学生两百人左右。

图书馆藏书近三万种。

6.法兰克福大学(Universitaet Frankfurt)

汉学专业隶属于东方及东亚语言研究所 (Institut fuer Orientalische und Ostasiatische Philologien, Sinologie)。

主任教授张聪东(Chang Tsung-tung)主攻先秦历史和思想史。讲师罗兹(Heiner Roetz)研究先秦思想和哲学史。另有教师编制一人。注册学生最多时两百多人,现约一百人。可授予博士、硕士学位。

专业图书馆藏书三万多册,以古代文史哲为主。

7.富莱堡大学(Universitaet Freiburg)

汉学专业隶属东方学系 (Orientalisches Seminar)。

有教授二人,语言教师一人。郭培德(Peter Grainer)教授兼专业主任,专攻明史。森格尔 (Harro von Senger)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现代史。学生一百人左右。可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另该校历史系 (Historisches Sfminar) 霍福曼(Hoffmann) 教授多年坚持开设中国古代史和中国通史课程。

有图书约一万册。

8.哥廷根大学(Universitaet Goettingen)

汉学专业最早设立于 1925 年,从 1982 年开始与日本学专业共同构成东亚系(Ostasiatisches Seminar)。

主任教授罗斯纳(Erhard Rosner)研究元史、蒙古史。另有讲师和语言教师各一人。最近新增教授职位一名,由研究中国思想史和中西文化关系史的郎宓谢 (Michael Lack-

ner)担任。注册学生近二百人。可授予硕士和博士学位。八十年代中叶以来平均每年两名硕士和一名博士毕业。

系图书馆有图书近两万册，期刊 50 种。

9.汉堡大学(Universitaet Hamburg)

中国语言文化系(Sprache und Kultur Chinas)的历史可追溯到 1909 年，是德国最早的汉学系。目前隶属东方学院，分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两个研究方向。有教学人员八人，其中教授四人。主任教授司徒汉 (Hans Stumpfeldt)研究先秦史和汉唐史、儒学思想史。主任教授毕少夫 (Friedrich A. Bischoff) 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诗歌，兼及蒙古学，1993 年退休，继任者尚未定。教授拉尔 (Jutta Rall-Niu)研究中国医学史。教授艾伯斯坦 (Bernd Eberstein)研究中国近代戏剧和历史。讲师爱默尔西 (Reinhard Emmerich)研究汉唐及中国古代思想史。关愚谦主讲中国现代文学。有学生三百多人。可授予硕士及博士学位。出版《远东学刊》(Oriental Extremus)等。

系图书馆藏书七万种以上，以保留许多线装书为特色。期刊一百多种，以各大学学报的收藏为特色。

10.海德堡大学(Universitaet Heidelberg)

汉学系创建于 1962 年，目前分古代汉学和现代汉学两个专业。古代汉学专业主任教授瓦格纳(Rudolf Wagner)研究魏晋思想史、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现代汉学专业主任教授魏格林(Susanne Weiglin-Schwiedrizik)研究中国现代史。讲师福格尔(Hans-Ulrich Vogel) 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另有客座教授职位一人。语文教师四人。学生三百多人。可

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

系图书馆藏书约四万种。

又有艺术史研究所(Instutut fuer Kunstgeschichte)的东亚研究室,是德国唯一的东亚艺术史专业。主任教授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研究中国书法和艺术史。与汉学系共同主编《海德堡东亚研究丛书》。

11.洪堡大学汉学系(Universitaet Humboldt)

统一前的洪堡大学有教师18人,学生36人,分中国语言和历史;中国历史和政治、经济两个教研室。可授予博士、硕士学位。统一后改为汉学系。系主任卡登(Klaus Kaden)教授研究汉语语法。梅爱华(Eva Mueller)教授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费路(Roland Felber)教授研究中国历史。讲师考茨(Ulrich Kautz)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翻译和翻译的理论研究。讲师劳武一(Ulrich Lau)主要研究周代历史和金文。目前该系教师基本上解散,三位教授,从1992年开始均重新登报招聘。另该校中亚研究所开设蒙古和藏语课程。

有图书约一万五千册以上。

12.基尔大学(Universitaet Kiel)

汉学专业创建于1990年,隶属东方学系(Orientalisches Seminar)。教授兼主任林可(Gudula Linck)主要研究中国社会史,特别是家庭、婚姻和伦理道德与人际关系等问题。有助手及语文教师各一人。学生几十名。可授予硕士和博士学位。

图书馆尚在建设中。

13.科隆大学(Universitaet zu Koeln)

汉学专业 1960 年正式建立。目前东亚系中国学科分三个专业,教研人员十人,其中教授四人。古代汉学专业、满族学专业和现代中国专业,其中满族学仅为副专业。穆穆(Martin Gimm)教授主攻唐宋史,满族学和清史;任古代汉学和满族学专业主任。现代中国学专业有教授三人。毕格(Lutz Bieg)教授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和哲学思想史。沙尔平(Thomas Scharping)教授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豪塞尔(Robert Heuser)研究中国法律。学生约二三百名。

系图书馆藏书约六万种,期刊一百多种。

14.莱比锡大学(Universitaet Leipzig)

南亚和东亚系(Lehr und Forschungsbereich Sued und Ostasien)有一个汉学专业。有教师编制四个。莫里茨(Ralf Moritz)教授任主任。其研究重点是先秦哲学和思想史。这里的研究工作也以先秦史为研究重点。

另该校中亚系讲授古藏文和古蒙文。陶波(Manfred Taube)授教在此执教。

图书约一万册。

15.美因兹大学(Universitaet Mainz)

实用语言学院(Fachbereich Angewandte Sprachwissenschaft)从 1980—1981 冬学期开始设立汉语专业,作为其他语文系的副专业。1990 年改称中国语言文化研究所(Institut fuer Chinesische Sprache und Kultur),培养口译和笔译人才。授予翻译学士学位。除基本语言培训外,也

讲授中国文化和经济、法律、技术和中医药方面的课程。有教师四人。教授兼系主任帕塔克(Roderich Ptak)研究明代文学和历史。讲师库普夫(Peter Kupfer)研究汉语教学法和汉语语言学。

有中文图书数千册。

16.马尔堡大学(Universitaet Marburg)

汉学系在欧洲以外语言和文化学院(Fachbereich II. Aussereuropaeische Sprachen und Kulturen)。有编制三人。主任教授于佩和(Monika Uebelhor)研究宋明思想文化史。学生数十人。可授予硕士和博士学位。

有图书约一万册。

17.慕尼黑大学(Universitaet Muenchen)

汉学专业在东亚系。建立于1946年。目前有教员十人，其中教授四人。主任教授鲍吾刚(Wolfgang Bauer)研究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其助手傅敏怡(Michael Friedrich)研究方向相同。主任教授施米特—格凌策(Schmidt Glintzer)研究中国文学历史和佛教。其助手宓塔克(Achim Mittag)研究宋代学术史。教授鄢尔克尔特(Manfred Porkert)研究中国医学史和文学翻译。另一教授职位自中国艺术和考古专家芬丝黛布氏(Kaete Finsterbusch)退休后，至今空缺未补。讲师库哥尔沙兹(H.Kogelschatz)研究中国科技史。有学生580多人。其中430人主专业，150人副专业。可授予硕士博士学位。出版《慕尼黑东亚研究丛书》(Muenchener Ostasiatische Studien)。

系图书馆有图书五万多种，期刊240多种(其中中文期刊

约占一半)。

慕尼黑大学还有三个系所也从事中国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戈氏政治学研究所(Geschwister Scholl Institut fuer Politisehe Wissenschaft)。1958年创建时,重点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1967年后也注重中国现实的外交政策和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之间的关系结构,兼及它们与东亚以至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七十年代以来更进一步将亚洲分裂国家(中国大陆和台湾;南北朝鲜;柬埔寨和统一前的越南)作比较研究。目前的主任教授为金德曼(Gottfried-Karl Kindermann)。有一个藏书约十万册、期刊250余种的图书馆,聚集了丰富的西方研究中国的图书和杂志。

人类学和非洲学研究所(Instutut fuer Voelkerkunde und Afrikanistik)。在人类学的教学和研究中,有关于中国边疆民族的内容。部分课程要求有中文知识。

医学史研究所(Institut fuer Geschichte der Medizin)。所长温树德(Paul U.Unschuld)是一位医史专家和汉学家。因此该所的研究重点是东亚医学,重点是中医。这里长年开设中医古籍选读和现代中医文献阅读课程。目前该所重点进行中医古籍的翻译和教科书编纂工作。图书馆有丰富的中国和日本医学藏书。

18.明斯特大学(Universitaet Muenster)

东亚系汉学专业最早建于1962年。目前有教学人员三人。主任教授翁格(Ulrich Unger)研究先秦语言与历史,以及古代汉语语法。有学生三十余人。出版《明斯特东亚研

究丛书》。

系图书馆有图书一万余册。

19.萨尔兰大学(Universitaet Saarland)

东亚及中国政治教研室(Arbeitsstelle Politik Chinas und Ostasiens)创建于1975年，目前发展成以汉语教学为基础、以现代中国为重点的汉学专业，主任教授多默寺(Jurgen Domes)研究中国政治和中国现代史。有学生数十人，可授予硕士学位。

有图书约一万多册。

20.特利尔大学(Universitaet Trier)

汉学系从1981—1982年冬学期开始招生。隶属于语言文学院(Fachbereich II, Sprach und Literaturwissenschaften)。首任教授乔伟退休后，目前主任教授卜松山(Karl-Heinz Pohl)主攻中国古典诗歌、文学批评史和中国近现代文学和思想史。讲师郎鹤立(Heribert Lang)和韦荷雅(Dorothea Wippermann)研究汉语语法。另有客座教授职位一人。全部教学人员六人。学生170多人。可以授予硕士和博士学位。

又该校政治学系有东亚政治主任教授职位一人。目前由王海(Thomas Heberer)任教授，研究中国现代政治、经济和民俗学。

系里没有独立的图书馆，校图书馆汉学藏书约三万种(《四库全书》为一种)。汉学期刊一百多种。

21.蒂宾根大学(Universitaet Tuebingen)

文化学学院(Fakultaet fuer Kulturwissenschaften)

下设汉学与朝鲜学系（Seminar fuer Sinologie und Koreanistik）。汉学专业是独立的主专业。如果以汉学为副专业，可以在古代汉学或现代中国选择一个。另外汉学专业还可以与经济学专业共同组成一个新专业方向——"国民经济学—中国"的所谓区域研究学科（Regionalstudiengaenge）。自主任教授葛林（Tilemann Grimm）退休，教授卜松山（Karl-Heinz Pohl）就任特利尔大学汉学系主任后，这里的两个教授职位还是空缺。有讲师库富思，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另有教员五人。1986 年注册学生 250 人，主专业 197人，副专业53人。此外还有约 20 人学习"国民经济学—中国"专业。目前有学生 200 多人。可授予硕士和博士学位。

系图书馆藏书约三万种。

22.威尔茨堡大学（Universitaet Wuerzburg）

汉学研究所（Institut fuer Sinologie）建立于 1965 年。目前的主任教授是迪特·库恩（Dieter Kuhn），研究宋史和中国古代纺织技术史、物质文化史。讲师莱特（Florian C.Reiter）研究中国道教史。还有其它教员 2 人。学生约 100 人。可授予硕士和博士学位。

有图书约三万册，期刊六十余种。

23.维也纳大学（Universitaet Wien）

汉学研究所（Institut fuer Sinologie）创建于 1973 年。目前编制 5 人。主任教授拉德斯德特（Otto Ladstaetter）研究现代汉语和中国古典文学。讲师皮尔茨（Erich Pilz）研究中国历史学。学生数估计在 100 人左右。可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

有图书一万多册，期刊一百二十种。

另该校有藏学和佛学系。编制3人。主任教授史泰恩克尔讷（Steinkellner）研究中国西藏的语言和文学及中国佛教。所开课程还有佛教艺术等。

24.苏黎世大学（Universitaet Zuerich）

东亚系（Ostasiatisches Seminar）由汉学、日本学和朝鲜学专业组成。汉学专业创建于1947年。现任教授兼系主任伽思曼（Robert Gassmann）研究先秦两汉思想史。另有高级讲师一人，其他教员二人。有学生一百多人。可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主编《瑞士亚洲研究丛书》。

系图书馆分中文和西文两部分。中文部有图书近五万册，现行期刊一百六十多种；西文部有图书一万五千册左右，期刊一百种。

3.德国汉学研究丛书简介

一、慕尼黑大学东亚研究丛书

Muenchener Ostasiatische Studien

说明：1.本丛书最初由慕尼黑大学东亚系福赫伯（Herbert Franke）和鲍吾刚（Wolfgang Bauer）教授任主编。目前的主编是鲍吾刚和施米特一格凌策（Helwig Schmidt-Gelintzer）教授。斯图加特弗朗茨·石泰出版社（Franz Steiner Verlag Stuttgart）出版。

2.书名前数字为丛书编号。日本学著作未收。

1. Corinna Hana: Bericht Ueber die Verteidigung der Stadt Te-An waehrend der Priode K'ai-Hsi 1205—1208 (K'ai-Hsi Te-An Shou-Ch'eng Lu) von Wang Chih-Yuan. Ein Beitrag zur privaten Historiographie des 13. Jahrhunderts in China. 1970. VIII, 261 S.哈娜：《关于"开禧守城录"》(1970)
2. Josef Marian Galik: Mao Tun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1969. XV. 185 S.噶立克：《茅盾和现代中国文学批评》(1969)

3. Rolf Trauzettel: Zwei Reiseberichte Chinesischer Gesandter zu den Russen dem Jahre 1688. In Vorbereitung. 陶德培：《1688年出使俄国的中国使节的两份旅行报告》（未出）

4. Hok/Lam Chan: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Chin Dynasty. Three Studies. 1970. XII, 189 S. 詹和乐（音译）：《金代的历史地理》（1970）

5. Manfred Porkert: Die Theoretischen Grundlagen der Chinesischen Medizin. 鄢科特：《中医的理论基础》

6. Dagmar Thiele: Der Abschluss eines Vertrages: Diplomatie zwischen Sung und Chin/Dynastie 1117—1123. 1971. IV, 289 S. 提勒：《1117—1123年宋金外交关系——和约的缔结》（1971）

7. Jutta Rall: Die vier grossen Medizinschulen der Mongolenzeit. Stand und Entwicklung der Chinesischen Medizin in der Chin und Yuean/Zeit. 1970. VIII, 114 S. 拉尔：《金元医学四大家》（1970）

8. Paul Ulrich Unschuld: Die Praxis des traditionellen Chinesischen Heilsystem. Unter Einschluss der Pharmazie dargestellt an der heutigen Situation auf Taiwan. 温树德：《传统中医诊断学的实践》（1973）

9. Cornelia Toepelmann: Shan-ko von Feng Menglung: Eine Volksliedersammlung aus Ming-Zeit. 1973. VIII, 491 S. 图佩曼：《冯梦龙的山歌——明代民歌集》

10. Helmut Brinker: Die zen-buddhistische Bildnis-

malerei in China und Japan. Von den Anfaengen bis zum Ende des 16. Jahrhunderts. Eine Untersuchung zur Ikonographie, Typen und Entwicklungsgeschichte. 1973. X, 279 S. 布仁克：《中国和日本的佛教禅意画》(1973)

11. Paul Ulrich Unschuld: Medizin und Ethik. Sozialkonflikte in China der Kaiserzeit. 1975. VIII, 98 S. 温树德：《医学和伦理学》(1975)

12. Helwig Schmidt/Glintzer: Das Hung-ming chi und die Aufnahme des Buddhismus in China. 1976. VIII, 212 S. 施密特—格凌策：《弘明集和佛教的传入中国》(1976)

13. Friedrich A. Bischoff: Interpreting the Fu. A study in Chinese Literary rhetoric. 1976. XVIII, 446 S. 毕少夫：《赋的训释——中国文学修辞学的研究》(1976)

14. Corinna Hana: Sun Yat-sen's Parteiorgan Chiensche (1919—1920). Eine Quelle zur Bewegung vom vierten Mai in China. 1978. VIII, 430 S. 哈娜：《孙中山的党的机关报〈建设〉(1919—1920)——中国五四运动的起源》

15. Ulrike Jugel: Politische Funktion und soziale Stellung der Eunuchen zur spaeteren Han-Zeit (25—220 n. Chr.). 1976. XVI, 467 S. 雍格尔：《后汉时期匈奴的政治作用和社会地位》(1976)

16. Herbert Franke, ed.: Sung Biograpgies. Part 1—3. 1976. XXX, 1272 S. 福赫伯主编:《宋人传记》第一至第三册(1976)

17. Herbert Franke, ed.: Sung Biographies Part 4. 1976. VIII, 158 S. 福赫伯主编:《宋人传记》第四册(1976)

18. Axel Schuessler: Affixes in Proto-Chinese. 1976. 292 S. 舒思勒:《中国原始时代的封印》(1976)

19. Wolfgang Lippert: Entstehung und Funktion einiger Chinesischer maexistischer Termini. Der lexikalisch-begriffliche Aspekt der Rezeption des Marxismus in Japan und China. 1980. XI, 438 S. 李佩尔特:《若干中国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产生和作用》(1980)

20. Stephen H. West: Vaudeville and Narrative, Aspects of Chin Theater. 1977. XIV, 190 S. 威斯特:《金代戏剧》(1977)

21. Almut Netolitzky: Das Ling-wei tai-ta von Chou Ch'u-fei. Eine Landeskunde Suedchinas aus dem 12. Jahrhundert. 1977. XXXIV, 320 S. 尼托里斯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1977)

22. Gudula Linck-Keting: Ein Kapitel Chinesischer Grenzgeschichte. Han und Nicht/Han im Taiwan der Qing-Zeit 1683—1895. 1979. VIII, 360S. 林可:《中国边疆史的一页——1683至1895年台湾的汉人和非汉人》(1979)

23. Ssuch'uan vom 7.bis 10.Jahrhundert. Untersuchung zur fruehen Geschichte ciner Chinesischer Provinz.1980.XXIV,254 S.逖泽:《七至九世纪的四川》(1980)

24. Wolfgang Bauer,ed.: German Impact on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A Bibliography on Chinese Publications. (Deutschlands Einfluss auf die moderne Chinesische Geistesgeschichte. Eine Bibliographie Chinesischsprachiger Werke.)1982. XLII,510 S.鲍威尔等主编:《德国对现代中国思想史的影响——中文资料索引》(1982)

25. -,Hrsg.:Studia Sino-Mongolica. Festschrift fuer Herbert Franke.1979.470 S. 鲍威尔主编:《汉学与蒙古学——福赫伯纪念文集》(1979)

26. Helwig Schmidt/Glintzer: Die Identitaet der buddhistischen Schulen und die Komplilation buddhistischer Universalgeschichte in China. Ein Beitrag zur Geistesgeschichte der Sung/Zeit.1982. VIII, 190 S.施密特—格凌策:《中国佛教的统一和大藏经的编纂——宋代思想史的一个研究》(1982)

27. Wilt Idema/Stephen H. West: Chinese Theater 1100/1450.A Source Book.1982.XV,523 S.易德玛、威斯特:《1100 至 1450 年的中国戏剧》(1982)

29. Thomas O.Hoellmann: Die Tsou.Werden und Wandel einer ethnischen Minderheit in Zentraltai-

wan.1982.VI,391 S.何尔曼：《鄒——台湾中部少数民族的变化和变革》(1982)

30.Ronald C.Miao:Early Medieval Chinese Poetry: The Life and Verse of Wang Ts'an(A. D. 177—217).1982.XXI, 328 S.苗·罗纳德：《中国中古早期的诗歌——诗人王灿的生平和诗作》(1982)

32.Paul Ratchnevsky:Cinggis/Khan. Sein Leben und Wirken (vergriffen, eine englische Uebersetzung erscheint 1990 im Verlag Basil Blackwell, Oxford.)拉契讷夫斯基：《成吉思汗的生平和事业》(1990)

33.John Timothy Wixted:Poems on Poetry. Literary Criticism by Yuan Hao-wen(1190/1257). Calligraphy by Eugenia Y.Tu.1982. XVI, 482 S. 韦可司提特：《元好问的文学批评》(1982)

34.N.H.van Straten: Concepts of Health, Disease and Vitalit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A 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Based on the research materials of Georg Koeppen.1983.VIII,193 S. 范司特拉滕：《传统中国社会关于健康、生病和精气的观念》(1983)

35.Hermann Kogelschatz: Wang Kuo-wei und Schopenhauer.Eine philosophische Begegnung.Wandlung des Selbstverstaednisses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unter dem Einfluss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Aesthetik.1986.XV, 513 S.科格尔沙茨：《王国

维和叔本华——哲学的碰撞》(1986)

36. Marlies Epping-von Franz: Fang Xiao-Ru (1357—1402). Ein Konfuyianer im Konflikt. 1983. VIII, 322 S. 冯傅朗兹:《方孝孺》(1983)

38. Hubert Seiwert: Volksreligion und nationale Tradition in Taiwan. Studien zur regionalen Religionsgeschichte einer Chinesischen Provinz. 1985. 284 S. 赛卫尔特:《台湾的民间宗教和民族传统》(1985)

39. Wolfgang Kubin: Der durchsichtige Berg. Die Entwicklung der Naturanschauung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1985. IV, 424 S. 顾彬:《空山——中国文学中自然观的发展》(1985)

40. Gudula Linck: Zur Sozial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Familie im 13 Jahrhundert Untersuchungen am "Ming-Gong Shu-Pan Qing-Ming Ji". 1986. 230 S. 林可:《十三世纪中国家庭的社会史》(1986)

41. Roderich Ptak: Cheng Hos Abenteuer im Drama und Rom an der Ming-Zeit. Hsia Hsi-yang: Eine Uebersetzung und Untersuchung. Hsi-yang chi: Ein Deutungsversuch. 1986. 354 S. 帕塔克:《明代戏剧和小说中的郑和探险故事》(1986)

42. Michael Lackner: Das vergessene Gedaechnis. Die jesuitische mnemotechnische Abhandlung Xiguo Jifa. Uebersetzung und Kommentar. 1986. X, 139 S. 郎宓谢:《忘却的记忆——耶稣会士研究记忆术的论文"西

国记法”》(1986)

43. Silvia Freiin Ebner von Eschenbach: Die Entwicklung der Wasserwirtschaft im Suedosten Chinas in der Suedlichen Sung-Zeit anhand einer Fallstudie. Das “Ssu-ming T'o-shan shui-li pei-lan” des Wei/Hsien. 1986. VI, 249 S. 冯厄申巴赫：《南宋中国东南水利事业的发展——一个个案的研究》(1986)

44. Ute Engelhardt: Die klassische Tradition der Qi-Uebungen (Qigong). Eine Darstellung anhand des Tang-zeitlichen Textes Fuqi jingyi lun von Sima Chengzhen. 1987. VII, 241 S. 恩格尔哈特：《气功的古代传统——司马承祯的“服气精义论”》(1987)

46. Joachim Hildebrand: Das Auslaenderbild in der Kunst Chinas als Spiegel kultureller Beziehungen (Han-Tang). 1987. X, 252 S. 希尔德博朗特：《汉唐艺术品中外国人的形象所反映的文化关系》(1987)

47. Gerhard Doerfer: Grundwort und Sprachmischung. Eine Untersuchung an Hand von Koerperteilbezeichnungen. 1988. VIII, 313 S. 多尔弗尔：《基本词汇和语言混合——一个基于人体名词的研究》(1988)

48. Florian C. Reiter: Grundelemente und Tendenzen des religioesen Taoismus. Das Spannungsverhaeltnis von Integration und Individualitaet in seiner Geschichte zur Chin, Yuean und fruehen Ming-Zeit. 1988. VII, 173 S. 莱特：《道教的基本要素和

发展趋势——论金元和明初道教的统合与分离关系》(1988)

49. Helwig Schmidt-Glintzer, Hrsg.: Lebenswelt und Weltanschauung im frueneuzeitlichen China. 1990. XII, 265 S. 施密特—格凌策主编:《中国近世早期的人生世界和世界观》(1990)

50. Wolfgang Bauer/Chang Peng/Michael Lackner: Das Chinesische Deutschlandbild der Gegenwart

A. Deutsche Kultur, Politik und Wirtschaft im Chinesischen Schrifttum 1970—1984. Eine Bibliographie 1989. XXIV, 1174 S. 鲍威尔:《当代中国人的德国形象 I——关于德国文化、政治和经济的中文资料索引 1970—1984》(1989)

B.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e im Chinesischen Schrifttum 1970—1984. Eine Bibliographie. 1989. XXIV, 853 S.《当代中国人的德国形象 II——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中文资料索引 1970—1984》(1989)

51. Hans Ulrich Vogel, Untersuchungen ueber die Salzgeschichte von Sichuan (311 v. Chr.—1911). Strukturen des Monopols und der Produktion. 1989. Ca. 368 S. 福格尔:《四川盐史的研究——从公元前三世纪至 1911 年》(1989)

52. James M. Hargett, On the Road in Twelfth Century China. The Travel Diaries of Fan Chengda (1126—1193). 1989. XII, 343 S. 哈格特:《十二世纪的中

国之旅——范成大的游记》(1989)

53. David M. Farquhart: The Governmwnt of China under Mongolian Rule. A Reference Guide. 1990. XVIII, 594 S. 法库哈特:《蒙古统治下中国的行政管理——参考书目提要》(1990)

54. Ulrich Stackmann: Die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Bibliothek Tian Yi Ge vom 16. Jahrhundert bis in die Gegenwart. 1990. VI, 226 S. 石塔克曼:《十六世纪至今"天一阁"图书馆的历史》(1990)

55. Erhard Rosner: Die Heilkunst des Pien Lu. Arzt und Krankheit in bildhaften Ausdruecken der Chinesischen Sprache. 1991. 216 S. 罗思纳:《辨录的医疗术》(1991)

56. Wolfgang Bauer/Chang Peng/Stephan von Minden: Das Chinesische Deutschlandbild der Gegenwart. A. Deutsche Kultur, Politik und Wirtschaft im Chinesischen Schrifttum. B.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im Chinesischen Schrifttum. Eine Bibliographie 1985—1986. 1991. LV, 792 S. 鲍吾刚等:《当代中国人的德国形象》(1991)甲:《关于德国文化、政治和经济的中文资料》;乙:《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中文资料》(1985—1986)

57. Margareta Griessler: Das letzte dynastische Begaengnis. Chinesisches Trauerzeremoniell zum Tod der Kaiserinwitwe Cixi. Eine Studie. 1991.

XIV, 171 S.格瑞思勒：《末代皇朝的殡葬——慈禧太后之死的中国丧礼》(1991)

60.Ursula Richter:Zweifel am Altetum. Gu Jiegang und die Diskussion ueber Chinas alte Geschichte als Konsequenz der "Neuen Kulturbewegung",ca. 1915—1923.1992.323 S.李习特：《古史辨——顾颉刚和作为"新文化运动"成果的关于中国古史的讨论》(1992)

二、东亚自然和人类学协会报告

Mitteilung der Gesellschaft fur Natur und Volkerkunde Ostasiens e.V. (MOAG)

说明:1.本丛书由汉堡东亚自然和人类学协会主编,实际编辑工作由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和日本语言文化系负责。

2.书名前数字为丛书编号。

16.Hauer, Erich Handworterbuch der Mandschu-Sprache(3 Bande).1032 S. Tokyo 1952—1955.(满语简明词典)

31.Lee, Yu-Kuan Preliminary Study of Chinese Ceramics in Blue and White(Ching Hua).38 S. Tokyo 1971.(中国青花陶器的初步研究)

35-A. Friese, Heinz Das Dienstleistungssytem der Ming-Zeit.163S.Hamburg 1959.(明代的服务行业)

35-B. Grimm, Tilemann Erziehung und Politik im

konfuzianischen China der Ming-Zeit.176 S. Hamburg 1960.(明代中国的教育与政治)

35-C. Seckel, Dietrich Grundzuge der Buddhistischen Malerei, eine Einfuhrung.115 S.Tokyo 1945.(佛教绘画的基本特点引论)

37.Stuebel, Hans Ein Dorf der Ta-Hua Miao in Yunnan. 80 S. Hamburg 1954. (云南大化庙的一个村落)

45.Wiethoff, Bodo Die Chinesische Seeverbotspolitik und der private Uberseehandel von 1369—1567.324 S.Hamburg 1963.(1369—1567年中国的海禁政策和私人海外贸易)

49.Vierheller, Ernstjoachim Nation und Elite im Denken von Wang Fu-Chih (1619—1692). 167 S. Hamburg 1968.(王夫之思想中的国家和精英)

57.Eberstein, Bernd Bergbau und Bergarbeiter zur Ming-Zeit. 243 S. Hamburg 1974. (明代的矿山和矿工)

64.Liu, Jen-Kai Die boshaften, unbotmassigen und rebellischen Beamten in der neuen offiziellen Dynastiegeschichte der T'ang. 315 S. Hamburg 1976.(《新唐书》中的佞臣、叛臣和逆臣)

70.Kuan, Yu-Chien Cao Cao's Leben uud seine gegenwartige Bewertung.162 S. Hamburg 1978.(曹操的生平和对他的现实评价)

77. Moese/Reiuknecht/Schmitz-Seisser Chinesische Regionalism in Wester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696 S. 1979.（西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中国乡土文学）

79. Schuette, Hans-Wilm Marxistische Geschichtstheorie und neue Chinesi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Aspekte der Periodisierungsdebatte der funfziger Jahre. Eine Untersuchung der Ausgangspositiouen im Hinblick auf die Gesellschaft der fruhen Zhou-Zeit. 344 S. Hamburg 1980.（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和中国的历史学——五十年代历史分期的讨论）

81. Aschmoneit, Walter Theoretische Aspekte und soziale Bedingungen der Entstehung des burokratischen Staates im alten China. 227 S. Hamburg 1980.（古代中国官僚制度产生的理论视角和社会条件）

84. Mixius, Andreas Nu-Pien und die Nu P'u von Kiangnan. Aufstande Anhangiger und Unfreier in Sudchina 1644/1645. 192 S. Hamburg 1980.（1944—1945年江南的奴变和奴仆）

85. Vogel, Hans Ulrich Lokale Administration und Bodenpolitik der himmlischen Dynastie des grossen Friedens(Taiping Tianguo, 1850—1864). 239 S. Hamburg 1981.（太平天国的地方行政管理和土地政策）

87. Aschoff, Angelus Franzosische-Chinesische Dip-

lomatie 1844—1846.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Chinas im 19. Jahrhundert. 142 S. Tokyo 1981.（1844—1846 年法国和中国的外交）

93.Cho, Hung-youn Mudane:Der Werdegang Koreanischer Schamanen am Beispiel der Lebensgeschichte des Yi Chi-san.412 S.Hamburg 1983.（朝鲜萨满教的职业培训过程）

96.Simons. Stefan Das Bild Qin Shihuang's in der Geschichtsschreibung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241 S.Hamburg 1984.（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著作中秦始皇的形象）

97.Liew, Foon Ming Tuntian Farming of the Ming Dynasty(1368—1644).350 S.Hamburg 1984.（明代的屯田）

102.Weber, Juergen Revolution und Tradition.Politik im Leben des Gelehrten Chang Ping-lin (1869—1936).（革命和传统——学者章炳麟的政治生涯）

104.Luetzow, Monika Liu Jingshu und seine "Yi Yuan".247 S.Hamburg 1986.（刘敬叔和他的"艺苑"）

106.Moerth, Robert Christian Das Lin-Chi Lu des Ch'an Meisters Lin-Chi Yi-Hsuean der Versuch einer Systematisierung des Lin-Chi Lu. 231 S. Hamburg 1987.（临济录和禅宗）

109.Becker,Otmar Gengzi Riji——Das Tagebuch des

Hua Yuelan aus dem Beijing des Boxeraufstandes.289 S. Hamburg 1987.(《庚子日记》研究)

三、柏林中国学研究丛书

Berliner China-Studien

说明:1.本丛书由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系汉学教授郭恒钰(Kuo Heng-yu)和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主编。

2.书名前数字为丛书编号。

1.Lao She:Blick westwaerts nach Changan.hrsg.von Kuo Heng-yu.166 S.1983.(老舍:《西望长安》)

2.Soziale Klassen und Schichten in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Theoretische Transformationskonzepte und reale Entwicklungsformen von 1946—1979 unter besonderer Beruecksichtigung der staedtischen Arbeiterklasse.Bettina Gransow.380 S.1983.(人民中国的社会阶级和阶层)

3.Autobiographie und Literatur. Drei Werke der Chinesischen Schriftstellerin Xiao Hong. Ruth Keen. 145 S. 1984.(自传和文学——女作家萧红的三部著作)

4.Leben und Werk der Chinesischen Schriftstellerin Lu Yin(ca.1899—1934).Elke Junkers.191 S.1984.(女作家庐隐的生平和著作)

5.Leben und Werk des Chinesischen Sprachforschers Wang Li. Hui-wen von Groeling-Che.119 S. 1984.（中国语言学家王力的生平和著作）

6.Bibliographie zu den Deut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1860—1945.Alfons Esser,120 S.1984.〔德中关系论著索引(1860—1945)〕

7.Deutsche Frauen in China, 12 Plaudereien Ueber Deutsch-Chinesische Ehen.Erna Li.328 S.1984.（德国妇女在中国——十二个人的德中姻缘）

12.Beitrage zu den Deut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hrsg.von Kuo Heng-yu und Mechthild Leutner.176 S.1986.（德中关系论集）

17.Deutsch-Chinesische Beziehungen 1928—1938,Eine Auswertung Deutscher diplomatischer Akten.Zusammengestellt von Frank Suffa-Friedel unter Mitwirkung von Cornelia Anderer und Werner Meissner.186 S.1989.（1928至1938年的德中关系——德国外交档案选）

18.Exotik und Wirklichkeit,China in Reisebeschreibungen vom 17.Jahrhundert bis zur Gegenwart. hrsg.von Mechthild Leutner und Dagmar Yu-Dembski.120 S.1990.（异国情调和实际情况——十七世纪迄今旅行报告中的中国）

19.Deutsch-Chinesische Beziehungen vom 19.Jahrhundert bis zur Gegenwart, Beitrage des Interna-

tionalen Symposiums in Berlin. hrsg. von Kuo Heng-yu und Mechthild Leutner. 445 S. Minerva Publikation Munchen 1991.（十九世纪至今的德中关系——柏林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四、海德堡东亚学丛书

Heidelberger Schriften zur Ostasienkunde

说明：1. 本丛书由海德堡大学教授德博(Guenther Debon)和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主编，1980年至今，出书十三种，主要是博士论文及专题著作。此处日本学著作未收。

2. 书名前数字为丛书编号。

1. Siegfried Englert: Materialien zur Stellung der Frau und zur Sexualitaet im vormodernen und modernen China. 1980. 295 S.《中国古代和现代对妇女和性的观念的资料》
2. Dietrich Seckel: Schriften-Verzeichnis. Mit einen autobiographischen Essay "mein Weg zur Kunst Ostasiens". 1981, 136 S.《东亚艺术论著索引——附自传：我的东亚艺术之路》
3. Peter Seid: Studien zur Rechtsgeschichte der Sung-Zeit. Uebersetzung und Kommentierung des ersten Strafrechtskapitels aus den Sung-Annalen. 1983, 166 S.《宋代法律史研究——〈宋史·刑法志〉翻译和评注》

4. Gunter Diesinger: Vom General zum Gott. Kuan Yu und seine "posthume Karriere". 1984, 347 S. «从将军到神仙——关羽及其死后的"高升"»
5. Guenther Debon: Schiller und der Chinesische Geist. Sechs Versuche. 2. Auflage 1985, 140 S. «席勒和中国精神»
6. Rotraut Bieg-Brentzel: Die Tongji-Universitaet. Zur Geschichte Deutscher Kulturarbeit in Shanghai. 1984, 167 S. «同济大学——德国在上海文化工作的历史»
7. Goatkoei Lang-Tan: Der unauffindbare Einsiedler. Eine Untersuchung zu einem Topos der Tang-Lyrik. 1985, 335 S. «难觅的隐士——唐代的隐逸诗»
9. Hans Lothar Scheuring: Die Drachenfluss-Werft von Nanking. Das Lung-chiang ch'uang-ch'ang chih. Eine Ming-zeitliche Quelle zur 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Schiffbaus. 1987, 417 S. «南京〈龙江船厂志〉——明代的一部中国造船史料»
10. Yiva Monschein: Der Zauber der Fuchsfee. Einstehung und Wandel eines "Femme-fatale", Motivs in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1988, 417 S. «狐狸精的法术——中国文学中女神题材的产生和发展»
11. Thomas A. P. Gewinner: Eessen und Trinken. Die klassische Kochbuchliteratur Chinas. 1988, 223 S. «吃与喝——中国皇家烹饪书籍文献»
12. Herbert Butz: Yuan Hung-tao's "Reglement beim

Trinken" (Shang-cheng). Ein Beitrag zum essayistischen Schffen eines Literatenbeamten der spaeten Ming-Zeit. 1988, 203 S.《袁宏道的"觞正"》

13. Klaus Gottheiner: Licht und Dunkel in der Dichtung der T'ang-Zeit. Eine Untersuchung zur Bildlichkeit in der Chinesischen Lyrik. 1990, 235 S.《唐诗中的光明和黑暗——中国诗中"画"研究》

五、波鸿大学东亚学院研究丛书

Veroeffentlichungen des Ostasien Instituts der Ruhr Universitaet Bochum

1. Muenzel, Frank: Strafrecht im alten China nach den Strafrechtskapiteln in den Ming-Annalen, 1968. IV, 138 S.《从〈明史·刑法志〉看中国古代的刑法》

3. Wiethoff, Bodo: Chinas dritte Grenze. Der traditionelle Chinesische Staat und der kuestennahe Seeraum, 1969. VIII, 226 S.《中国的第三边疆——传统的中国国家和沿岸海域》

6. Leimbigler, Peter: Mei Yao-ch'en (1002—1060). Versuch einer literarischen und politischen Deutung, 1970. VII, 158 S.《姚震——对文学和政治的意义的探讨》

7. Pasierbsky, Fritz: Zur Politsprache im modernen China. Sprache-Denken-Wirklichkeit bei Mao Tse-tung, 1971. II, 137 S.《论现代中国的政治语言》

11. Ostasienwissenschaftliche Beitraege zur Sprache,

Literatur, Geschichte, Geistesgeschichte, Wirtschaft, Politik und Geographie, 1974. VIII, 439 S. 《东亚学论文集》

12. Greiner, Peter: Die Brokatuniform-Brigade (chini wei) der Ming-Zeit von den Anfaengen bis zum Ende der T'ien-shun-Periode, 1975. VIII, 272 S. 《明初到天顺年间的锦衣卫》

13. Hoffmann, Alfred: Glossar der heute gueltigen Chinesischen Vogelnamen. Ein Lexikographischer Beitrag zur modernen Chinesischen Sprache. Chinesisch-Deutsch und Deutsch-Chinesisch mit einer Systematischen Uebersicht ueber die Voegel Chinas, 1975. XVII, 366 S. 《当代中国鸟名汇释》

14. Kehnen, Johannes: Cheng Kuan-ying, Unternehmer und Reformer der spaeten Ch'ing-Zeit, 1975. VIII, 179 S. 《郑观应——晚清企业家和改革家》

16. Schmidt, Vera: Die Deutsche Eisenbahnpolitik in Shantung, 1898—1914.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Imperislismus in China, 1976. VIII, 240 S. 《1898—1914 年德国在山东的铁路政策》

19. Kubin, Wolfgang: Das Lyrische Werk des Tu Mu (803—852). Versuch einer Deutung, 1976. IX, 261 S. 《杜牧的抒情诗》

21. Nagata, Sabine: Untersuchungen zum Konservatismus im China des spaeten 19. Jahrhunderts, 1978.

VIII,219 S.《十九世纪晚期中国的保守主义试探》

22. Link, Hans: Die Geschichte von den Goldmuenzen (Chin-ch'ien chi). Uebersetzung und Kommentar mit einer Einfuehrung in die Quellenkunde und Textkritik der tsa-chue. Hans Link, 1978. VIII,335 S.《〈金钱志〉研究》

23. Hoffmann, Alfred: Neue Chinesische Vogelnamen Nachtraege zum Glossar der heute gueltigen Chinesischen Vogelnamen nebst einer Neuen Systematischen Uebersicht ueber die Voegel Chinas, 1978. XII,114 S.《中国鸟名汇释补》

24. Hoffmann, Alfred: Glossar der wichtigsten Saeugetiere Chinas. Ein Lexikographischer Beitrag zur modernen Chinesischen Sprache. Chinesisch-Deutsch und Deutsch-Chinesisch mit einer Systematischen Uebersicht ueber die wichtigsten Saeugetiere Chinas, 1978. XI,103 S.《中国重要哺乳动物释名》

26. Hoeke, Holger: Die Puppe (Mo-ho-lo). Ein Singspiel der Yuean-Zeit. Uebersetzung aus dem Chinesischen. Mit ausfuehrlichen Erlaeuterungen sowie einer einleitenden Vorstellung der Textausgabe einschliesslich ihrer Tradition und einer vergleichenden Untersuchung der abweichenden Lesarten, 1980. IX,280 S.《元代的小型歌剧》

28. Leutner, Mechthild: Geschichtsschreibung zwischen

Politik und Wissenschaft. Zur Herausbildung der Chinesischen Marxistischen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n den 30er und 40er Jahren. 379 S. 《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著作——三十、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

29. Weigelin-Schwiedrzik, Susanne: Parteigeschichtsschreibung in der VR China. Typen, Methoden, Themen und Funktionen, 1984. 260 S.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史写作——它的特点、方法、主题和作用》

30. Spaar, Wilfried: Die systemkrische Philosophie des Li Zhi(1527—1602)und ihre politische Rezeption in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1984. 608 S. 《李贽的系统批判哲学及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影响》

34. Schmidt, Vera: Aufgabe und Einfluss der Europaeischen Berater in China: Gustav Detring (1843—1913) im Dienstie Li Hung-chang's, 1984. 179 S. 《欧洲顾问在中国的任务和影响——在李鸿章身边服务的德清》

六、中国论文集丛书

Series Chinathemen

说明：1. 本丛书由波鸿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马汉茂教授主编(Professor Helmut Martin Ruhr Universitaet Bochum Germany)。主要收入硕士论文和青年学者的著作，以及中国诗歌和小

说的翻译。

2.书名前的数字为原丛书序号，个别日本学及有关作品此处未予收录。

1.Krott, Martin Politisches Theater im Pekinger Fruehling 1978. Zong Fuxans Yu Wu Sheng Chu, Bochum 1980.200 S.(德译本：宗福先的《于无声处》)

2.Opletal, Helmut Die Informationspolitik der Volksrepublik China.Bochum 1981.210 S.(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闻政策)

3.Yue Wen-tang Die Deut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von 1860—1880.Bochum 1981.327 S.(1860—1880年的德中关系)

3.Zusatzveroefentlichung:Martin, Helmut Chinesische Sprachplanung.Bochum 1982.348 S.(专刊：中国的语言政策)

4.Kubin, Wolfgang/Wagner, Rudolf G. Essay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Criticism. Bochum 1982.437 S.(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学批评论集)

5.Bartels,Werner Xie Bingxin——Leben und Werk in der Volksrepublik China.Bochum 1982. 183 S.(谢冰心——人民共和国时期的生活和作品)

6.Schmoller,Bernd Bao Zheng(999—1062) als Beamter und Staatsmann.Bochum 1982.320 S.(官吏兼政

治家的包拯)

7. Belde, klaus Saomang: Kommunistische Alphabetisierungsarbeit. Bochum 1982. 385 S. (扫盲——共产党的识字运动)

8. Epbiner, Rainer Zivil-Militaerische Beziehungen in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七、科隆大学东亚研究丛书

Ostasiatische Beitraege der Universitaet zu Koeln

主编：嵇穆(Martin Gimm)

出版：Franz Steiner Verlag Gmbh, Wiesbaden

2. Walravens, Hartmut(Hrsg.): Kleinere Schriften von Berthold Laufer. Teil 1: Publikationen aus der Zeit von 1894—1910. In 2 Baenden m. zus. CXLVI, 1443 S. (《劳佛文集》之一，1894—1910)

3. Fuchs, Walter: Die Bilderalben fuer die Suedreisen der Kaisers Kienlung im 18. Jahrhundert. 1976. 41S. (《十八世纪乾隆皇帝南巡图录》)

4. Walravens, H./Grimm, Martin(Hrsg.): Deutsch-manjurisches Woerterverzeichnis (nach H. C. von der Gabelenntz Mandschu-Deutschem Woerterbuch). 1978. 612 S. (《德满词表》)

5. Kuhn, Dieter: Die Webstuehle des Tzu-jen i-chih aus der Yuean-Zeit. 1977. XL, 201 S. (《元代的织机》)

6. Forke, Alfred: Chinesische Dramen der Yuean-Dynastie. Zehn nachgelassene Uebersetzungen. Hrsg. u. eingeleitet von Martin Grimm. 1978. XX, 616 S. (《元代中国的戏剧》)

7. Walravens, Hartmut(Hrsg.): Kleinere Schriften von Berthold Laufer. Teil 2: Publikationen aus der Zeit von 1911 bis 1925. In 2 Baenden m. zus. LIII, 1625 S. (《劳佛文集》之二, 1911—1925)

9. Robinson, Kenneth: A Critical Study of Chu Tsay-Yue's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qual Temperament in Chinese Music. With Additional Notes by Erich F. W. Altwein and a Preface by Joseph Needham. 1980. X, 136 S. (《评朱才乐对中国音乐平均律理论的研究》)

10. Kuhn, Hatto, unter Mitarbeit von Grimm, Martin: Dr. Franz Kuhn (1884—1961) Lebensbeschreibung und Bibliographie seiner Werke. Geleitwort von Herber Franke. 1980. VIII, 180 S. (《弗朗茨·库恩的生平及其著作目录》)

12. Bernd-Michael Linke: Zur Entwicklung des manjurischen Khanats zum Beamtenstaat. Sinisierung und Buerokratisierung der Mandjuren waerend der Eroberungszeit. 1982. 378 S.

《文史知识文库》已出书目

中国文学史百题(上、下)
古典诗词名篇鉴赏集
古代抒情散文鉴赏集
漫话明清小说
诗文鉴赏方法二十讲
词学名词释义
怎样学习古文
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
古典文学研究动态
中国诗体流变
中国历史百题(第一、二分册)
科举史话
中国古代官制讲座
经书浅谈
佛教与中国文化
道教与中国文化
佛教基本知识
古代礼制风俗漫谈(1—4集)
与青年朋友谈治学
学史入门

金石丛话

中国古代科技漫话
中华交通史话
中国古代韵书
汉语音韵
中国字典史略
中国古代民族志
华夏饮食文化
中国史学研究动态
中华人物志·文学人物集
中华人物志·政治人物集
中华人物志·史学家小传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
怎样读历史古籍
古人称谓漫谈
文史专家谈治学
《红楼梦》在国外
德国的汉学研究